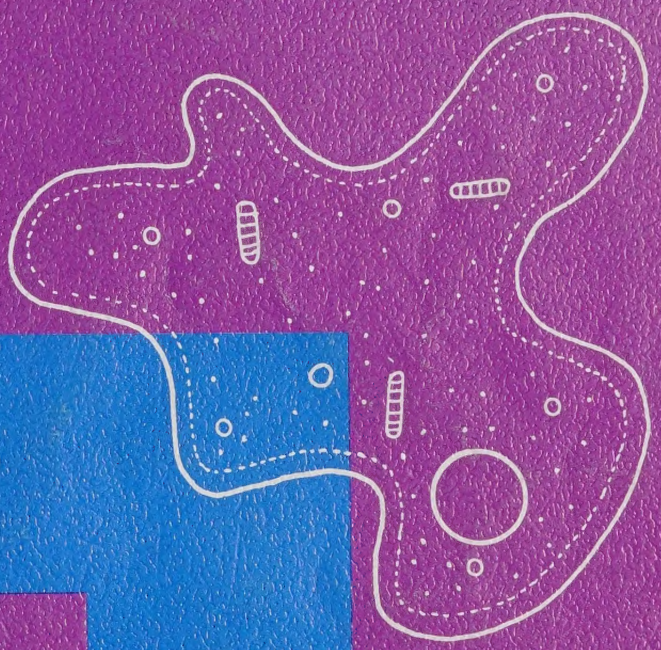
縱覽 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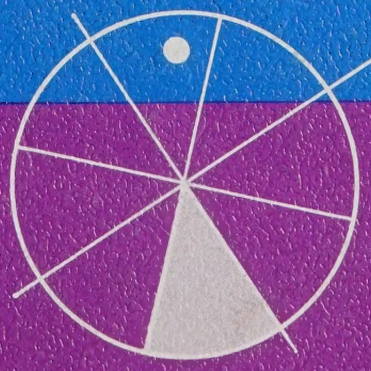
42-43

中的社會・變遷中的教會

中國啊，中國！

本地宣教新動向





3 1761 12394010 8

r
51
643
36
24:no.3-4
983:Nov.)
ANADA_HK

變遷的世界
不變的福音
我們禱求
把兩者連起來

給
祭壇前的你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APR 22 2026

變遷中的教會
變遷中的社會

發刊詞

編輯室

曾經聽過一個比方：今日的世界是按着供求定律運作的自由市場，許多的建制（INSTITUTION）在互相爭競，而基督教就在這場遊戲中漸漸被淘汰，越來越不爲人所接受。原因是基督教追不上時代，其他的建制，如政治圈和經濟圈子等等，都在求變，以適應這時代洪流。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教會就像貨攤上的下價貨，不被看重。可能這種說法稍有誇張之嫌，其他的建制並無想像之中的適應能力，但起碼在推動時代巨輪前進的力量中，基督教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力量，或許這就是所謂後基督教時代（ERA OF POST-CHRISTIANITY）吧！

今天教會面對的就是貫穿整個時代的特徵：變遷，懷舊的人會傷感，喜冒險的人會雀躍，但不論你喜歡與否，都要接受它！因爲它的來臨是無可抗拒的。香港是一塊最容易感覺到這氣候的地方，因此香港教會遇到的壓力便越大，反應更需劇烈。可是我們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相反她的行動是遲緩的，彷彿一暮年的老人，掌握不了奔動的節拍。

變遷是我們談了很久的題目，不過以往的處理方法過於宏觀，試圖從理論層面掌握轉變的規律和所有變遷的現象，反而令這題目變得抽象難懂。今次我們嘗試從表象開始，收集在這幾年間一些明顯但容易被忽略的轉變，貫串起來。讓讀者從這些具體的事例中揣摩到一幅較完整的圖畫，同時亦觸動到時代的脈膊。

在這個專輯裏，導論部份介紹整個香港社會變動的大綱。與我們訪問兩位基督徒區議員，從中反映出香港這幾年間的政治形勢！幾封弟兄姊妹移民海外的書信來往，顯出在這處境中的一些情態。在中國問題方面，我們從兩位中國商務從務員口中，描繪及總結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情況。另外，基督教企業和福音民歌是基督徒文化圈子較明顯的特徵，從基督徒的變動去捕捉社會的趨勢。最後，基督徒辦報是一項未曾實現的理想，是信徒試圖回應社會需求的一項嘗試。

變遷中的社會
變遷中的教會

變遷中的社會

Christianity is emphatically a social religion. Its teaching is directed to men not as units isolated from their fellows but as members of groups and communities.
— The Oxford Conference: Official Report (1937)

We . . . . . should share his (God's) concern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ation throughout human society and for the liberation of men from every kind of oppression . . . . . and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denounce evil and injustice wherever they exist.
— 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

我不再在這世上，他們却在這世上……他們不屬於這世界，像我不屬於這世界一樣。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約翰福音十七章（新譯本），耶穌離世前爲信徒向上帝祈求的禱告。

香港，你的名字是奇蹟！

百多年前，香港還是個憩靜的小漁港，估計只有數千人；而滿清政府在割讓香港時甚至不大清楚這小島究竟在中國的那一方。

今天，香港是個繁忙的金融工商重鎮，中環人的平均步行速度足以列入世界紀錄大全，任何一個較大型的屋邨也有數百人；在香港發生的大事，如前途問題等，不用多久都經有名的傳媒傳播至世界上每個角落。

1949 年可說是香港命運的轉捩點。那一年，因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大批驚惶失措的國人湧入香港。小部份是從上海等大城市逃難到港的資本家，他們帶着相當的流動資產，及國內雛型工商業所提供的經驗與知識。另外的大部份，他們一無所長，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勞動力、青春、和中國人民傳統的勤儉及克苦精神。無論如何，他們大都視香港爲暫時棲身之所，亟欲有一天能夠重歸故國。

1950 年，韓戰爆發，西方國家向中國實施禁運。一直爲香港經濟命脈的轉口業立時受到重大打擊，以致瀕臨崩潰邊緣。爲了從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爲了求生，香港發展了一些勞工密集、土地密集的工業，如紡織印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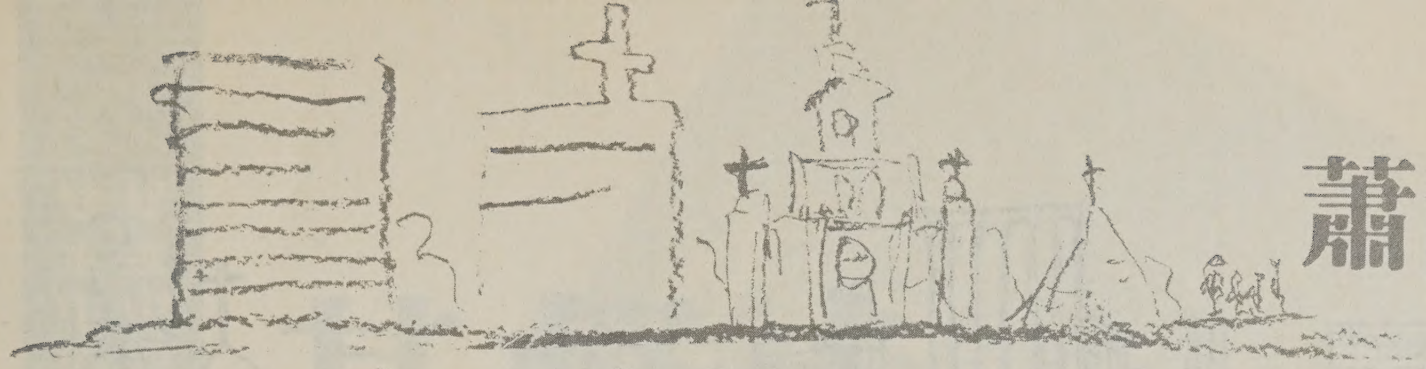
自此，香港的工業發展可說是頗爲順遂。在五十年代大英帝國還未完全沒落時，香港憑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產品得以優惠待遇銷往英聯邦國家。及後一般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 TRADE）成立，香港更得自由貿易之助，乘時培養了較堅實的工業、商業及基本建設基礎。近年，因地理時差、社會基礎、聲譽、專業人才、金融條例等因素，香港已成爲亞洲甚至國際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爲這個本已多姿多彩的城市添上更多豐彩。

伴隨着奇跡似的高經濟增長率，香港本身也起了巨大的變化。離開香港十年以上的老居民，肯定不能認出香港的面貌，特別是屯門、沙田等新市鎮。久居香港的，更親身體會到都市化的冲激——人口激增，生活比前富裕、舒適、方便，教育水準大幅度提升，披着玻璃牆幕的高樓代替了平房村屋，急劇的步伐……；與此同時，我們也面對着開埠以來最令人戰慄的罪案，人與人的關係越發疏離、浮淺，精神病一忽兒成了傳染病，數不清的社會問題都從不知名的地方跑到台前，科技進步、普及帶來更具摧毀性、更使人不自覺的科技陷阱。

面對着這些事實，最頑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香港經歷了空前的重大轉變。展望將來，香港不單會繼續演變下去，變遷的節奏更極可能只有加快的份兒。

教會，你的名字是逃兵！

教會是甚麼？新約使用的希臘文是 EKKLESIA，意指蒙召喚的羣體。實質而言，基督的教會不是一幢建築物，不是一個機構，而是一個超越時間、地域、種族、性別、語言、個人傾向、階級等限制，朝着天國進發，和在不斷成長中的基督徒羣體。聖經曾以身體、建築和新婦比喻教會，且在數不清的地方就信徒及其羣體的生活作出指示。綜合而言，教會的使命有二：一是帶領及預備人進入天國；二是在地上整體見證及榮耀神。



蕭靜

變遷中的教會

有關上述教會本質及使命的討論足以寫成數本專書，這裏不擬詳細探討。然而，重要的是，教會的本質及使命，均指向一個要點：教會除了內部相交外，更必須向教會外的世界發生關係。換言之，教會與社會不但客觀上必然有交往，本質上更含有交互作用的必然性和使命。這種交往，常常爲社會和教會注入新的動力。促使雙方改變。說教會改變，並不是指教會本質及使命的改變（因爲她的本質和目標只有能否達到和是否接近的問題，根本無改變的餘地），而是指教會外在形象和實質表現的改變。

單以教會外在表現之一部份的神學思潮爲例。在二千年漫長的新約教會歷史中，便可概括地分爲教父時期，中古黑暗時候，改教時期，自然神論及敬虔主義時期，理性主義、弟兄會運動及福音奮興時期，自由主義與基要主義時期，新正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時期，以至近期五花八門的解放神學、和解神學、進程神學及水牛神學等。從這甚爲簡略的界分，已可瞥見教會在歷史過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轉變。因此，「教會永不改變」的論點，於外在表現及形像而言是站不住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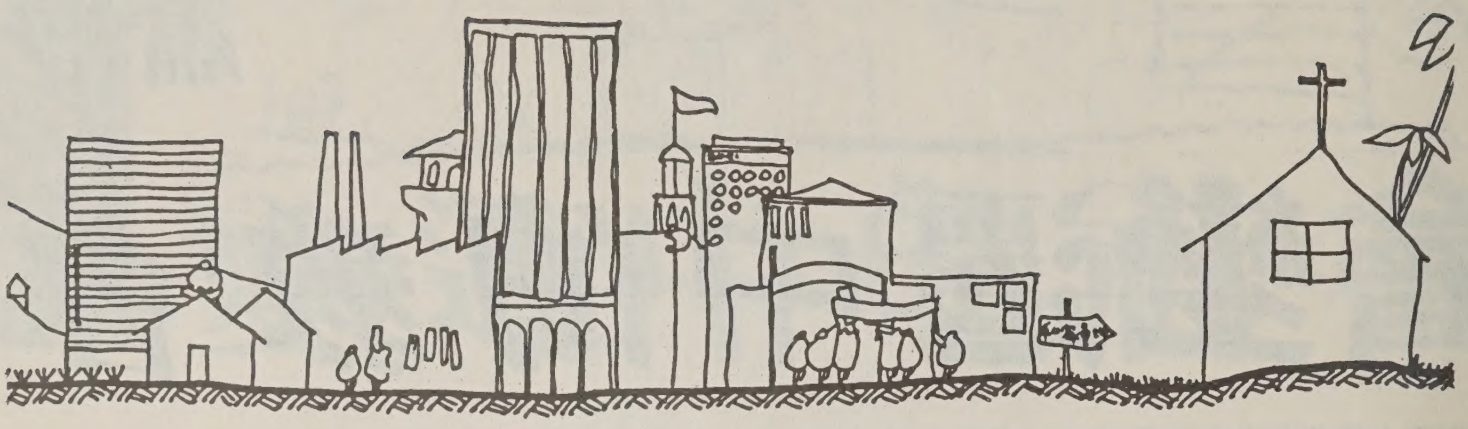
教會變遷（以下全指教會外在表現及形像的改變）的動力，主要可分爲內在和外在。內在的動力，主要是指引導着教會前進的聖靈，不時賜下洞悉能力，促使教會更新。此外，還有教會整體及信徒個人對信仰的重新理解和認識，及教會的主觀改變意願。外在的動力，則包括政治、宗教壓力，國家社會情勢，經濟狀況，意識形態趨向等。這些內外因素，常常是互爲因果的推動教會前進或後退，也有出現彼此抵消的情況。而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動力將繼續驅使教會改變。

從理論和實例出發，同時可看到社會與教會的密切關係。比方在使徒時代，初期教會面臨史無前例的政治和宗教迫害，同時，聖靈也在不斷的動工，賜下各樣的恩賜、洞悉力、勇氣和引導，以致教會得到重大的更新和發展。這些改變又回過頭來影響了社會發展，改寫了當代及以後的歷史。例如在衞斯理的時代，初期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惡果，正在英國普遍蔓延——童工、長時間工作、污穢及損害健康的工作環境、低工資、恣意剝削等等，加上當時的弟兄會運動及人文主義的興起，促使教會再思其工作方針和內涵，使之變得更爲適切當時的世代，且樹立了循道／衞理宗，並爲後世提供了另一個可行的教會行政與事工模式。最後，必須一提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界，要是沒有當時的「國粹派」、「社會佬」的冲激，相信香港基督徒即使有關於國家社會觀的反省，也要來得遲好一段日子，教會也沒有現在般開放（雖然還不算十分開放，但已比較數年前的封閉強多了）。

在內外動力和教會改變之間，也不是沒有任何阻力，就是教會的世界／政治／社會觀和信徒的改變意願。歷史告訴我們，教會的世界觀從來是搖擺不定的，從起初耶穌與使徒積極投入社會，到中世紀時的政教不分和修道及苦行主義，到十九世紀的社會福音，及隨之而起的基要派的避世主義，我們都可察覺到這個擺盪。以香港華人教會近卅年的表現來看，似乎還是盪向消極一端的時候多一點，以致給非基督徒一個避世者的印象，亦從而影響了信衆改變的意願。當然，我們必須諒解個中的因素，如深受美南保守派影響、獨特政治環境、中國人傳統小農性格、教會成員多爲中產階級等，但這總不表示教會當放棄她獨特的使命，從而隨波逐流和逃避責任。二者皆是教會的失敗、倒退，二者皆爲放棄接受及順服神藉着社會變遷改變教會，和藉教會變遷來影響社會的權利及使命。

歷史性的轉折期

回到香港社會，若我們清醒地分析，當可發覺在近五、六年間，香港委實正在經歷着一連串重大和急劇的改變。在經濟的領域，我們看見香港的發展如何由燦爛復歸平淡，由高增長期轉入鞏固期。此外，我們可看到香港由地區性的工商性中心，正在慢慢地蛻變爲世界性的金融及工商業中心，金融服務業在整體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亦隨之迅速上升。而中國與香港急劇增長的經濟關係（八二年中港貿易總額比八〇年增加百份之一百四十，此外，還有



數不清的經濟合作項目、來料加工、補償貿易、財經交流等），更有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涵義。

近年政治局勢的演變，更是驚天動地。五年前，只有傻瓜才會提出1997的問題；今天，街頭巷尾都聽到達官貴人及升斗小民在談論移民、入籍和分散資產。數年前，中國大陸的球隊在香港作賽時，總會受到熱烈歡迎；最近一屆的省港杯足球賽，香港球迷却在瘋狂的替港隊打氣，以粗言穢語辱罵廣東隊，甚至鼓動港隊球員腳踢對手。五年前，麥理浩和姬達還是香港的首二號人物，全港的民選議員（當時限於市政局）也不是女人；如今，麥姬二人只在英國擔任閒職，區議會的推動更是邁向政治化最重要的一步（雖然政府宣傳這只是個行政改革），民選議員也已超過百人。

在社會層面的改變更屬數不勝數。隨手拈來的便有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問題、新移民問題等。隨着工業的重要性及藍領數目下降，小白領的人數急劇上升。社會商業化、資本主義發展至頂點更導致物慾主義高漲、笑貧不笑娼、個人利己主義、追求一時的觀感刺激、人際關係疏離等令人搖頭嘆息的現象。整個香港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更與數年前相去百千里。

上述改變，雖然只是隨便舉出的例子，但相信已足以使我們大吃一驚。不少上述事項，在數年前根本不存在，要是存在，它們的重要性也遠不及在今天。然而，我們還好像仍在夢中，不知日之將白。

你在作甚麼？

也許，1997的課題可帶出更深一層的意義。在97年後，中國的文件上有關香港的地方，勢必刪去「英佔」二字。雖然中英港深知太急促的轉變足以弄跨香港，三方面亦盡量避免香港由生金蛋的活鵝變爲死鵝，但是，無論轉變如何溫和，如何緩慢，香港將溶入中國的體制中，却是不爭的預測。

如此，我們必須回頭細讀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看看基督教在中國成敗的因素，以爲將來作萬一的準備。在49年前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裏，我們不難發覺基督教在爭取國人信主及其支持的努力，是不能說是成功的。問題的成因當然不少，然而，最主要的，相信不外下列數項：

㈠國人對基督教成見極深，認爲基督教是洋教，是有閒階級的玩意、人民的鴉片。而教會亦不能向國人清楚解釋，無力打破隔閡。

㈡教會並無着力研究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缺乏神學及社會科學專才，以致面臨指摘及巨變時束手無策，顯得懦弱無力。

㈢國人在面臨重大國難，在咬緊牙根共赴時艱時，並不認爲基督教會是他們的一份子，教會亦無致力認同國人及中國，以致基督教在中國的情況如無根的浮萍。

這些因素，豈不是教會與社會的交互問題，豈不是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力有多大的問題？回顧現今的香港教會，誰敢說我們已完全征服這些軟弱，誰敢說香港教會已解決了「根」的問題，以致我們可以欣喜地、渴慕地等待1997降臨。

要一下子去思想這些「大問題」，不少人可能會感到十分爲難。然而，香港社會近年來的轉變與上述問題的關係終究是有脈絡可尋，我們也可以先從個別項目入手，積少成多，聚沙成塔。首先，我們必須正面面對香港近幾年的急劇改變，坦然承認我們委實並不十分敏銳，未能捕捉時代的脈搏，然後細加研覓，多作交流討論。現在距離1997並沒有太多時間，整個社會已踏入倒數階段，我們亦已迷糊了好些時候，以致平白失去了不少藉香港社會變遷而反省的機會。錯過了這些機會，意味着我們坐失了從自省到教會更新、成長，到影響香港社會，與上帝共同撰寫歷史的大好時機。

難道馬太福音第廿五章關於童女點燈、管家、審判和天國等比喻的教訓，還不足以使我們敬虔、謹愼、戰競地渡日嗎？（作者爲港大畢業生。）

基督徒區議員專訪

基督徒與地方行政

整理：黃鳳萍

這一個時代，是動變的時代！

八十年代，香港的經濟，正處於重重的轉型期，城市生活質素的進步，使香港人的意願提昇，市民醒覺自己的需要與權利，各方壓力團體的興起更反映社會意識的增強。

時代的脈膊在加速，香港的政治氣候更形活躍。

基督徒在這個時候要作甚麼？一九九七的迫近，地方行政的急速推行，市政局分區選舉，均意味着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將要經歷更多社會政治改革。如果我們說要在世上做鹽做光，基督徒可以作甚麼？

向來，基督徒都是「慢半拍」的，在各方的冲擊底下，還來不及回首，却驀然發覺一切已不可再在掌握之中，因此我們在社會中失去許多戰線。

不過，今日的情況開始叫人有點振奮——有一小撮戰士醒覺起來，整束裝備，看準形勢，迎上去。

今天的形勢怎樣？「地方行政」是否爲九七鋪路？它是政治改革還是行政改革？是邁向民主的指標，還是政府玩弄的民主煙幕？相信沒有人能給肯定的答案，就是香港政府本身也不知道。殖民政府的政策一向採取ADAPTIVE-INCREMENTAL APPROACH，一個地方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甚麼沒有人可以肯定。現在雖然區議會權力有限，只是諮詢民意而沒有決策權，但在鼓勵一般市民關心社會事務與培養健康的政治意識方面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地方行政」現時的架構會否演變爲眞正民主的制度和有更高的決策權呢？這個可能性不可抹煞，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將來的演變固然深受着香港前途問題所影響，更取決於現時香港市民的反應及政治活躍份子的參與。正因如此，我們看見「地方行政」的重要性，更是我們爭取發言權並發揮影響力的重要陣地！

這一個時代，是動變的時代！我們仍然緘默嗎？

沉睡着的固然要醒來，但身處重要戰線的更要自省——是爭取一己名譽地位權力，還是彰顯神的公義、平等和博愛？是庸庸碌碌身處重位而不自知，還是感應着時代的激蕩與需要，洞察社會上複雜的問題？是持着自己的才能權力，空喊口號，還是知道個人的限制，謙虛踏實倚靠神，挑起這沉沉的一擔，爲香港這塊土地踏一條路！

區議會其實很「純」

專訪
沙田區議會委任議員
吳秉堅先生

「我是七九年加拿大畢業後回港的。身爲基督徒，我覺得應該參與社區建設，所以在作沙田委任議員之前，已參加文化康樂活動，推動沙田的文藝活動，包括國畫、音樂、粵劇等，目的是發掘人才，在基層鼓勵文藝參與。

「去年，區議會、音統處和文化署合作舉辦文藝雙週，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關於文藝康樂活動這方面。這與自己的興趣有關的，以前讀建築學時已經接受藝術方面訓練，自己又喜愛音樂，所以很希望在這方面發揮神給我的恩賜，不單服事教會，也服事社區。」

這叫我想起近期基督教的本地民歌，其中不少悅耳的正是吳秉堅的作品。

「現在，我在區議會裏主要是參與文化事務。區議會有幾方面的工作：社區建設，環境改善和社區運動例如德育運動、清潔運動等。我的工作是社區建設方面。不單是環境的建設，更是文化、靈性上的建設，爲要提高生活的質素。

我覺得政府正在觀塘察，看看區議員的質素與誠意……所以政府的態度是幾 RESERVE

「區議會實際正在做些甚麼工作？」

「GOOD QUESTION!」他笑說，一陣興奮掠過他的臉，我倒想知道爲甚麼說我的問題好。

「現在區議會做很多的工作，我覺得人手不足。其中包括社區建設、環境改善、交通、衞生……

「至於有關區議會的職權範圍，讓我讀一些資料給你們聽。」他翻開一個文件夾，原來早有準備。「在影響區內福利事上提供意見，就區內政府計劃提供意見，就區內一款提供意見……很多個「提供意見」是不是？區議會現在的工作其實只是諮詢性質的。在影響政策方面的工作可說是全無的。曾經試過提議組一個 COMMITTEE 處理涉及政府的土地政策的問題，終於組不成。我覺得政府正在觀察，看看區議員的質素如何，是否有誠意參與社區工作，所以政府的態度是幾 RESERVE，不會一下子將工作放給區議員。」

既然吳秉堅的態度如此開放，我也不妨問得更直接：「你覺得區議會有沒有本身的限制與缺點？」

我們還未能夠得到市民完全信任……政府暫時對區議會仍未放心，所以我們都幾難做。

「現在區議員的背景有幾大分歧，大家來自不同階層，好處是讓不同階層的人都有機會參與，但壞處是有時分歧太大，每個人的參與都有自己的個人目的與動機，未能客觀地、理性地解決社區問題。例如，某些議員代表某個壓力團體，於是只爲團體的利益力爭，這對社區未必最好。又例如，民選議員爲了向選他們的市民負責，於是只爲選民利益着想，但可能只是代表了一小撮人的意願，未必對社區整體最好。因此各議員均有不同的利益出發點。所以政府亦很難將決策權大部份交出來給區議員。

「我們還未能夠得到市民完全信任，例如市民要求『上樓』，如果區議員能成功地辦得到就好，但若辦不到，市民不會明白我們已盡了力，只會以爲我們沒有爲他們利益着想。另一方面，政府暫時對區議會乃未放心，所以我們都幾難做到。可能選多幾屆之後，選出全心全意參與社區工作的議員，政府會慢慢更信任區議員，這樣我們才能更爲市民利益服務。

「區議會權力有限，只是做諮詢的工作，但這未必等於沒有參與的價值，因爲有很多意見是應該讓政府知道的。」

談及「地方行政」是行政改革還是政治改革，吳秉堅認爲政治上的意義比行政上改變的意義爲重。

「其實政府在行政方面，一向都是分區化的（DECENTRALIZED）例如理民府和民政署的工作都是負責分區諮詢民意的工作。我反而看見地方行政在政體（POLITICAL SYSTEM）方面的改變，多於看見在行政（ADMINISTRATION）方面的改變。現在區議會有民選議員，擴大諮詢民意，而在委任方面亦盡量做到有代表性。

「長遠來說，地方行政可能成爲更有影響力的組織。我覺得政府希望市民能更多參與，在政治方面、在行政方面、在社區建設方面。政府會慢慢在決策上比較民主一些，這是與香港前途有關係的，可能是爲香港前途鋪路。」他很小心地說着，與他年輕有衝勁的外表不很相稱。

「暫時政府只以地方行政作諮詢工作，而現在區議員所能做到的亦只是提供意見，政府未必一定接納，但亦不是一事無成，例如在沙田　款方面，我們看見政府有誠意，是幾能使社區得益的。暫時區議會主要是在社區建設方面有貢獻，但會不會在決策和政治方面有改變呢？可能會，我覺得有這趨勢。

「當然，香港將來的新政府的FORMAT 是否再用區議會呢？這個我不知道，事實上也很難估計，但在改革民主方面有一定的重要性，地方行政正提高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亦幫助市民建立一個正確健康的政治觀。

「有人說是假民主，但其實地方行政只實行了很短時間，這樣早作批評是不公平的。我看見政府慢慢放手，可能下一屆的區議會主席自民方選出來，不再由民政專員做當然主席，這都是慢慢改善的。

我自己是做生意的，當然最好是維持現狀……如果在各方面維持自由，香港會是個幾好住的地方。

「現在九七問題迫近，亦有很多人提及港人治港，你覺得地方行政在這些問題上有甚麼意義？

「我覺得在未來區議會可能負責起某種政治上的SIGNIFICANCE。但就現在區議會的成員來說，很難看到甚麼，可能再選多幾屆，選出全心全意爲社區服務的區議員，沒有辦事的被淘汰去，那麼區議會可能會做到這些事。當然我仍然會KEEP IT OPEN的，區議會將來未必TAKE UP ANY POLITICAL SIGNIFICANCE，不過無論如何，它都有教育的作用的，可以在香港人心目中建立正確的政治感。我覺得區議會正爲未來扮演鋪路角色，將來可能不再叫作區議會，但可能形式是一樣。

「我自己是做生意的，當然香港最好是維持現狀，這個完全是從經濟角度考慮，與政治無關。但我亦覺得香港是不大可能維持現狀，因爲香港始終是屬於中國的。所以最好是能夠讓香港人在政治架構底下仍然保持自由，香港會是個幾好住的地方。

「面對九七，我希望鼓勵更多有志青年參與區議會，透過這組織去表達我們對香港前途的意願。現在有很多人講關於香港的去向，但講始終流於理論，我覺得如果有多些人參與和實踐，會更能爲香港前途找出最適合的解決辦法。

「區議會其實很『純』，比起美國有二百幾年競選歷史，區議會『純』得很多，『政治』這個名詞經常是嚇怕人，其實不是的。基督徒是有責任關心政治，但以理和摩西不也是很出色的政治家嗎？他們很能在政治架構底下表達他的信仰。當然不是鼓勵每個基督徒都做政治家，但如果神給你有恩賜的話是好應該盡量發揮的。我相信在神的創造裏是有GOD-MADE POLITICIAN。」

區議會距離眞正民主尙遠

專訪
沙田區議會民選議員
楊紹華先生

Proposed District Board Electoral Boundaries –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New Kowloon
建議區議會地區分界圖—港島、九龍及新九龍

地方行政是新突破？

「地方行政」的最終目的是「還政於民」。

而目前主要是溝通民意。通過區議會，政府可知道社區的需要。

其實政府增強諮詢民意的計劃非始於今日。八、九年前香港治安甚差，政府倡組「互助會」協助滅罪，十分收效。後來爲了培養民主風範，更使用互助會選拔中下層代表參加新界地區性諮詢委員會以聽取民意，此行動開始於七九年，正爲「地方行政」鋪路。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殖民政策沒落，經濟蓬勃，隨之而生的是民族的醒覺。政府在此時推行「地方行政」正是明智之舉。

「地方行政」在公民參與方面有沒有突破呢？衆所週知，「衙門」使老百姓視爲畏途，以往市民沒有途徑表達意見。區議會正可讓市民提出意見，參與區內事務，建立他們的歸屬感，這可算是一點突破。

而現時「地方行政」所提供的參與肯定比既往開明、民主，而且議員選拔自各階層，並非由政府一手包辦；不過目前區議會諮詢性質比較大，距離眞正目標尙遠，而有待改進的地方還多呢。

區議會權力有限

區議會本身是有其限制的。究竟它的權力有多少？它能否眞正反映民意？能否爲普羅大衆說話呢？這些都是重重的問題。

區議會的工作是反映民意，作爲政府與民衆橋樑，在實際決策方面則有賴區管會的決定。究竟區管會是否百分之百依從區議會的意見是不得而知的，這是區議會的權力限制。不過無論如何，民意畢竟透過區議會上達了，對政策的釐定起了一定的影響。雖然有時政府對我們提出來的意見好像只聽聽便算，但我們斷不能希望政府一下子將所有問題解決。對一些較爲複雜的問題需要更多詳細考慮，例如較大的工程的道路系統，要牽連到很多部門及專業知識人士去探討，當然會拖延一段時間。但當區議會提出較爲簡單的工作時，大多很快辦到，所以不能說對政策的制訂無影響。

至於反映民意的問題，現時的議員來自各不同階層，亦算是很有代表性。現在沙田區議會內有身爲主婦的議員，有酒樓老板，塑膠廠東主，中學校長等，各人身份不同，於是更能反映不同階層的意見。不過區議員能否眞正爲民請命呢？這則在乎個別議員的態度。例如當賽馬會提議在沙田市中心設立投注站時，其他議員或者希望考慮更多人意見才討論，所以現場保持緘默的不少，只有我提出強烈反對，我認爲賭博影響很大，不應在市中心設投注站。最後當局決定把投注站改設在商場隱僻之處，這也可算是一點成功的爭取。從這事可見區議會能否反映民意爲大衆爭取利益是視乎個別議員的取向。

假民主・政府走狗

政府推行「地方行政」雖然暫時未到盡善之處，也起碼有了一點民主的曙光，目前市民倘有寃情

時便有投訴之門——透過區議會。但是政府方面開放了一些，又要市民瞭解自己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在適當時間去使用，關心自己的社區，去各盡一些力量共同推動社區的發展，這樣，社區才有希望，在循序漸進之下自然會在「假民主」中進到眞民主的領域去！正如道路是人所開出來的，要市民自己去關注與努力去開拓。

我覺得香港市民一向對政府頗爲冷感。香港是中國人佔多數的社會，在平時大衆都不大關心政治，市民爲了生活，爲糊口而忙碌，所以對大衆的事都漠不關心。也由於中國民族性較爲純良的品德，「管他甚麼人作王我也一樣納糧」的心態很普遍。但若政府有好的引導及較大的開放，那末香港市民也同樣熱烈參與。

不過近年來亦看見一些改變，社會上出現不少壓力團體，這些人決意不參與地方行政，不願被納入政府官僚架構，希望永遠站在外圍作反對派。我個人很欣賞這些關心大衆事務的人，由於他們言行或有時會過激，很容易被人誤會，所以政府才冠以「壓力團體」這個不堪讚許的名稱。其實他們是值得我們欣賞，因爲他們有熱心。至於大家的做法何者更爲有效地影響政府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我認爲我們只是透過不同的途徑去作同樣的工，只要是方向相同，同是以服務大衆爲目標，方法不同不成問題的。有人說我們被納入官僚架構，作政府的「走狗」，那只是觀點不同的問題而已。

一九九七・地方行政

面對一九九七和未來的政治社會變遷，「地方行政」有其獨特的意義。

英國一向的政策是在殖民地獨立之前，先爲當地成立類似地方自治的組織，例如在亞、非的殖民地均實行類似的政策。至於香港，究竟政府有沒有此意我則不敢肯定。但「地方行政」的確可以引導大衆開始認識自己的責任，對自己的事更關心，並可培育「民治」的意識，建立「民治」基本的架構去迎接未來，這是適切的措施。

目前，香港的前途仍未明朗化。作爲一個香港人，對自己本身前途肯定有發言權。我們曉得中英雙方會在適當的時候透過外交途徑去討論，是可喜的事，若能撇去「條約」，集中精神於香港接近六百萬市民勤奮建立的現今及未來的現實情況，去處理香港前途問題，就必是樂觀的，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歷史告訴我們，香港是在不平等條約下割讓出去，故此「主權屬於中國」是每一個中國人所肯定的鐵一般事實。

但另一方面，香港人一直以來所過的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無可否認，香港人百分之百都樂於現況，不願意有甚麼改變，要是一下子改變過來，肯定不易適應，更因社會制度不同，生活方式各異所使然，故此，我非常同意某些人的提讓香港成爲「特區」，由香港人自己去管理香港，社會制度愈少改變愈好，相信這是港人所願望的。這雖然是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主權歸屬中國，一方面維持現況，但無論如何這是大多數香港人的心聲啊！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現在沒有人知道一九九七之後香港的政治社會制度會變成怎樣，但在這段等待時期裏，我們應好好作準備，更要爲香港人爭取發言權。作爲基督徒，更要在這時代發出呼聲。聖經沒有教導我們出世，而是教導我們入世，進去人羣中服事人，耶穌基督亦不是單在聖殿會堂傳福音，也走到加利利海邊教導人們。耶穌曾啓示我們：「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此句話與「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精意相同，基督徒關懷自己的社區去作「服事人」的事，是理所當然的，是「使命」。

（訪問整理者爲《橄欖》出版委員會出席。）

幻想小說

移民之後

廓浩思

國偉、燦輝：

你們好，到溫哥華經已兩個月了，忙着找住的地方，未暇早日寫信給你們，請諒！

上星期日乘姨丈的車到甘教授主領的禮拜堂聚會，在異地聽甘牧師講道，感受是很清新的。我想，假如公司仍留派我在溫哥華，我會參加這禮拜堂的，到底崇拜後，也可找到舊朋友說說廣東話呀！

工作是在大電腦公司當學徒，說是學徒，眞是一點也不假。名義上，我是協助冷氣工程師維修保養冷氣系統，但往往留在辦公室學電腦語言及操作的時間還多。至於姨丈小餐館的大廚，他經已從美國回來，少娟和我的三腳貓也不必再濫竽充數了。其實姨丈代報是我的僱主也不是全假的，不過，他代我找到現在這份工作，就比他最初安排的更是教人感激。他到底仍會幫我說是我雇主的，申請移民時，是他幫我填寫的。

穎兒已開始找學校，看看有沒有護理學的深造課程。未來的日子大概會是我工作，她唸書，然後是她工作，我唸書。我們總不能丟開老本行的，臨時趕學的煮食法，始終是過渡時期的。不過，若果眞的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經濟衰退，無可避免就要失業了，那時或者這門手藝也會變成生活的依靠。

上個月，星明從美國來探我們，他現在在美國餐館「洗大餅」。聽他說，因爲未能適應美國信徒的文化背景，英文又不流利，所以暫時離開了牧會的事奉崗位，在普通人的生活環境中體會美國式生活，瞭解會衆的需要。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如此想，不過，他說，讀神學、移民……等都是他的聰明選擇，既可以贏得人家的尊敬，又能輕易避開煩囂得令人窒息的香港，過一些比較優悠的生活，他必是另外有其他打算的了。他還繼續參加侯士頓禮拜堂的聚會，聽他說，他結識了許多美國頂尖的華人知識份子，還打算從中找些靈感，再進神學院寫論文，做碩士。

呀，對不起，開始寫得很亂，因爲多年沒有用中文寫東西，字句一定很不通順，還是不寫了。你們的移民計劃進行得如何？教會少年團有沒有甚麼新發展？人數越來越少的情況有改善嗎？牧師的身體情況有沒有轉變，你做醫生的總有個方法吧！

祝身體健康

穎兒、國強上
2／6／83

※　　※　　※

親愛的團友們：

你們好！

離開了你們的笑聲和頑皮相，有時眞是很捨不得。這裏的生活比較悠閒，穎兒姐已正式找到大學，下學年便會再做學生，學護理了。國強哥的工作比較忙，工餘又要自修，可是沒有你們常常叫苦連天的考試壓力。不過你們和我們一樣，讀書一定要努力呀！

新導師珍輝姐和燦雄哥一定帶領得團契很妥貼罷！從前常常提到的靈修禱告生活，現在沒有荒廢罷！假如你們喜歡我們看你們的靈修日記，你們可以影印寄給我們，我們會像以前的給你們寫一些讀後感。

以後要是有旅行或洗禮等，別忘記寄一些照片給我們，我們見到你們長高長大，一定很高興的。考試來了，功課準備好了沒有？

暫此停筆，記緊努力！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爲、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祝以馬內利

穎兒姐、國強哥
15／6／83

※　　※　　※

張牧師：

你好！

到加拿大三個月了，忙着找房子，還不曾詳詳細細的寫信給你，不必掛念。現在已經找到房子了，地址在附頁中，請隨時給我們寫信。

我們已決定參加甘教授幫助牧職的教會，記得他也曾在教會主領佈道會，又在講道中聽不到新派的信息，相信張牧師可以放心，這教會的信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們只不過是初到步的，主要是參加特別安排的查經班，幫助我們適應這裏的生活方式及一些信仰造就，大概久一點，我們也會開始在這裏事奉了。

我們的生活沒有原先想的那麼多空閒時間，穎兒唸書要做家課，國強工餘也要自修電腦課程，不過壓力倒沒有香港那麼沉重，這裏的人走路的步伐

也不像香港的匆促。

前些日子見到朱老牧師，他老人家已沒有正式擔任牧職，和他交通，他說香港始終是屬於年青人的，老人家在香港跟不上那些變遷，也沒有那份衝勁去闖了。其實，他的兒女都因着讀書或其他原因移民美加，他獨自留在香港也是很孤單的。朱師母還在一家小禮拜堂當司琴手，聽她說，能夠彈奏管風琴，可算是還了她的心願。

在這邊還見到了許多香港的舊朋友，有主內的也有未信主的，相信在華僑和舊朋友同學中，傳福音的工作也是極需要的，我不時禱告神，盼望主給我引導，怎樣開始福音工作。

你寄來的咭和信，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深信主引領我們到溫哥華來，總有祂的旨意的！

願上主的恩惠常與教會、執事、會友同在，又願主賜你身體健康，把教會引到蒙福的道路。祝主恩常偕！

穎兒、國強上
30／6／83

※　　※　　※

浩思：

接到你的信很是驚訝，對你的坦白很欣賞，還有那些你特別搜集的資料，引發起我們一些很少有的反省。不過，我懷疑你對我們有些誤解，原諒我們這樣說，我們也年青過，也深知道衝動是成不了事的。

你寄給我們那份「門徒訓練」，還指定要我們對吳思源先生那篇文章表示一下所採的立場，老實說，我們並不屬任何一種。我不是沒有從九七問題想到移民，更並不是以這問題作爲移民的主要原因。正如許多人移民一樣，我們對香港失望，發覺從學校學來的知識根本不可能爲人帶來甚麼益處，原因是很多時候有制度上的規限，客觀環境的障礙，以致不能學以致用。比方說，穎兒辛苦地學了護士三年，工作了四年，看到的是醫院設備嚴重不足，連厠所也開了帆布床，在這個情況下，關心和照顧病人簡直變了不可能，工作壓力大，病人抱怨多，基本上是由於政府既定的方針所造成的惡性循環。加拿大這邊當然也有困難，但最低限度，醫院設施及人手方面就充裕得多，病人起碼可以得到合理的看護，也能初步完成穎兒起初入護理界的期望。國強的機械工程就更加渺無用處了。能夠應用到的，不及課程的二十份一，那一種被騙感實在太重太重了。

不錯，我們很欣賞這裏舒閒的生活，星期天可以駕車到山上湖裏釣魚或是睡覺，我常覺得，神造人也不是要人天天苦苦工作的罷！我不能不說自己沒有吳思源那份承擔派的雄心，但我想這些也許只是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不管你怎樣說自己不是個殉道派，或許大陸收回主權時，你始終要當烈士。不是當烈士不好，而是總該有人在其他地方考慮問題，作長線工作的準備。

我愛不愛國？我也不大知道。我想這問題對你可能更加合適，你不必事事挑戰別人，想想自己怎樣決定才好。愛國的話又是否必定要當烈士呢？神到底有沒有給你特別啓示？我贊成牧師的說法，這些問題想想就好了，更要緊的，是搞好人與神的關係，多背經讀經才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即使將來聖經短缺也可以靠背熟了的反覆思想。

你大抵不必過份擔心教會的中上層越來越少工人，神是看顧教會的，看得比你我都遠大高廣，可能是另有祂的計劃，只要自己努力爲主工作，與神有好的關係，也就是一生所求了。

中文寫得很少，字句文意一定表達得不好，請諒。祝主恩常偕！

主內
穎兒、國強
15／7／83

※　　※　　※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還有「很多」的信是穎兒和國強寫的，有一封信還寫到他們開始嚐到寂寞，請教會的弟兄姊妹「路過」溫哥華時，記緊和他們一聚，到底大羣人移民外國，大都分散到各國各處，很少機會聚首。至於其他書簡，但願讀者們心領神會，代他們寫寫好了！

（作者爲港大同學。）

於荊叢中求突破

—中國商務從業員縱談中國現況與前景

整理：陸錦光

中共建國於一九四九年，至今已近三十四年。《橄欖》當然力不足評價這三十多年多中共的成敗得失。可是，有一點相信是不同背景、不同觀點的人都會同意的，就是在七八年前，中共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鎖國」的狀態下獨自生存，像與其他國家（亞爾巴尼亞等少數國家除外）毫無關係，亦無發生關係的必要。然而，在七八年及以後，中國的務實派開始意識到經濟落後、民生困苦等現象，與其鎖國政策及平均主義色彩濃厚的經濟制度有直接關連，遂大事改革，推行一連串積極的開放政策，以期吸收更多的外國資金、先進管理方法及科技，以加速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從而鞏固管治基礎。於外商而言，由於中國尚屬一塊「處女地」，十億人口也只是一個最具潛質的市場，因此外資僑資莫不趨之若鶩，掀起了一陣陣中國貿易熱潮。在香港的華人，由於擁有地理、文化、語言接近等有利條件，更成了外國或本地財團聘請的對象，以替他們拓展對華貿易、投資、設廠、地產旅遊發展、顧問服務等商務活動。

再者，七八年後，香港及中國的相互倚賴性及重要性亦日益明顯。近日因九七問題，更使人意會到兩者命運之不可分割。因此，一個合乎客觀形勢和邏輯規律的結論，就是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越來越多港人的生活、工作、個人取向、價值體系，將深受中國及香港前途影響，且莫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香港和中國的未來。在這批港人中，無可避免地包含了一定數量的基督徒。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的基督徒不單將會與中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其工作更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中國商務。

最後，因着現代發展的客觀需求，中國顯然不能再全然依賴那批只擅於打游擊戰或搞政治運動的幹部來治國，而須吸納大批擁有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的年輕人進入他們的統治架構，和更借重知識份子。作爲中國現代化的橋頭堡的精英，香港的大專學生實在擁有更多潛藏機會進入中國的政治體系及其決策層。只要香港的大專基督徒學有專精，當可在切合中國需要的範疇內有所貢獻，則「晉身」爲技術官僚（TECHNOCRAT）的機會實不可輕易抹煞。環顧四方，最容易藉職業進入中國的政治體系的，還是以中國目前最大需求的工商業人材爲主。這樣，中國商務於香港大專基督徒而言，除了越來越大的重要性及可能性外，亦有不能略去的潛藏的政治層面。

在這個形勢底下，既然我們將來與中國的接觸屬無可避免，而加入中國商務的機會更越來越大，那末，我們不禁要問：甚麼是中國商務？其中涉及那些困難和問題？有甚麼該加以注意的地方？在長期殖民地教育薰陶下，我們對中國的理解是否透徹無誤？我們又該抱甚麼角度及態度認識中國，及其與香港的互動對我們有怎樣的影響和意義？而且，既然中港生活方式和條件有巨大的差距，我們將面對甚麼適應的問題？在中國作基督徒究竟是甚麼回事？中國的宗教政策及形勢如何？怎樣才可以使基督教在中國生根？我們應該及可以採取甚麼取向？明白了上述要點後，我們又當如何自處？

雖然《橄欖》力不足以解答這些大問題，但我們願作一個拓荒者，好與弟兄姊妹一同思考這些切身問題，以免在環境改變時不知所措。爲此，《橄欖》特邀得兩位相熟的弟兄，暢談中國商務的甘與苦，工作中面對的難題及倫理道德衝突。此外，葉弟兄及張弟兄（化名）將進一步談及雙方對中國前途的看法和個人取向。由於有關的討論不多，編者極欲這篇文章成爲一個開端，以催生更多更有份量的討論和研究。是爲所禱。

中學時有一份很强烈的民族意識，後來漸漸發覺這所謂「民族意識」的基礎很薄弱。

葉：我從小便很渴望返回中國大陸工作。畢業後，在政府機構工作，主要是與工業有關的部門。在七八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有朋友邀我回大陸設廠，當時中國正開始實施開放政策。我發覺這是個良機，可以親身體驗一下在大陸工作是怎麼一回事，也覺得這是神特別爲我安排的工作，所以欣然接受。但是，在呈遞辭職信前的一夜，內心百感交雜。一方面是興奮，另一方面則很擔心，因爲對中國的政策信心有限，實在不知明年是否需要再找新的工作。再想到在政府工作亦甚理想，生活安定，亦有一點滿足，並且有不錯的晉升機會。看着這種種優厚的條件，不由恐怕自己將來會後悔起來。不過，最後還是遞了辭職信。屈指算來，至今已有三年了。

張：我加入對華商務工作的情況有點不同。記得中學時，一羣同輩同學都有一份很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參加保釣集會、罷賣日貨，甚麼都是中國的好。升上大學後，漸漸發覺這所謂「民族意識」的基礎很薄弱，大部份都是一些情緒反射，例如一提起中國，便立刻想到悠悠五千年絢爛的文化、祖國母親、錦繡河山、世界四大發明始祖、近百年的受欺凌、十億同胞和我的血管流着相同血液等。然而，甚麼叫愛國？怎樣愛國？愛甚麼？都只有一個很模糊的觀念。但撇開這點不談，我倒還是很關心中國的，尤其是在七六年末，中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我已極留意中國經濟政策的改變，更認爲這是對每個關心中國者的一個極大的挑戰。後來，有機會在暑期中到一間國內的工廠實習，與當地的工人、農民、幹部接觸，對中國的了解和興趣更加深入。畢業後，由於我不喜歡做的工作太多了，再加上對中國的興趣，便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加入了中國商務。

葉：我認爲一份存在內在價值的工作是叫人羨慕的。記得在外面唸書時，有一位來自非洲小國的同學，原本在國家發展銀行辦事，後來被派到那裏唸書。他經常對我說他的國家很落後，仍有許多地方有待改善，所以他更應努力讀書，好回國後幹一番事業。他那份自豪，令我羨慕不已。相信這亦是我選擇中國商務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我以爲制度是與統治和被統治者的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鎖國，更加深了封建、單元化的意識，成了排除理性的溫床，以致政治及行政體制千瘡百孔。另外一點，基於傳統、社會制度和教育水平不同，國人與港人或現代西方人的觀念也有很大的差距。

張：按你的理解，這份工作的內在價值就是對中國大陸有一定的貢獻吧。現在的實際情況和你當初的理想到底有多少差距？

葉：簡單的說，當初眞是有點天眞。那時我假定國內主要是管理上出了問題，只要有一所較完善的工廠樣本，作爲參照，必然會有所改善。再者，可以透過工廠與大陸的工業部門有較密切的關係，從旁推動大陸的工業發展。自然，三年工作下來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第一內地的制度是非常的「緊」，很多時候不是不懂得如何管理，而是社會的大制度令一間工廠永遠也管不好。比方外商在中國設廠已是享有非常優厚的特惠和自由，但比較一間現代工廠運作上的需要，還是差得很遠。兼且這大制度基本上是與社會的結構息息相關。如果社會政制沒有根本的改變，完善的工業管理是沒法達到的。第二點令我失望的是國內根本缺乏想「搞好」工業的人，關心工業的多是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在權衡兩者的較重後，自然出現了許多「犧牲大我，完成小我」的事情。

張（相視大笑）：這便應了國內一條金科玉律：「花錢花太公，賺錢歸自己」。你可否再多談一點。

葉：待遇問題是最熱門的。一般來說，勞方的報酬在平衡許多條件後仍是不合理地低，工人也多不願意加班，寧可回家做副業，如養鷄等，得到的報酬反倒更多。於是工人加班便等於犧牲個人利益，而得不到合理的報酬。但是，要改善這點却是跡近乎不可能，因爲工資計算法是由國家制訂的，於是便出現了許多其他補償方式，造成更多不合理的津貼。到頭來，始終會有一些人被不公平地對待，一間工廠應有的制度也完全被扭曲，沒法管理得好。

另外一個例子是出現在幹部身上。早期的確是兩袖清風。可是現在年紀大了，沒有甚麼產業留給子女，眼看他們的諸多問題，如學業荒廢、工作分配不理想等，便產生了許多互相照顧

，例如彼此爲對方的兒女安排職業等，於是輾轉在幾個機構裏築起糾纏不清的裙帶關係。這個關係網也往往把許多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了。

張：其實這是個很複雜的社會問題，單單責怪現時的幹部亦於事無補。我以爲制度是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中國經過了多年鎖國，更加深了封建、單元化的意識，成了排除理性的溫床，以致政治及行政體制千瘡百孔。補充剛才所說的壞影響，最簡單的莫如機構重疊，以山頭主義和辦事效率低落。我記得前一陣子替公司申請一個可讓私家車通過文錦渡的通行證，其中有香港及外籍乘客。申請批准後，在香港花了半個月，單單與移民局接觸，便已辦妥了港方要求的手續。然後再到深圳辦手續，却花了兩個多月時間，經過十多個機構，蓋了二十多個圖章，才總算完成了手續。可是，手續完成歸手續完成，在發簽證時才發現國務院原來沒有批准外國人經文錦渡進出中國，而其他理應密切合作的部門亦居然不知此事！這在在都說明了國內機構的問題。

另外一點，基於傳統、社會制度和教育水平不同，國人與港人或現代西方人的觀念也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安裝電話。在香港，你只需花數百元港幣和兩三天時間，便可使用高效率的電訊服務。在國內，要是你希望租用電話，必須提出申請，而私人用電話的申請獲准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當申請一旦獲准時——這是指最少半年後——你便要付出數千塊人民幣，敷設由電話交換機至家中或機構的電線，再每月付出可觀的費用，還要常常受接線員的氣，才能「享用」這部效果極差，亦常常損壞的電話機。

我想，這一方面是國力和制度的問題，另一方面却是對電訊和服務的觀念出了問題。

（頓了一頓，喝口茶，接着說）又例如新聞工作。在國內我們都接觸過不少大衆傳媒，如報章電視雜誌等。基本上我發現一個規律，就是新聞報導大多是報喜不報憂，宣傳教條典型多於事實報導。在國家生產好轉時固然大事宣傳，在大部份人們瀕臨於餓死邊緣時也是國家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且是越來越好！此外，更很少聽到較深入的分析和獨立見解。就是在轉播足球時也只聽到一大堆統計數字和顯而易見的情況報導，絕少聽到旁述員的意見及分析。這固然是由於歷次反覆的政治運動嚇怕了國人，使人人都不敢坦白說出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恐怕也與中國人濫於服從權威，和中共的新聞觀有關。西方人視新聞事業爲社會良知的體現，新聞工作者必須客觀、忠實地報導，輔以深入的理性分析作獨立批判。然而，中共却只視大衆傳媒爲黨的喉舌工具。於是，新聞工作者都只好在欽定的範圍內運作，誰也不敢提甚麼「新聞自由」。這是另一個觀念問題。

國內人甚麼也沒有，只有從工作來的權力，於是每人都刻意發展那僅有的特權。如果有事要「經手」，必然把事情弄至最仔細，即使微不足道的偏差，亦不惜擴大至影響全盤計劃。由此亦不斷上演「鷄毛令箭」的鬧劇。

葉：我覺得在開放政策中也有這個情形，一方面口頭上說可以讓外商賺錢，另一方面行動上却傾向擺脫外商的「剝削」，要把實質利益歸回中方。

張：這可能是與近百年的中國歷史有關吧！受了太多的外來欺凌時，總是害怕被佔便宜的。

葉：對，正因這樣，與外人合作時總是存着猜疑，防着外人佔便宜。於是許多狡黠的商人便乘着這弱點，佔了不少便宜。而那些想幹點正事的商人，却又處處受制肘。

張：我發覺中國大陸官僚架構的冗員實在太多了，令每人都只有少許的工作權力。特別是低級幹部，很注重他們這有限的權力。這一來產生了層層匯報的必要，減低了工作效率，二來如果有事要「經手」，他們必然將事情弄至最仔細，即使微不足道的偏差，也不惜擴大至影響全

盤計劃。由此亦不斷上演「鷄毛令箭」的鬧劇。

葉：我也有同感，主要是由於國內人甚麼也沒有，只有從工作來的權力，於是每人都刻意發展那僅有的特權。再加上中央集權，處處都是黨團雙重領導，從中央到省、省到縣、縣到公社、公社到大隊、大隊到小隊，莫不如此，每個機構又再分出若干監察機關。官僚架構這樣龐大，後果就更嚴重了。

張：除了這些，你有否感到在中國常有許多倫理道德上的衝突？

葉：自然免不了。在如斯制度下，許多不合理的地方都被當作合理，或至少是合理化了。早幾年，一些在香港不當作一回事的東西，如一包香煙、一頓晚飯等，都可帶來不少方便。

張：現在可不行了，可能是通貨膨脹罷！

葉：就是嘛。我時常在想這些小恩小惠算是甚麼？到底這是賄賂嗎？

張：對了。

在國內，有時說謊並不會造成甚麼損失。可是有些情況，譬如走後門，即使你不幹，亦會有別人補上你的空缺。這是十分微妙的問題。

葉：在許多例子上，我覺得賄賂是很難和正常的交際劃清界線的。對於我，亦只有一些模菱兩可的劃分法。譬如說，只要禮物不是可長久保留的，便不算是賄賂，如一些煙酒、飲食等。反之則然。事實上我和某些幹部私交甚篤，送點東西給他們的兒女也是很平常的。

張：你的看法是相當富爭論性的。從另一角度看，物品的持久性與是否貪污並無直接關係，因爲持久的東西可以不是賄賂。反之，不耐久的東西亦可以是賄賂。另一方面，賄賂基本上是客觀事實，不一定取決於動機。從法律角度看，國內幹部收了超越他可收受範圍外的東西便算是接受賄賂，而並非按動機來批判。

葉：這的確是困擾我的問題。如果我能閉起眼睛來幹，按理可比現在成功。但我不願意這樣。可幸我的上司是個性情比較率直的人，也視這些行徑爲不當。兼且設廠時正是開放初期，貪污的風氣亦沒有這麼厲害。坦白說，有時我也擔心自己是否放得太鬆。

張：我想人人都必然持守的原則。當壓力來到時，便非原則二字可以斷言一切。我想一些倫理原則是比較抽象的，放在實際生活中是需要修正和取捨。坦白的說，我也分不清送煙、請吃一頓豐富的晚飯是賄賂還是正常的交際呢？啊，還有說謊話，說過謊話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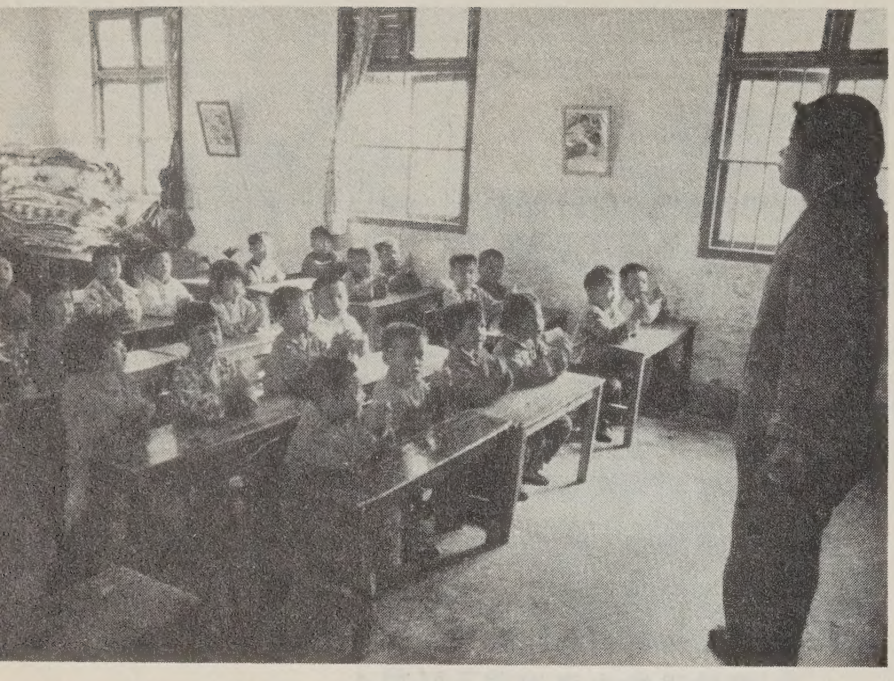
葉（苦笑）：就我處身在商界中，不適當地處理無意的謊言常帶給我很大的罪疚感。但如非這樣，事情恐怕永遠也做不好呢！

張：很多時我覺得這是個代價與成果的考慮。記得有一次我與一位同事每人帶了十份掛曆回國，海關員將掛曆拆閱，逐頁逐頁的打開欣賞，我相信他絕非要去檢查掛曆裏到底有否走私品，這純粹是他濫用職權去欣賞掛曆，這件在國內很吃香的東西。當時我趕着開會，時間已十分緊迫。而當他再問另十幅掛曆是否與剛才的完全一樣時，我便立刻撒了一個謊，說是完全一樣，以免誤了正事。根據比較嚴格的標準，這確是說謊。但在那個情況下是否值得，是否應該如此行？

葉：我只能說我不懂得如何判決這事，可能我也會和你一般做法。在國內，有時說謊應不會帶來任何損害。可是有些情況，譬如走後門，即使你不幹，亦會有別人補上你的空缺，這是十分微妙的問題。

張：可能在大陸實在太多非理性的問題，必須用非理性的處理方法也說不定。

葉：就像走後門吧。這根本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求生技倆。這些事離我們很遠，但對國人，這正是無可奈何，不受自己主宰的事。另外一面，香港的生活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譬如說競爭的環境令香港人習慣了精明，有目標，不擇手段，那份上進心是很強烈的。在國內這是不可能。我認識一位很聰明的青年工人，已經考上了大學，但領導不批准，於是便很不開心的在工廠工作。的確，他的命運非受自己支配，那份落漠的心情是很易理解的；但我和一般工人接觸，問及他們有興趣在課餘進修與否，工友的回答往往是反問學習又有何用？有了技能亦不受自己主宰，那份頹唐是可以明白的。



他們都有濃烈的失落、無方向和挫折感。再後有文革時「雷鋒」式的獻身精神，和爲建設國家而將生死置諸度外的情懷。

張：可能那種不單是無奈，在我的觀察中，國內青年人上進奮鬥的積極性和意志是相當薄弱的。根源極可能是與中國反覆的政局有關，大制度的限制令人覺得爭取也無用，致令他們有自暴自棄的傾向。

葉：國內人普遍是相當短視。可能是歷史告訴他們政策是信不過的。今天行得的方法明天可能改了。不必要是文革的大變化，許多生活小節也是如此。所以他們大多是有一天過一天。大至廠長，書記至低層幹部也是沒能力去改變甚麼的。

張：他們有否覺得心靈是非常虛空的呢？

葉：肯談理想的確很少，包括了幹部至一般民衆，於是便出現了只談現實的風氣，奈何他們可以控制的又是如此的狹小。

張：我覺得空虛的情況十分嚴重，從我認識的國內朋友口中，他們跟身邊的朋友都有濃烈的失落、無方向和挫折感。再沒有文革時「雷鋒」式的獻身精神，和爲建設國家而將生死置諸度外的情懷。思想眞空的情形很嚴重。表現在平常的政治學習上，便是在上課時織毛衣、聊天、甚至睡覺，很不認眞。對於將來，他們只有一些很「實質」的計劃，諸如結婚生子，蓋房子，購置新衣家具，即使短線的理想也再談不上了。

葉：你所指的是普遍幹部的印象吧！在我認識中，最好的一批約四十歲左右，他們眞的很努力的在工作。他們認識到中國停頓了很長的時間，而現時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在領導下的一班青年幹部又未接得上，故此他們都在認眞努力的幹。另外一些高幹部，約六十歲的那一批，俱有很長的革命歷史，有個別也是在努力的工作，但受到體力，年紀的限制，未能接受新事物，所以貢獻有限。而印象最差的就是十九、二十級的一班低層幹部，時常濫用那僅有的職權。

張：當然我所指的是普遍印象，完全不否定國內也有精明、肯努力、肯犧牲的人。只是我覺得他們佔的比例太少吧！

葉：其實最叫我擔心的還是中國的下一代。現在中國人口過多，家庭推行只生一個的運動，造成許多小孩的病態。因爲家裏只有他一個，溺愛過甚，可以說是驕生慣養，很自私自利。只要到幼稚園看看就可感到他們的利害。但是他們就會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

我發覺剛開放的中國就像一個久被困在黑房裏的人。忽然間窗打開了，耀目的陽光令他很難適應，感到很辛苦，甚至寧可關上窗，再過從前暗無天日的日子。

張：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爲中國這一代在經過了十年文革浩劫，社會上的陰暗面都翻了出來，許多親身經歷這些事物的人都被震驚於人性的醜惡，於是對罪惡就更加敏感，更易相信福音。

葉：我想他們對罪的觀念可能是更模糊了，因爲沒有甚麼是非黑白、道德準繩可言。

張：我則認爲兩者均在可能，視乎個別情況而定。也許香港的基督徒跟國內人民對罪的理解很不相同也說不定。比方經濟犯罪，我們會立刻說這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敗壞部份，他們則可能會聯想到資本主義的腐蝕。

葉：我個人一直不相信官方機層宣傳的那一套，說是資本主義在開放過程中污染了我們的幹部。基本上我以爲「物先腐而後蟲生」，必先是制度有問題，在外來的冲激下問題表面化起來。一向以來的特權制度已使許多人看不過眼，滿了憤怒。現在問題擴大及表露出來，却將責任推在對外開放身上，不面對現實自我檢討。這

亦是官方的一貫本色。從前的錯都是四人幫做成，現在則是開放。千錯萬錯都是別人不好，自己沒有問題。

張：我也相信現行的制度是很多罪惡的溫床及成因，但是我相信亦不應單單責怪某一方面。香港不少人只賺千多二千塊錢，平常克勤克儉，却把錢花在回鄉探親上，一擲千金，以大吹大擂自己在港如何成功，如何月入過萬。這種暴發戶的咀臉，客觀上也構成對國內親友的引誘和腐蝕。

葉：當然，我同意外來的引誘是少不免的。但我願意用一個辯證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如今這許多負面的問題已表露出來，如果能正面處理，是能帶來進步的。但現在却只將責任推到外來影響上，不好好反省，只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因爲沒有外來的冲激，問題只會推遲十多二十年後出現，始終是沒有對症下藥。

張：對。我發覺剛開放的中國就像一個久被困在黑房裏的人。忽然間窗打開了，耀目的陽光令他很難適應，感到辛苦，甚至寧可關上窗，再過從前暗無天日的日子。一個極度封閉的社會，突然間開放起來，必然會有種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也有使人難以適應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應該將問題歸究於開放，而應該正視開放對中國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如屬好事，我們必須忍受短暫的不適和惡果，港人也不應不分皂白地數落國內的種種不是。

葉（點頭道）：我也很同意。

張：當一個國家經濟落後到某一階段，再開始對外開放，很難避免沒有不合理的事情發生。這不單見諸中國，亦同時可見於許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世界國家：物質供應不充裕，再加上貧富不均的因素，自然就產生許多走後門，拉關係的現象。

葉：其實回頭看看經濟犯罪這問題。《人民日報》在報導這幾宗哄動一時的貪污案時，主要歸究於對外開放，引致內部經濟罪犯。我却以爲是與社會不良風氣有直接關係。建國初期標榜的社會主義新人，曾掀起一陣追求理想的熱潮，現在這理想一旦幻滅，却沒有東西填補這意識型態眞空。即使沒有對外開放，也必然會有其他問題自動出現。若果從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並不是開放帶來的問題，而是開放加上前述的歷史因素產生這些現象。

張（點頭）：但話得說回來，雖然現時的困難是必然的，但中國必須有內在的調節機能去應付當前的問題。即如一個人不習慣強光，但他的眼球應可逐漸適應外來的刺激。同樣，中國現時的貪污風氣，低效率，洋化等問題也必須要有調節機能去扭轉這情況。當然這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辦得到的，而是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但到底中國是否有這調節機能和制度？我是不無保留的。

葉：現時中國很強調兩個方針，一是打擊經濟犯罪，是肅清黨內風氣的問題，如果不流爲打擊異己份子的政治把戲，這是正面處理問題的良方，如能做得到，肯定是有作用的。其二是強調青年教育，例如「五講四美」，也是積極的表現。但我擔心的如果當政的以這些爲對外問題，只是資本主義的流毒，那就糟糕了。

若中國的命運單由經濟決定，而中國亦決意依經濟規律辦事，則中國必然被逼朝理性化和多元化走，前景相當令人鼓舞。可是，中國的制度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個人實利和封建道統隔合的機制。其組織的嚴密是史無前例的，亦似乎有一種極强烈的自我延續的慣性。

張：拉遠一點說，你對中國的前景有甚麼意見呢？

葉：我想我對中國的前景是不樂觀的。這基本上是個長久積累的問題，我不以爲鄧小平上台就能使中國踏出一大步。就算有很精明的領導，亦需要許多能幹的助手，而他們也需要一羣能幹的幹部，才能使政令能逐步推廣至基層。共產黨管理中國的手法是史無前例的。以前中央的政令去到縣級就止住了，當政的可以無法無天，但現在管理機層龐大，影響力直達生產小隊。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這機構的唯一目標就是自我延續，不讓外力搶奪既得利益者所擁有的。再看中國從來沒有民主這回事，我亦不以爲中國會出現一個獨立的監察制度和機構。這限制了它本身對外的適應，更令許多合理的目標在執行過程中變爲不合理。

張：我十分同意這一點。着名的新左理論家亞爾杜賽爾曾指出，一個國家的前景在乎三個拉力，即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互動，而最終的決定性因素必然是經濟。我對新左理論的認識非常膚淺，亦不盡同意亞氏這個理論。然而，我倒希望他說的會在中國兌現。

葉：爲甚麼呢？

張：理由很簡單。若中國的命運單由經濟決定，而中國亦決意依經濟規律辦事，則中國必然被逼朝理性化和多元化走。而理性化、多元化正是封閉、非理性、獨裁、反民主、單元化和封建主義的死對頭，也是民主、自由、法治之母。這樣，中國的前景就相當令人鼓舞了。

（頓了一頓）可是，我個人有個觀察，不知對還是不對，想提出來大家思考。就是中國的體制不像是以經濟爲主導的體制，而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個人實利和封建道統緊緊溶合建成的機制，一個奇怪的混合體。這體制組織之嚴密可算是史無前例的，此所以當政策錯誤時叫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也可能導致經濟規律所起的積極作用大爲減少，甚至淪爲從屬於這個體制的穩定因子。此外，正如你所說，這個機制似乎有一種極強烈的自我延續的慣性（INERTIA），不容許任何有損體制的影響滲透進內。這樣，嚴密的組織具有濃厚的排他本能，與非正統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水火不容；自我延續的慣性則在很大程度上排拒了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理性化和多元化。換句話說，經濟發展將不能如亞氏所說的驅策中國按客觀的經濟規律前進；而中國亦不會如王炳章（「中國之春」創立人）等人預測的，在老一輩特權官僚去世後，由年青的、擁有「較多民主思想」的人領導下進行「和平改革」。我這個看法，是綜合了蘇聯和中國的發展而言的，自然不能作爲科學的預測。然而，就中國現今的情況來講，「臆測成眞」的可能性是絕不能抹煞的。要是將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眞能打破種種藩籬，朝理性化和多元化走，作爲關心中國的一份子，故然感到十分欣喜。可是，要是中國的機構眞的排斥任何根源的改變，那麼我也只能心死，眼巴巴的看着中國變爲另一個蘇聯了。

葉：我也傾向同意今天的蘇聯即是明日的中國，起碼在可見的將來如是。縱然雙方領導人的思想、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客觀的國際形勢未盡相同，但這兩個國家相似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例如蘇聯亦是沒有經過工業化過程而走向共產主義的。我只希望中國不會走上霸權主義的道路吧！

如果你在一兩年前問我會不會在97年前離棄香港，我必定答不會。但現在我却不敢這樣說。可能因我們都從事中國商務，太解現在的中國吧。

張：既然我們都對中國的前景有所保留，你會建議一些畢業生投身這行業嗎？

葉：香港未來的發展脫離不了中國的影響。香港能否生存下去，在相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發展軌跡。無論畢業生喜歡與否，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大專信徒投身與中國發生關係的行業。這是大勢所趨。早點作準備只會有好處。

張：假如現時有位畢業生要投身這行業，你會給甚麼甚麼勸告？

葉：這個忠告是其他人給我的，就是在開始時要決定是否要作個「成功人士」。假若你要以一般社會人士對成功的定義爲準則，那就要重新考慮了。

張：我認爲畢業生除了一些基本裝備，如對中國的了解，學簡體字普通話外，還要有一定的道德勇氣，和對97早作實際打算。沒了，你未來的取向如果？97年後會留在香港或中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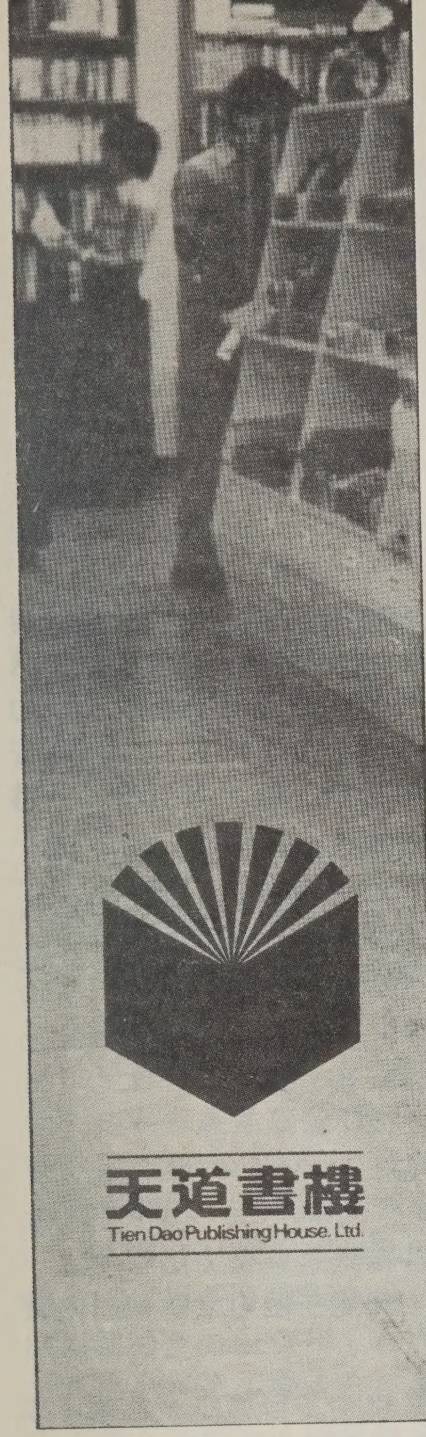
葉：如果你在一兩年前問我會不會在97年前離棄香港，我必定答不會。但現在我却不敢這樣說。我想這是個兩難的取捨，「投奔怒海」勾起了我潛藏的恐懼，直足以與對香港的委身相抗衡。

張：我也很有共鳴。一方面我渴望承擔香港的命運，也深知移民外國的害處，如不適應環境、子孫世代受歧視、需要重新開始建立事業等。但是，與此同時，當我親身體會及參與中國的架構及機制運作時，我便有一種深切的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的感覺。面對着中國，我不禁誠實地反問自己，我留在香港會有作用嗎？對中國、我個人及我的家人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叛逆和崇尚自由民主的性格能容忍中國的非理性至甚麼程度？中國又能容忍我至甚麼程度？年紀少時，我常渴望自己生於五四、抗日等熱血沸騰的時代。可是，當我猛然醒覺97可能是一個更加火紅的年代，而自己却徘徊不前時，心中的苦澀實在不足爲外人道。可能因我們都從事中國商務，太了解現在的中國吧！

葉：在這個混亂的時候，我們實在需要從神而來的召命及啓示。這不是說必須對香港前途有清晰的預見，而是一些信念，以致我們仍能在百般險阻中做個負責任的人。

張：我們今天談了很多東西，從如何投身中國商務，當中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直至中國的前景和個人的取向，我們都作了初步的經驗總結和意見交流。我渴望數年後能有數倍的基督徒，就這些問題作出更深入的討論，爲即將來臨的大時代作準備！

（訪問整理者爲港大學生，《橄欖》編輯。）



變遷中的社會
變遷中的教會

從「天道」看基督教企業

羅惠嫦

天道書樓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前言

自七十年代，本港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商業主義崛起，比甚麼主義也來得動聽。在這個變奏急速的社會和在高度商品及資本化的制度背景下，基督教機構風起雲湧，後起之秀如「中國神學研究院」、「亞洲歸主協會」、「突破」等機構紛在這年代成立；書樓書室、宗教禮品中心等有買賣經營機構也如雨後春筍，門店臨立，好不熱鬧。而這些機構不少採用活潑新穎推前浪的管理經營方式，提供多方面服務，有神學訓練，有文字事奉，有出版發行，有影音製作，有承印服務，甚至有大陸旅行團，有聖地考察……用以配合信徒在這急劇變化社會內的需要，成爲地方堂會的得力助手；更打入非信徒的圈子內，廣傳福音爲使命，對推動教會發展自有一番貢獻。

基督教機構無疑在今日教會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種種服務的層面，對信徒可發揮深遠的影響力，然而，對機構的角色和表現却鮮爲人討論，基督教機構是否應有一套管理模式？買賣經營的原則與手法又是怎樣呢？機構的員工福利是否必然偏低呢？社會變遷對機構經營又有甚麼影響呢？基督教企業會否成爲這時代的產品呢？……基督教機構既日漸與信徒生活息息相關，去了解、去探討其發展前景自是信徒所應關心的。

然而，礙於能力有限，不能以鳥瞰式窺探整體機構的發展，退而求之，採用焦點式，透過個案去反映整體發展，反映現宗教情況。

這篇文章主要分爲兩部份：一透過「天道書樓」個案，藉理解其經營目的、經營方法、發展、困難、前景等等，反映一些現況；選擇「天道書樓」爲個案是基於其在六年「企業化」管理下，有很大的發展和成就，頗有代表性。二就所理解試探討分析基督教機構經營種種及其前景。

爲了完成以上的課題，我們在過去三個多月內，曾先後走訪五人，次序爲「天道書樓」出版部主任陳惠榮先生、曾任四年營業部主任的李玉泉先生（現任基道書樓主管）、曾任兩年多設計的蔡啓仁先生（現自資經營美意設計製作）、曾任四年多行政部主任的沈志超先生（現任葛培理佈道會的行政秘書）及總幹事容保羅牧師。從訪問現任的、曾任的，想必可較客觀、較全面去看「天道書樓」的發展；再就他們豐富經驗去探討基督教機構的發展前景等等。此外，我們還作一些實地觀察和訪問顧客及售貨員。

(一)

我的名字是天道

〝我的名字「天道」，意即「天降之道」，我是一間不屬任何宗派的書樓，我的一切事工，爲的是要高舉天道、傳揚天道、維護天道，我的工作包括出版及發行各種基督教書籍，以及經售各類中英文基督教書刊，並有各類賀卡、裝飾擺設物品等；我的心願是透過這一切的事奉，能供給教會適切和滿意的服務，並且和教會緊密合作，推廣福音事工和推行讀經、讀書運動。〞（節錄自七六年天道之聲之自我介紹）

「天道書樓」是由推廣「中文聖經新譯本」和「當代福音」兩本書而漸漸孕育出來的，眼見今日華人教會有份量的神學、釋經、研經……等屬靈中文書籍甚爲缺乏，且華人寫作人材亦相當短缺，便以出版「適切」、「新穎」、「精采」、「堅實」的書籍爲使命，並發掘及培植有志於文字工作的各類人材，以提供世界華人需要爲抱負，就這樣，書樓輪廓產生了，註冊爲一非牟利機構。

創辦人兼總幹事容保羅牧師，物色志同道合各有專才的同工，分爲四部門：出版部、營業部、行政部和服務部，而董事局則包括各行的專業人士，有牧師、有大學教授、有公務員、有商界人士、有銀行保險公司經理，期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協助「天道」走上一個健康的組織。聚集各方人才，衆志成城，朝着異象，努力耕耘，開創一個新局面。

帶來新局面

當年因沒有任何宗派背景而以「自足自給」爲目標，曾被喻爲「黑馬」的「天道書樓」，却在短短六年時間內，無論在出版方面和其他多元化服務上，確是有很明顯的突破和進步！書室方面，一九七六年於港島開設了第一間書室，一九七九年於九龍開設了第二間書室，一九八二年更在荃灣以分期方式購下基址，開設第三間書室；出版方面，由起初每年只出版四、五本新書到目前出版十二至十五本新書，更加強書籍封面設計，還推銷大量從外訂來的神學書籍；其他服務則走向多元化，除舉辦講座、經售精品，更首創大陸旅行團、聖地考察、承印等服務，是文字媒介以外的服務。及後經一年的思考與籌劃，「天道傳基協會」終於成立，分福音事工和服務事工兩個主要部門，與「天道書樓」爲姊妹機構，隸屬同一董事會。

由此，可見「天道書樓」的過去發展，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就，又豈只是「黑馬」那麼簡單呢？它又有甚麼特色呢？其成功因素又是甚麼呢？以下試探討其經營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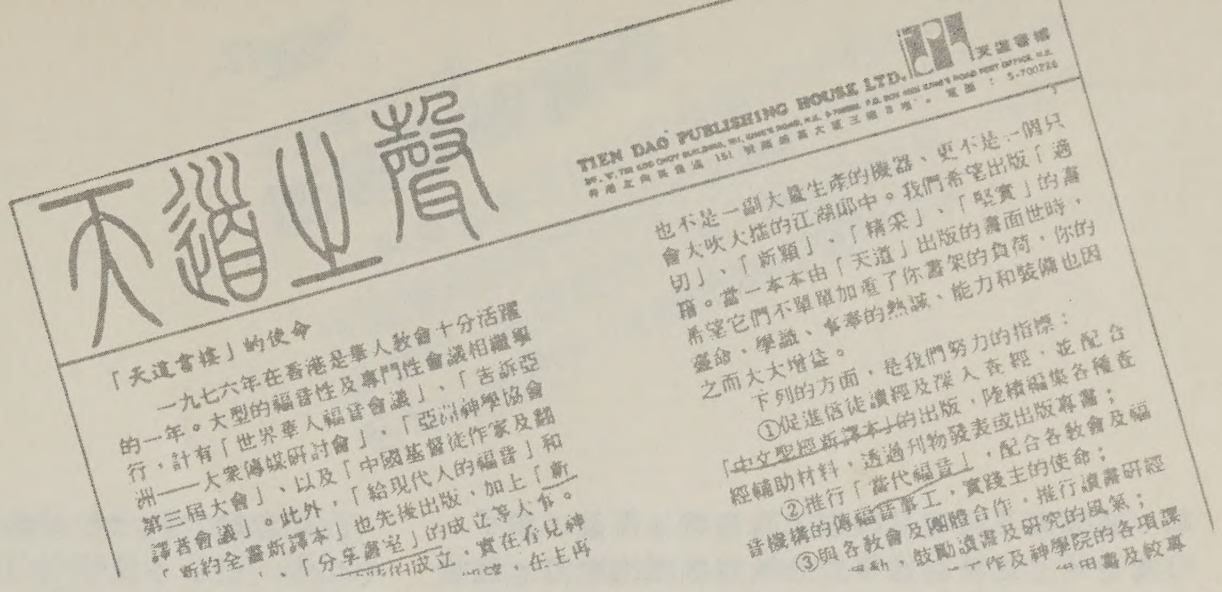
經營方法

自給自足——自足自給是其經營方法目標之一。原定兩年內便可自立，却竟在短短三四個月內實現了「自立」目標！

營業部主任李玉泉又說：「目標應是事奉，手法却是生意才有意義。」爲何手法要比作生意呢？說生意未免有點「銅腥」味兒，他很感慨地說：「如果這門是自己的生意，不是事奉，你會如何經營呢？想一定會很積極，因爲不積極便虧蝕很多，可是，現神的東西則可以彼此包容，任讓它虧蝕，而我覺得這是不可以。」

說到生意，很易叫人反感，宗教怎可以如此世俗化，竟沾上銅腥味來？這點恐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所認同的。李金漢在他的基督教機構行政管理一書曾這樣寫道：〝中國基督徒一般對於「買賣」這個觀念很易有偏見。屬靈事奉着眼點放在買賣上，很易叫人反感。這方面的教育恐怕需要頗長的時間才能改變。〞然而，問題不單是去糾正錯綜的觀念，更重要的，作爲一個基督教機構，如何以生意手法經營而又合乎聖經原則呢？

正如李金漢所說：「經營效率必須列爲其中一個目標，利潤不單是企業家應得的報酬，也是量度企業經營效率及其存在價值的指標。」營利是可看爲經營手法目標，問題只怕營利會漸漸變相成爲機構經營目標（即所謂 GOAL DISPLACEMENT），怕眼光只集中營利大前提而忽略機構的使命。問及營利是否目的，容牧師却肯定說：「營利不是


天道出版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天道書樓」的使命

一九七六年在香港是華人教會十分活躍的一年。大型的福音性及專門性會議相繼舉行，計有「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告訴亞洲——大衆傳媒研討會」、「亞洲神學協會第三屆大會」、以及「中國基督徒作家及翻譯者會議」。此外，「給現代人的福音」和「新約全書新譯本」也先後出版，加上「新[illegible]」、「分享書室」的成立等大事。[illegible]的成立，實在看見神[illegible]，在主再

也不是一副大量生產的機器、更不是一個只會大吹大熾的江湖郎中。我們希望出版「適切」、「新穎」、「精采」、「堅實」的書籍。當一本本由「天道」出版的書面世時，希望它們不單單加重了你書架的負荷，你的靈命、學識、事奉的熱誠、能力和裝備也因之而大大增益。

下列的方面，是我們努力的指標：

①促進信徒讀經及深入查經，並配合「中文聖經新譯本」的出版，陸續編集各種查經輔助材料，透過刊物發表或出版專書；

②推行「當代福音」，配合各教會及福音機構的傳福音事工，實踐主的使命；

③與各教會及團體合作，推行讀書研經[illegible]動，鼓勵讀書及研究的風氣；[illegible]工作及神學院的各項課[illegible]用書及教專

目的，却是途徑，非牟利的意思是它的主要功用不在牟利，若有營利的話，就應放在工作發展上，便不再看作營利了！」

管理模式——天道書樓分工管理方面，走上分工精細的路。聖經中的管理模式，並不寫得那麽顯明和詳盡，機構也有參考別人先進管理方式。容牧師說：「我們只是參考他們的管理方式，採用的時候也看回聖經，並不會盲目跟隨，若眞的完全跟隨的話，是會很冷酷的，往往爲了達到效率，便不惜犧牲一些人。在基督教管理學方面，往往爲了愛心，便不忍心犧牲一些人。我們會根據聖經原則，作一個良善管家、有系統的管家。」

有多年行政工作經驗的沈志超先生說：「在工作形式，機構可能與別的公司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機構則有多一份責任，看守同工的屬靈問題，這點是其他公司很少顧及的，當然，他們會用另一字眼「士氣」來形容，而教會機構也有「士氣」問題，但「士氣」背後就是屬靈方面了，所以，機構有早禱會，建立同心的祈禱；也有分享交流，是屬靈操練！」

基督教機構雖與別的公司有不同的地方，但機構究竟採納些甚麽先進管理方式呢？天道書樓又如何呢？沈先生曾向我們提及道：「天道書樓最初有一個發展研究部門，即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而匯豐銀行則在去年底才成立R&D，這不是指我們有先見，只是覺得有需要。R&D在各方面工作的結果，發現設立獨立部門，去處理文字媒介以外的服務的需要，於是，「天道傳基協會」便成立了！」此外，董事會也提供了很多適切的意見。

服務方面——「天道書樓」的服務範圍日益擴大，由最初出版推廣書籍、經銷精品、發展多元化服務，有大陸旅行團、聖地考察、承印服務等等。

(1)出版書籍：出版的路線、方向與成立過程有很密切的關係。出版部主任陳惠榮先生帶着微笑對我們說：「我們出版部的一貫路向都沒有改變，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透過出版新譯本去造就教會，二是出版佈道性書籍去傳廣福音，使教會增長。其次，爲了配合現今需要，產生不同種類書籍，有信徒生活、有護教學、有教會事工、有神學、有釋經等。」所出版的書籍無疑是有一定份量，並注重封面設計，掀起其他出版社著重封面設計，設計蔡啓仁先生在這方面居功不少。還有，注重宣傳，讓較少看基督教刊物的基督徒，知道有甚麽新書出版。更透過其他媒介來宣傳，如舉辦講座，即如出版「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一書，便舉辦了不少講座，又如設有減價月、買書送書、預訂書籍等。

生命原是不會停滯的，信徒的要求也會日漸提高，營業部李先生有先見之先，購入大量神學書籍，至於選書出版方面，李先生指出：「這要看負責人的眼光，如「用我一生」一書有份量，且又銷路好。但也要教育讀者，去看質素更高的書，問題便在於如何選擇：要決定顧客領導書樓，還是書樓領導顧客。」

我們發現同一時期，出版社一窩蜂出版同一類書籍，陳先生頗有感慨說：「天道沒有存心去競爭，同一時期出版同一類書籍，主要是沒有協調之故，實在有必要減少無謂的重複工作，然而，機構間的合作差不多。」

華人寫作人才缺乏，翻譯人才也同樣缺乏，「天道書樓是否有全盤計劃去訓練作者呢？」我們帶着好奇去問。陳先生却說：「我們是沒有全盤計劃的，主要是看現成人才，在職訓練比較可行，更可鼓勵他們選修神學課程。我們是有很多理想的，但礙於人力、物力的限制，實在無力自辦。」不單寫作人才缺乏，我們也不難發現基督徒讀書風氣並不濃厚，曾作一些實地訪問，顧客多有同感，說所接觸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不喜歡看書，尤其有深度和思想性的書籍，售貨員又告訴我們，銷路最好的書籍多以生活性和佈道性爲主。

「最初加入天道，讓我眼光擴闊了，看到全世界華人基督徒對屬靈書籍的需要，不再只限於香港這一地方。」李先生遙望窗外，略帶興奮說：「天道書樓一向走的是「華人自立」路線，但自立不等於狹窄民族思想，盼望將來可出版英文版書籍，可打入英文界的市場，不要只讓外國人獨佔生意！」

(2)經售精品：一入書樓，很自然被那些設計新

穎，種類繁多的精品吸引，有海報、書簽、鏡子、相架等等，且精品通常放在較爲顯眼的地方，破費些少也在所難免，但想深一層，經售精品又有甚麼意義呢？

陳先生說：「教會書室應否有禮品銷售？這一問題則見仁見智，沒有一致意見，個人來說則認爲不適宜太多。」沈先生帶着一貫的微笑却持有一些個人見解，說：「在近四年多，禮品買賣在教會內可說是一個澎漲時期，美國有些公司甚至不售賣書籍，只經銷精品，而推銷禮品，主要在於實用性、功用性，如鎖鑰扣、記事簿、背經咭，都是採用工具性形式，又如十字架，也可說是基本需要，書簽短文更有提醒作用，其實，教會機構投資資源在這方面，自有一定的理由。」李先生以營業立場說：「賺錢最多會在售賣精品方面，經售禮品用意可平衡收支，且銷售海報、唱片、錄音帶等禮品本身都對信徒有所幫助。在精品方面，往往顧客領導書室，不像出版方面，由書室領導顧客。」聽了他們三人的意見，各肯定售賣精品的意義，却好像仍缺乏一個較全面看法，但相信經售精品仍在很多書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信徒讀書風氣日漸淡薄下，維持收支平衡不得不得力於精品買賣。

(3)其他事工：除在第一期天道之聲，肯定出版書籍和經售擺設物品外，其後的發展是可見到形形式式的活動，有講座、研討會、展覽配合文字事奉，還有大陸旅行團、聖地考察等，服務內容日漸擴大，予人難免有脫離當初所訂立的目標的感覺。

天道會否發展爲一個「包辦」的機構呢？曾在書樓櫃面取閱一宣傳單張，介紹協會有承辦電器裝修工程的服務，「更新會」不是正在做這些工作嗎？我們便將疑問帶出來。容牧師打趣說道：「別人也問我們將來，會否連打蠟工作也接手來做！」稍一正色接着說：「這應屬於服務欄的工作，原有一可靠基督徒託我們承辦，就是「華福」的人求事，事求人。但一發出單張，却發覺這不是我們本身工作，勇於認錯，便收回來。這點很想你們替我們澄清一下。」連隨又問：「服務部究竟是怎樣？」他答道：「我們服務有這一原則，就是別人沒有的服務。就如策劃保險制度，很多規模較小禮拜堂沒有保險制度，便想替他們聯合起來，找間保險公司投保，若需要擔保人，藉着天道已經建立了些聲譽，願做中間人服務性質。若果兩方面滿意我們的服務，而願意給我們一些奉獻，則很多謝他們，沒有也不相干。這並不是爭取自立的賺錢途徑，況且，又不是有那麼多錢可賺！」

發展太快？短短六年內，機構一分爲二，服務多元化；門店增設三間，整體發展會否太快太急呢？

蔡先生就這點補充說：「「傳基協會」成立，可能察覺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性，任何基督教工作，「天道」都希望去做。但恐怕人才不足，且若擴大工作，則可能緩慢出版發展，或有天道出版社在多年後煙沒的伏線。然而，也有可能發展爲一個龐大的基督教企業，這就要看主持人是否眞的有異象了。」

容牧師却這樣答道：「快與慢是觀點角度不同而已，我這領導人願將生命濃縮，便不覺得快，但我不能要求各同工如我一樣，現我們已經開始放慢發展。」他繼續說：「你可以從很多方面說發展得太快，但我也有些個人感受。我覺得時間無多，基督教機構已經落後了很多，要急起直追。記得滕近輝牧師曾說過這句說話：「健康競爭會促使長進」。營業買賣是當顧客有需要，才提供給他，但市場買賣則是相反，顧客並不覺得需要，但我會有辦法講給他聽，令他知道有這需要，市場是可以開發的。近來書樓分店臨立，會否等同搶生意呢？還是大家購買力增加？還是刺激原不大讀書的讀書呢？若是惡性競爭的話，我是會自動退下。」

同工福利——同工待遇是一個很實際問題，但基督教機構却有這同工薪酬較低的特色。沈先生對我們說：「「天道」訂定薪級時，會參考政府出版的薪級統計，從而訂立薪級表。」陳先生則指出：「人工在過去三年內都有調整，調整必須經過董事局批准。」而如何將資金投資發展上或投資在同工福利上是一個權衡問題，容牧師以主管身份說：「加入「天道」工作的同工，先決條件是志同道合，薪金方面則是其次。這問題在於大我小我之分，事奉是放在首位的。無疑，如最近買荃灣基址，向銀行貸款，調整同工福利的速度也相應地慢下來。爲了發展工作，同工必須忍受偏低薪水。其實，天道薪金制度，最高可達到每月九千元，但我自己也未達到！」

蔡先生不以爲然，追述他當初離開天道的原因，說：「由於家庭負擔壓力大，成家立室後添了兩

天道傳基協會
影音訓練課程
爲着培養信徒對影音製作的興趣和知識，
天道傳基協會在四月中旬開辦三個初級影音訓
練課程，每課程共十講，爲期兩個月，內容包
括有幻燈製作，編劇概論及電影語言。

名子女，擔子更重，而我當時的薪金只有二千一百元，已經算是比其他同工較高。其次，工作未能充份發揮自己的理想。」而李先生則遲疑一會才緩緩說：「領導人政策常常轉換，但不明原因，頗感失望。且工作無挑戰性，曾經歷過提昇基督教出版業的階段，但後來不知怎的退下來，當時的營業額也不壞，但沒有繼續出版進深性、神學性書籍。經詳細考慮才決定離開。」由此，可見同工流動量原因在於薪酬、制度和工作本身等。

前景

綜觀以上經營手法種種，可略見天道成功因素。「天道有甚麼成功因素呢？」「但天道也有一定程度的成就，成就基礎又是甚麼呢？」我們連忙說。

容牧師才徐徐地回答道：「撫心說，這是神的帶領，神讓我們有通達的道路，其次，同工配搭是很重要的，此外，管理手法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李先生回味着當初在天道工作，說：「天道當時是扮演了呼喊、先鋒的角色，如當初沒有天道，便不能刺激其他書室著重設計、經營，故有其特別意義。」蔡先生不約而同說：「無疑，在最初幾年，天道衝刺凌厲，有理想，服務多元化，而在人事上，採用打游擊方式，一年、半年換一批。」

但事情不是一面倒的，也有兩面的，既可爲成功因素，亦可同時構成困難，從前部份經營種種亦略見一些隱憂。

沈先生回答道：「越來越發覺有很多東西去做，但發展並不會那麼快速，因合適的同工越來越難搵，機構薪酬與外間機構薪酬相距之大是其中原因，沒有人力資源，工作方面都會受到限制。」蔡先生也直接說：「當機構上了軌道，再採打游擊方式，便不大妥當，可惜，天道至今情況仍是一樣，經常人手短缺，人材缺乏。」困難又如何面對呢？沈先生對同工方面有這看法：「機構可加多些，而弟兄姊妹也應思考自我形象，薪酬是否決定了自己的使命呢？」

至於出版方面，容牧師則抱樂觀態度，說還有很長遠的路要征服，但也補充說：「香港人太忙，閱讀風氣不高，要提醒他們閱讀需要是很困難的。」而陳先生也說了些少個人感受，「內部組織和教會文字事奉都應不斷檢討，其次，要思想機構與教會的關係。」

路不是永遠通達，困難總是有的，遙望將來，盼天道勇於面對困難，以既有經驗、資源、聲譽等，披荆斬棘，朝着異象努力，推動教會發展。

(二)

社會變遷

社會基本上是由很多次級體系（SUB-SYSTEM）組成，每一個次級體系都有它一定功能，但各部份之關係有依賴、支配、交易等模式。每當一個次級體系內部發生變化，自會影響其他次級體系；然而，沒有一個次級體系會永遠靜止不動，社會便是在不斷變遷中。基督教機構在這社會體系，面對其他次級體系的改變，如經濟結構改變，家庭結構變化等，作爲一個次級體系又如何應變呢？從以上「天道」的個案，可反映基督教機構應變的一些現況，就正如蔡先生說：『我想，你們沒有找錯「天道」作爲個案，它經營種種與不少基督教機構有不謀而合的地方。』但問題是否社會其他次級體系牽著機構鼻子走呢？還是機構有帶動作用，走在前頭呢？如容牧師曾強調對我們說：「我覺得基督教要領導社會，不是跟著社會走。且我們應先知先覺，未有問題產生前，我們何不防備一下呢？」然而，要瞭解各次級體系間明確的因果序列並不容易，基督教機構過往予人印象，較採用被動的態度，有若干程度的抗拒，但在社會演變衝擊下，難免地有些相應轉變。在種種相互變遷影響下，基督教機構會否走上基督教企業模式呢？且若基督教機構發展越來越大，其與地方堂會又有甚麼關係呢？我們也與被訪者討論以上的問題。

基督教企業

何謂企業呢？根據王廣亞主編的商科大辭典，企業的定義是：「就是以營利爲目的，結合土地、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作適當的運用。並根據預測，以決定生產方針，藉謀成本之減輕，利潤之增加的生產組織。」簡言之，企業是以營利爲目的，基督教機構既註冊爲非牟利機構，基督教企業是否遙不可及呢？手法企業化、商業化可否足以構成基督教企業成立呢？其次，基督教機構是否不可能註冊爲牟利機構？還有，企業發展的難題在於甚麼？

牟利企業：容牧師說出一些個人感受，回答道：「基督教機構可以是牟利的，但問題是如何運用營利呢？傳統觀念並不接納基督教機構爲牟利機構。但商業化是否罪惡呢？商業化本身是中性，在乎你如何做法而已，手法才是根本問題。」蔡先生也很爽直地說：「註冊爲牟利機構也未嘗不可，很多基督徒商人都很成功，會用另一方式去奉獻。而我自己經營的設計公司，一半替教會做事，收費較廉，一半替外間做事。我也考慮過兄弟班這形式，若機構上了軌道，會分一些股份給同工，派他主管一個部門，使他們有歸屬感。」基督教機構可否註冊爲牟利機構，想仍有很多人在心理上不能接納，但我們有否認眞去思考它的意義呢？這有待大家去深思了！

企業管理：沈先生思索一會兒：「我不知道你們對商業化、企業化的看法。若不套用任何價值觀，教會機構應認眞認識自己的資源，在管理效率方面，應充份應用資源，至於是否有浪費，我想現仍不免有點。官僚架構（BUREAUCRACY），是可以發揮到一些作用，如責任分明，有溝通途徑，制度化管理是一件好事，但僵化了便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管理學價值是無可置疑。

李先生却向提出他個人獨特的看法，說：「我們也可從日本商業社會學到一些功課，日本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競爭者，員工流動量不高，每個份子也可成爲所任職的公司的股東，而香港部份公司都採用這方法。基督教機構員工福利比社會機構偏低，而我自己也有這困惑，我可以「唔食飯」，但其他員工要「食飯」，老婆仔女要「食飯」，去年「基道」書樓便加了百分之二十的薪水，雖同工薪水不高，仍盡量給予。我想，在薪水方面，可學考日本方式。如初成立一機構，可以兄弟班形式出現，彼此薪酬差不多，但將來公司發展得大，可撥若干百分比爲營利，作爲發展事工之用；其他則分作紅利。曾將這些意見與一班弟兄分享，但他們不夠膽嘗試。」至於蔡先生，也贊成企業管理，說：「基督教內人材很多，對於現代化管理和學術認識也很多，在某方面實施這制度是可行的，但基督教機構也講愛心，不可以那麼冷酷。然而，問題是機構採納管理制度，但薪水沒有外面那麼高，且又要員工有事奉心志，這點是很矛盾的。機構應思考同工福利制度。」兩位均不約而同肯定企業管理的價值，但阻礙企業發展的其中原因却在員工福利制度。

員工福利：蔡先生以一貫爽直口吻說：「我想，這方面是香港基督教機構的一個最大危機，你看西方社會爲甚麼發展得那麼快，又可以多元化呢？同工的安定是很重要的！每個基督徒若有事奉心志，不會要求奢侈生活，但機構不能給予同工起碼生活條件，還要在工餘時間做很多工作，結果會很分心。此外，機構有一經濟能力，却不懂得安慰同工，如今年賺了一份基金，便立刻開分店，是否有這必要呢？只是一味地叫同工去捱，去奉獻，結果一班同工做得筋疲力盡，結果一定要離開，而離開對機構本身有很大影響，這是惡性循環的，今日基督教機構未必做得好原因就是在此！一定要有合理待遇才對！」李先生感慨說：「同工薪水方面，不少機構採用拍賣式去鬥平，七百元行不行，同工說都肯，九點至晚上七點，六百五十元行不行，同工心想既是事奉便幹了！」蔡先生更加插一句說：「這是沒有愛心的剝削！」

機構間合作：很奇怪基督教機構合作性並不高，蔡先生說：「我這人甚麼都敢講，得罪了當原諒，而事實就是這樣！基督教出版聯會，開會時各主管都不出聲，若一講錯東西，讓人知道自己的新計劃，便被人「抄橋」，於是，大家你推我讓，不敢提出來，然而，這一切都是屬於教會的發展，但由於個別利益的關係，若做得成功，便有人尊敬自己，若失敗了，便有人罵了，結果，很多意見交流不到，始終沒有長進，大家沒有默契，怎做工作呢？在基督教出版事業，很多時候，某間出了某類書籍，另一間跟風，彼此鬥平，結果則浪費人力。」接着，又說：「我這人一想到便做，便有勇氣去做，最初不能接納我的人，漸漸也接納我，若不是這樣，你又怎能衝擊傳統的東西呢？這方面要如何改變，眞的要想個方法來！」競爭是促進進步，但惡性競爭又如何呢？若果眞如蔡先生說，機構有否認眞思考其使命呢？爲整體發展，還是只求個別機構的成就呢？

呼籲

在結束訪問，被訪者均有些呼籲，現摘錄如下：

容牧師：「機構與教會關係應越來越密切，教會對機構應有足夠瞭解，機構對自己也有足夠約束，不代替教會，其次，商業化、企業化可善用資源，將同工資源發揮到最高峯，最後，多些青年人投身事奉，讓老一輩歇一歇！」

蔡先生：「有三方面，一是思考同工福利制度，二是寫作、翻譯人材的訓練，三是思考基督徒就業機會，有基督教就業研究中心更好，讓有心事奉的基督徒有適當選擇！」

陳先生：「應減少無謂重複工作！」

李先生：「兄弟班構想可值得想想，且員工福利必須思考。」

沈先生：「機構可加些薪酬，弟兄姊妹要思考自己形象！」（訪問整理者爲《橄欖》編輯。）

從福音民歌看基督教音樂

蔡婷婷

引言

香港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她底政治、經濟、文化無時不在蛻變中，內裏隨之而改變的有不同身份性質的圈子和不同的次文化。在這歷史的發展潮流下，基督徒圈子中的文化——不論是教會行政本身，以至個別基督徒的生活行爲——也免不了有一定程度的改變。基督教是一個內外相互發展的宗教，在內着重信徒靈性的培育及肢體的相交，在外肩負神交下的大使命，要將福音傳給萬邦。在這內外的關係的傳達上，詩歌一向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詩歌既爲信徒之間和與非信徒溝通的媒介，它在時代劇變的進程中所作出的回應和轉變，自是不容忽視。

八十年代—轉變的關鍵

七十年代是香港本地樂壇的一段輝煌時期，藉着電視的深入民間，電台音樂節目及唱片騎師的努力，流行音樂成爲香港市民生活的重要一環。唱片業的發展到七十年代末期達到顛峰，本地歌曲的創作熱潮一浪接一浪，特別是粵語歌曲的興起，使歌曲成功地成爲了普及文化的傳遞者。

當金唱片頒獎禮成爲萬衆期待的盛會，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爲大衆所接受的時候，教會的白牆內，却仍響着詞不入曲的「主領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會衆一面努力地把原以普通話寫成的歌詞用粵語唱出，一面仍要叫自己「自然」地去投入那美好意境中。這不就是數年前的「社會樂壇」與「教會樂壇」的對比嗎？

七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蓬勃發展及創作水平的提昇，使基督徒明白地感覺到基督教音樂一直以來的不求改進。身爲基督徒尚且不能投入於詞不入曲的古舊詩歌，無法把二十世紀香港的城市生活與歌曲中的意境連結，而非基督徒面對通俗寫實百花齊放的流行音樂，基督教詩歌又能引起多少的共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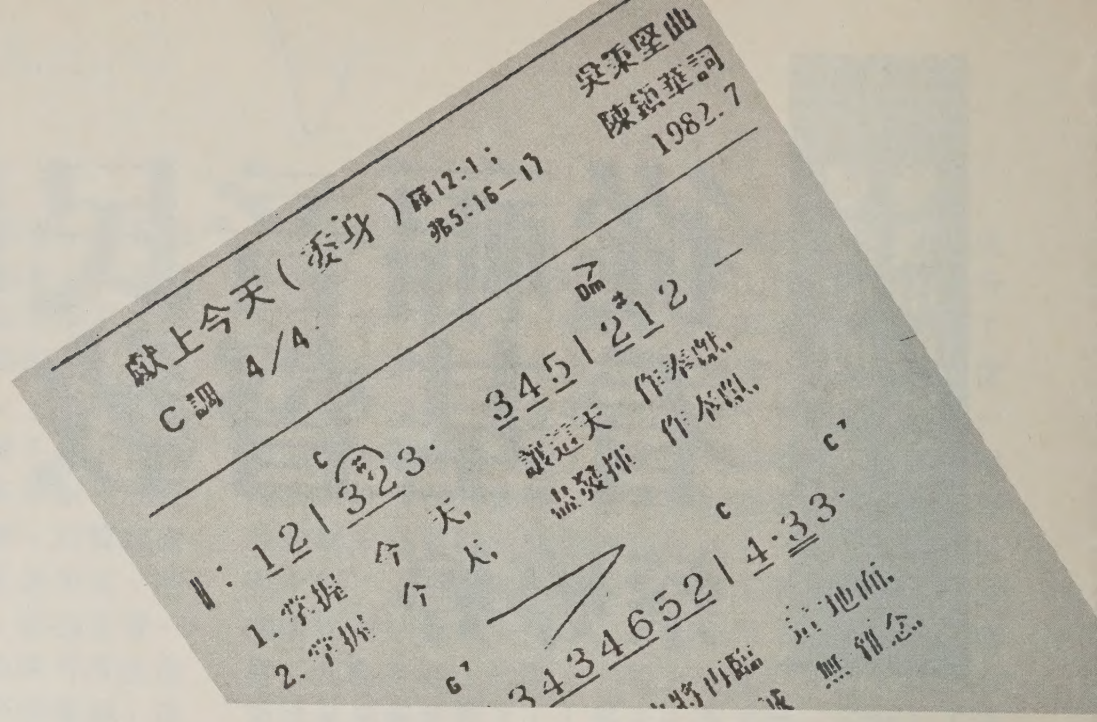
從佈道的角度而言，新一代的香港人能聽能講普通話的實在不多，要成功地用歌曲帶出福音，歌詞必須用粵語塡寫，而內容當然以配合香港人生活文化爲佳。在這時候，合乎這標準的詩歌可說付諸厥如，教會所能做到的，只是用粵語唱出那原以普通話入曲的詩歌，即或偶有新作，亦只是翻譯外國的聖詩。懂得作曲塡詞的基督徒本來就不多，但却連翻譯的技巧也使人不敢恭維，譯成的中文歌詞不能與樂曲配合，詩歌給人的感覺老是製作不夠嚴謹。雖然詩歌中看重的是傳達的訊息，但若因歌詞的寫作缺陷而妨礙訊息的傳播，則似乎因小失大了。你能容忍「主啊我神」，唱成「煮呀我腎」嗎？

踏入八十年代，本地流行樂壇又有一番新景象，的士高及重型音樂已開至荼蘼，新的勢力來自一羣城市民歌創作者，他們所樹立的是「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學院派」清新型象。這股新潮流可說是本地基督教詩歌創作的啓迪者。七十年代無疑是提出了現存基督教詩歌的毛病——不論音樂形式、用詞和內容都脫離羣衆，而城市民歌的興起則刺激了香港一羣熱愛音樂的基督徒對現代詩歌的創作，他們對城市民歌的形式和風格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也意識到基督教詩歌不可能再以舊的音樂形式和孤芳自賞的姿態擔任傳達訊息的角色，於是一同致力創作香港現代的基督教詩歌。由於創作的風格以簡單明朗的民歌路線爲主，所以被稱爲「福音民歌」。

所謂「福音民歌」

福音民歌的內容與一般舊有詩歌無大分別，大都以頌讚、團契、委身、見證、培靈爲主，其中的所謂不同地方，大抵是指音樂的調子和歌詞的筆法。以下節錄兩段關於團契生活的歌詞：

「靈風吹煦，靈雨滋潤，屬靈空氣最宜人，同沐主恩無盡。」《頌主聖歌——主內團契》



「憑愛相親多享受，坦率眞心不畏羞，同聚勸勉長進繫永久，彼此相交樂悠悠。」《齊唱新歌第一集——相親愛》

兩首詩歌都嘗試表達弟兄姊妹相交的和諧氣氛，但手法極爲不同，前者（舊式詩歌）採用較爲抽象的隱喻手法，斧鑿之痕非常明顯；但後者（福音民歌）採用淺白的語體文詞，放棄抽象的比喻，實行把當中的感受直述出來，其中的確避免了好些基督徒「術語」，加強了對一般人的感染力，這是可喜的現象。概括而言，福音民歌放棄了基督教詩歌一貫的古典味道，嘗試用簡單易記的旋律，填進語體化的歌辭，摒棄文言深澀的字彙，務求普及至一般教育程度的平信徒都能接受及明白。

福音民歌除了希望對基督徒的靈性生活有所造就和激勵外，亦意欲以普及化的音樂形式及較高水準的創作成果打入香港的音樂市場，俾能更廣泛地接觸非信徒及更有效地傳揚基督教的訊息，擔任福音預工的角色。福音民歌若要充分地發揮這個功能，一方面是倚賴大衆傳媒的推廣，另一方面則視乎詩歌內容與對象心靈需要的切合程度了。在這內容的切合性上，詩歌創作者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詩歌中強調城市物質生活的泛濫及精神方面的空虛與失落，指出那無助無目的的乾涸生命，繼而揭示基督的救贖及隨之而來的豐盛生命，最後以頌讚的歌聲結束。

誠然，福音民歌的出現，意味着香港基督教音樂的醒覺和轉變，這轉變帶來了新的出路，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一點聽後感

筆者第一次聽這類現代詩歌的感覺是饒有新意，第二次却覺得不外如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變化：不論內容或曲調也如是。

福音民歌的內容始終跳不出大自然的景物與信仰的經歷。前者自然是讚美造物主的大能，後者的框框也非常明顯，自是飽經憂患及心靈空虛，忽嘗主恩滋潤，終於否極泰來。筆者絲毫不否定二者之眞實性，只是懷疑其中的概括性而已。無疑山川天地的奇妙美景的確反映出神的創造大能，但身處香港的基督徒，終日所見盡是高樓大廈，對詩歌中描述的壯麗景色似乎只有乾羨慕的份兒。至於興奮的經歷的確是值得傳達的見證，但絕不可以偏概全，以爲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一個認眞面對生命的基督徒，必曾經歷苦澀的時刻，而信仰歷程上的挫敗固可以是使人愛神和認識神更深的前奏，也可能使人從此背棄神，但詩歌中就絕少以此作題材，似乎聽者永遠不會了解一個基督徒由信至不信之間的那段內心世界，這種經歷難道不能作爲弟兄姊妹的儆戒？這到底是因爲詩歌創作者不接受「反面教材」的觀念，抑或他們深知弟兄姊妹的不成熟而有所憐惜？

福音民歌只有柔和或輕快兩種形式，要想聽得時尚一點的重型音樂固不得其所，甚至流行音樂中的經典如搖滾樂、爵士樂或騷靈音樂、以至節奏輕慢的怨曲，在福音民歌或本地基督教現代音樂創作中可說乏善足陳。究竟是旋律的簡單劃一帶來「民歌」的稱號？或是「民歌」作爲創作的路線以至規限了旋律的變化？若是後一因素，則筆者提議創作者別再以民歌作爲主要路線，與其束縛自己的創作，不如放遠眼光，以發展基督教音樂及拓大它在現代社會中的影響力爲大前題，相信不拘形式所賦予的創作自由，對訊息的傳播大有幫助。

就現有的福音民歌而言，要爲福音作預工有頗大的困難，即使要打進音樂市場也非易事。這主要是由於福音民歌雖然採取粵語的語體筆法入詞，但用詞仍然跳不出基督徒的特色——抽象和觀念化，要非信徒了解「祝福」、「仄徑」、「十架道路」等詞句，他們倒不如一起唱「瑪莉我好鐘意你」和「你的眼神」來得有共鳴。其實，大部分基督徒都

了解用非基督徒文化媒介與非基督徒溝通的重要性，但實行起來却發覺異常困難。因爲基督教文化（或教會文化）一直以來是脫離羣衆文化而獨立發展，只在大潮流中作少許的適應。不但因語言的僵化而不能與非信徒溝通，作爲同時生活於社會與教會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基督徒，也未能充分理解那些掛在唇邊的「屬靈詞彙」。

至於福音民歌的題材過於狹窄，亦令筆者對它負起福音預工這個任務的能力感到懷疑。如果歌曲所針對的是「現成」的基督徒或生活循規蹈矩（兼且身旁經常圍着一羣基督徒朋友）的青少年，相信會起一時的激發作用，但對於一羣完全對基督徒文化陌生、自小流連於新區球場、電子遊戲機中心的青少年，神的「憐憫」、「犧牲」、「大能」，他們能夠領略多少？而歌曲中何曾觸及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傷痛？家庭的破裂、學校生活的變質、人際關係的冷漠單薄，難道只兩句「忘記諸般凄楚，莫再抑鬱悲創」就能抹去？這羣在社會上佔着不少數的「邊緣少年」是舊式詩歌的絕緣體，但作爲革新的福音民歌何嘗爲他們伸出關懷之手？如此說來，福音民歌與那些大唱「你有天才我有天才不必憤慨，人人立志休悲哀，怨恨拋腦外」的「哲理」流行曲，兩者的「勵志」不是一般的浮淺嗎？

基督教音樂現時所面對的是一個充斥着愛情故事的音樂市場。筆者總奇怪爲何千百年來基督教歌曲從沒有提及愛情，友情或親情的亮相率雖亦不高，但總不像愛情，似已成爲千古禁忌。其實，男女相愛，通過婚禮，二人連成一體，彼此扶助，一起在生命上事奉見證神，這原是值得歌頌的，而愛情根本是神賜下的奇妙恩典，偏偏在基督教歌曲中就找不到情歌。教會或一般信徒都會不滿流行歌曲對愛情的渲染，認爲會使人感到茫然或消沉自憐，但即使從事音樂創作的基督徒，也吝嗇於表達信仰賦予我們那獨特的愛情觀。現實告訴我們：戀愛、婚姻是大多數人生命中的必經階段，基督徒也不例外。提出信徒在這方面所需要的提醒並不是誇大其事，與其擔心基督徒被流行曲中的錯誤意識影響，何不實行通過基督教本身的音樂創作，傳揚正確的觀念？這也好教信徒在戀愛中不會錯以違反信仰原則的情歌互訴心曲！

教會，妳的支持在那裏？

上文提到詩歌決不可停留在狹隘的抒情勵志的內容和單一的輕慢旋律上。然而，擴濶創作的領域和創新音樂的形式固然是創作者的責任，教會的支持和接納也是此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教會一直以來強調家長式的教導，反映到詩歌中是一套套的模範基督徒生活。家長式教導其中一個實存的問題是未能設身處地去了解信徒所身受社會文化潮流的衝擊。由於社會的變遷，不同時代的信徒往往遭受到不同性質的困擾，而過份輕視或忽略社會轉變的風潮，基督徒很容易就分割於教會及社會兩個截然不同的時空。因此，筆者認爲詩歌內容必須配合現今基督徒的生活，而教會理應對這因時制宜的做法作出體認和接納。可惜，目前詩歌中反映的只是一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作風，這是否同時反映出教會的固步自封？

另一方面，福音民歌確實打開本地基督教音樂一條新的創作路徑，但那不變的民歌形式却未必值得鼓勵。詩歌創作者滿懷熱心地意欲打入香港流行音樂的市場，爲何竟又同時甘心囿於這個狹窄的形式？當然，這又牽涉到教會及普遍基督徒對音樂的一點錯誤觀念。基督徒在世上自身未能完全分別爲聖，却擅長於把一般中性事物分爲清濁、屬靈屬世，音樂作爲一種傳播媒介也不能倖免於難。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是屬靈與屬世的兩個極端：古典音樂是莊嚴的，流行音樂縱不是猥褻的，也是這邪惡世代所生的靡靡之音。其實古典聖詩的所謂莊嚴，除了指其中神聖的訊息外，也同時是基於它那藝術歌曲一類的音樂形式及瑰麗艱深的歌辭，後二者筆者一向認爲並不是聖詩的唯一表達方式，更不是應該誓死保留的特質。至於流行歌曲被指爲「淫靡」，若是指普通鼓吹提倡的官能感受、短暫的快樂，那批評是正確的，但事實不只如此，所謂「淫靡」更是對流行歌曲一貫的寫實不矯情的作風及新穎的節拍旋律的不接納的一種反應。然而，從傳播的角度而言，歌曲的內容寫實及旋律新穎悅耳顯然是十分

值得推廣的。倘若因保守不接納而指寫實淺白爲「淫靡」，而漠視傳統詩歌因時代變遷而暴露出來的缺點，豈不是甘願把聖詩隔離羣衆——自動放棄傳福音的使命？

以上筆者所言一般對音樂的極端價值判斷雖然並非絕對，但無可否認大部分信徒內心都有這個傾向。縱然近年來民歌形式被採爲本地創作基督教音樂的一種表達形式，但對其他類別形式的創作似仍裹足不前，甚至爲大多數基督徒接納的福音民歌也只能在團契中出現，要想手抱結他「登大雅之堂」，暫時是不用提的了。由此可見教會對新的音樂形式的接納程度依然十分有限。其實最終極的問題是：聖樂要分別爲聖，但分別爲聖是否決定於音樂的類別而非傳達的訊息？

前景

談福音民歌或乾脆說基督教音樂的前景，在未糾正前文提及的一些基本觀念前，或許變化不大，但若從近一點的角度而言，就歌曲製作水準來看，就理應大有可爲。

細心留意最近的本地製作聖詩盒帶，這羣創作者的努力最明顯是在編曲和錄音技巧上，可說達致流行音樂的一致水平，即使大衆傳媒方面的評論也驚嘆一羣業餘音樂創作者的成就和進步。但現時福音民歌所面對的首要困難就是人才的短缺。現時的創作者雖然有小部分受過正統的音樂訓練，大都只是基於自己對音樂的熱愛和所領受以音樂傳達福音的異象作爲創作的動力，業餘創作者的經驗有限，特別是編曲和錄音技巧方面的人才，在香港基督徒中罕如鳳毛麟角，羅致外國基督教音樂創作的人才無疑可作爲一個應付之法，但要眞正發展本地的基督教音樂創作，人才的發掘和積極的培育是必須的。

要求高水準的音樂製作不免帶來傳達訊息和追求音樂藝術兩者的取向問題。歌曲既爲一種傳播媒介，優美的旋律自然是首要的條件，但有時爲要突出訊息的創意和與曲詞的風格配合，說不定在藝術的層次上會有一點讓步。筆者覺得，基督教音樂要倡導的不是完美的經典音樂藝術，乃是要將信仰的眞諦傳達，去觸及人類眞正的需要。

今日基督教音樂在發展方面最大的障礙就是在取向方面走向兩個極端：其一是墨守成規，爲藝術而藝術，篤信音樂的價值在乎音樂本身，不甘爲普及而淪爲「次等藝術」；其二則過分視音樂純爲工具，硬生生把訊息灌進曲子裏，完全不曉得二者配搭的重要。這兩種極端共同形成了對外以音樂傳揚福音的障礙，這障礙正是福音民歌正在努力拆毀中的，但努力的成果和發展的前景仍舊要看教會整體對基督教音樂所持的觀念如何了。

結語

對於基督教音樂，嚴格來說，筆者只是一名門外漢，但作爲基督徒聽衆的一員，筆者深信放棄孤芳自賞的鴕鳥行徑，普及地切實地接觸香港的新一代是香港基督教音樂或福音音樂（GOSPEL MUSIC）所必須面對的現實。

（作者爲港大學生）

錦上添花？
談基督徒辦報
訪問：楊啓昌

基督教文字工作在香港已經有一段冗長的歷史，在這些年間，它的對象幾乎全都是「自家人」（或者是對基督教感興趣的朋友）。至於要成立一間具規模企業化的出版社，出版一些深入民間，爲人所重視的刊物，現在是一個開始，要走的路還遙遠，而且崎嶇隱晦。

基督徒辦報其實是一個自然趨勢。當基督教文字工作不斷發展和擴大領域，它的對象便愈來愈多元化，初期的讀者可能祇有青年人，繼而把對象普及到其他知識份子，甚至家庭主婦，少年人，所以創辦一份以廣大市民作對象的報紙將會是基督教文字工作的里程碑。

辦一份理想的報紙

在開始的時候，必先要強調一點，辦一份理想的報紙不是基督徒的專利品，非基督徒亦可以爲之，祇要他們擁有辦報人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潛質、清晰的辦報理想和正確的態度。

成功的報人好比先知，他能夠掌握時代脈膊，高瞻遠觸，思想敏捷，胸懷廣闊，有社會良心的意識，肩負着監察社會和政府的責任，教育及帶領市民認識社會，改善社會環境和生活質素，他所辦的報紙更影響着整個社會的文化。

就着內容而論，一份好的報紙有兩個部份是不容苟且的。

㈠報導要快捷、準確、詳盡、負責任。
㈡評論要中肯、合理、有智慧。

所以一份好的報紙不但是市民的喉舌，顧及普羅大衆的利益。更提高市民的社會意識，一份有理想的報紙絕不僅僅紙上談兵，它會帶來行動，舉辦讀者活動，跟讀者打成一片，如濟貧運動、旅行；鼓勵並帶領讀者去關心和認識社會。這份報紙是活生生的與市民生活在一起，面對社會問題，一同去思考解決方法，一同去實踐理想，落實的與市民息息相關。

既然非基督徒也可以辦一份理想的報紙，基督徒辦報的價值又是甚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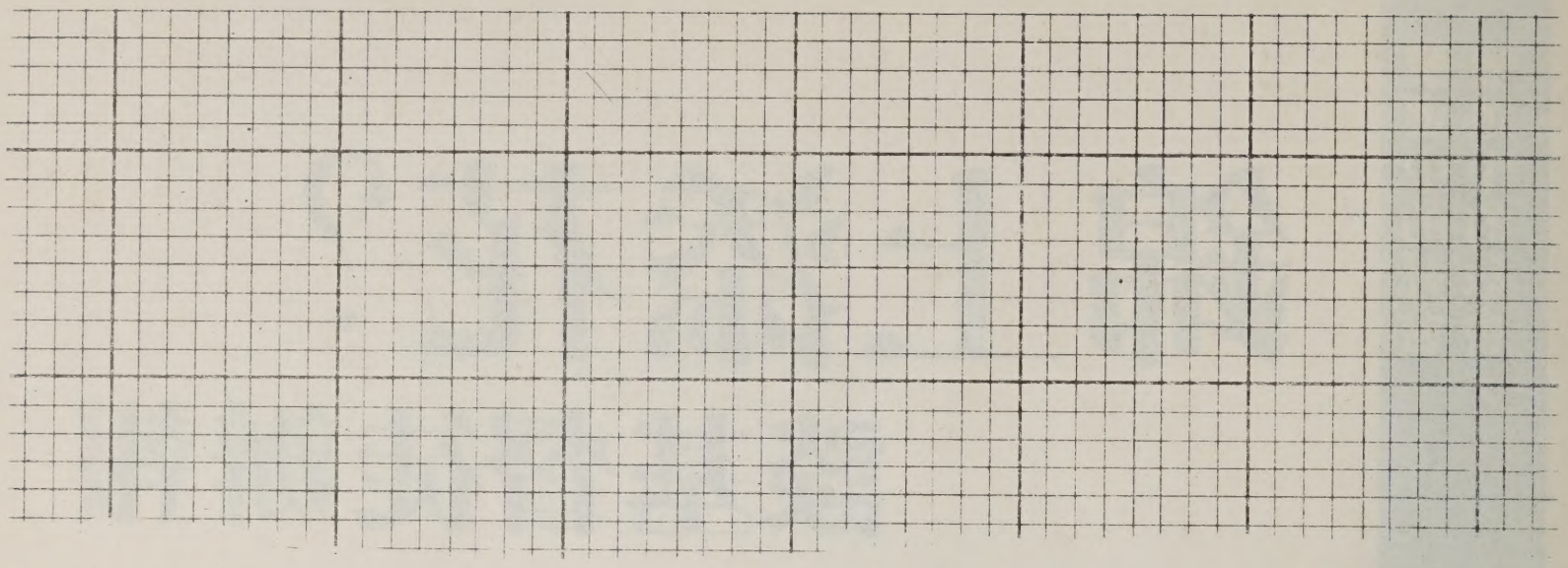
錦上添花

一個眞正的基督徒絕不會把他的生命規限於教會的四幅牆裏面；一個生命有實質的基督徒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活出他的信仰來。基督徒辦報其實是實踐關社，給香港市民看看基督教信仰的具體表現形式。

在世界地圖上，香港的面積比一顆彈丸還要小數十倍，但却出現了不下一百份的本地報紙，所以基督徒辦報紙除了要擁有上列的條件外，還得有基督徒的特色。

㈠職業道德

基督徒記者採訪和報導新聞消息，應該比其他報人更具職業道德，不故意喧染、誇張其事。去吸引讀者，對自己的報導負責任。在新聞報導中，最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做到好像照相機拍照一樣，把實



況完全無誤地記錄下來，絕無個人意見。

(二)智慧的評論

評論的專欄（如社論、新聞特寫、影評等）是報紙申明自己立場的地方。香港是一個民主社會，輿論蓬勃，很多人把握着這個言論自由的權利，對社會事物提出不同的意見和批評，令至許多時候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叫市民無稜兩可，在這樣的情況下，基督徒更有責任去發出他們的聲音；本着聖經眞理，按着自己的良心和聖靈的亮光，基督徒報人在評論專欄中提出中肯和有智慧的批評，給市民和政府意見，幫助社會進步和更加豐裕。

(三)涵養與學養

同一則新聞，在不同的報章裏，可以出現在不同的位置——頭條或是版尾。這裏清楚的說明了新聞的重要性沒有絕對客觀的衡量方法，當中或多或少的也滲入了編輯的個人意見。所以很多時就要憑着編輯的主觀衡量和新聞經驗去評定新聞的價值和重要性，應否給予強調。若果能夠做好的話，這個「客觀中的主觀」也沒有甚麼不妥當，所以我們的報紙編輯涵養和學養的要求十分重視。

至於新聞的着筆和表達，反映着筆者的感受、觀點和對事件的看法；那些該寫，那些不該寫（完全無誤的報導不等如把所有資料，甚至與事件無關的都記錄下來），也包含了筆者的價值觀。所以報人的涵養和學養決定了一份報紙的質素和氣質——正氣還是邪氣。

報紙的副刊也是藉得基督徒深思的地方。讀者的興趣和嗜好似乎已經被以往報紙的副刊擄去和定形了，所以我們的副刊雖然要多姿多采，迎合讀者口味，但却不會無條件地隨俗，完全沒有自己的風格，內容空洞，不過亦不可以走另一個極端，就是太過教育性和嚴肅。我絕不同意我們的娛樂版只有死板的默劇藝術欣賞，每週畫展介紹這類內容。其實報導明星新聞亦無傷大雅，只視乎我們寫的東西是否低級趣味、胡亂煲水、毀謗他人。

要辦好副刊，我們需要更多有創作恩賜的弟兄姊妹加盟，寫一些高水準的小說去取代那些黃色小說，設計和提供一些有高尚情操的娛樂方式給讀者，去打跨那些壟斷了香港社會、廣大民心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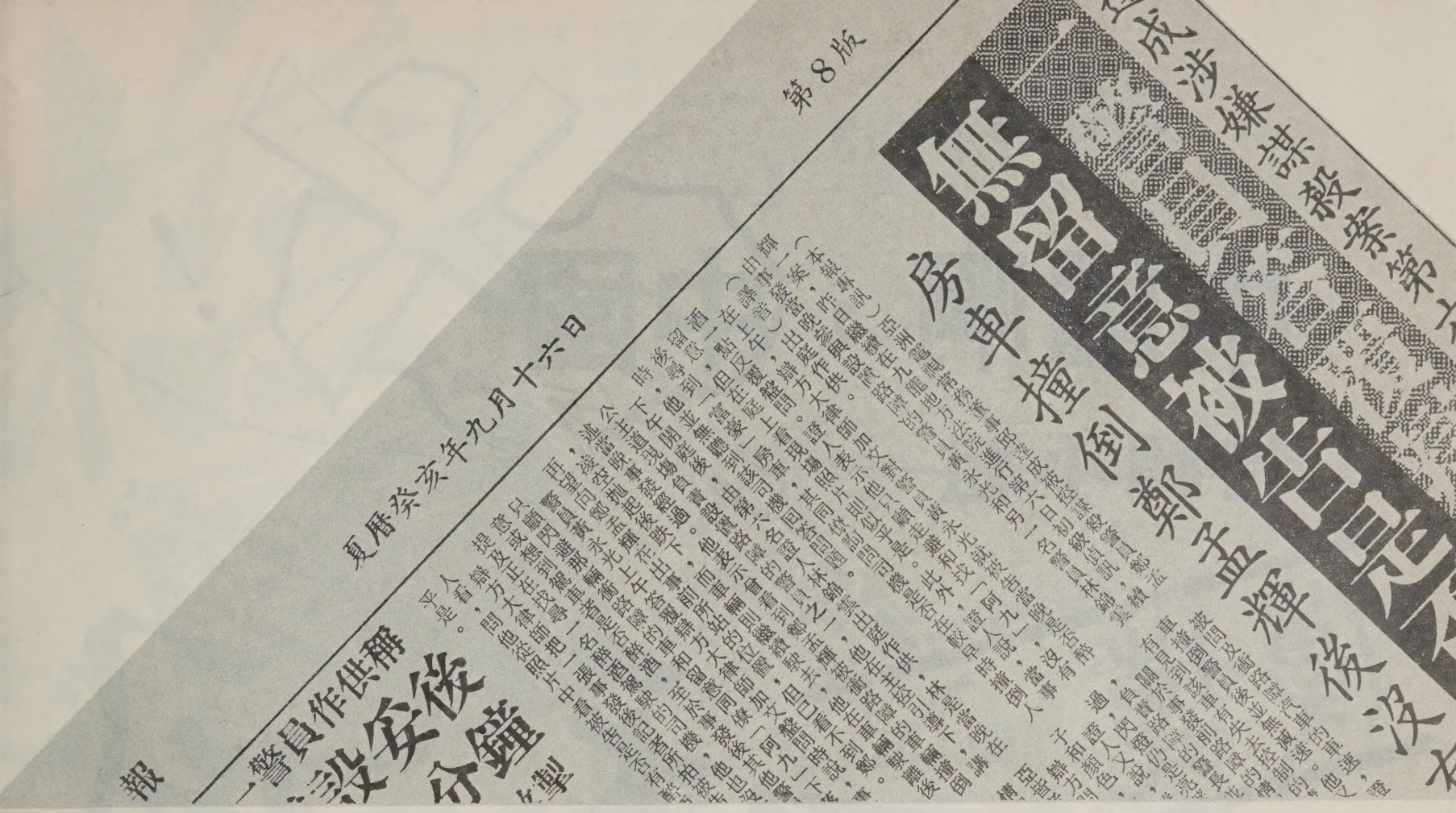
在我的理想中，這份報紙既有基督徒購買，更有非基督徒樂於閱讀；而基督徒購買時也不會因着這份報紙是「自家人」出版的緣故。

按步就班

基督徒要籌辦一份報紙，必先具備四個先決條件：

㈠有一羣關心辦報的基督徒，組成一個核心小組，持抱着同一個異象，爲這件事祈禱，不斷的關心和支持這件聖工，等候適當的時機——人才和資金都充裕——來臨。

㈡有一羣具領導能力的辦報專才，包括總編輯



、採訪主任、廣告主任、營業主任和寫社論的主筆，他們必須爲成熟的基督徒，有學養、有眼光、有見地、有理想、領導和培育其他記者和專業人員。

㈢有一羣肯幹肯學、幹勁衝天、講原則、有專業精神、願意委身的基督徒記者和專業人員。

㈣辦一份充實、有質素的報紙，需要的資金大約是港幣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元，還有一處充裕的辦公地方和印刷機器。

舉步爲艱

要在香港找得一位資深而兼有領導才能的總編輯，積多年新聞經驗的採訪主任，有見地和智慧的主筆寫社論，還有一位具生意頭腦的營業和廣告主任實在有如大海撈針，殊不容易，況且他們必須爲成熟基督徒，令辦報理想的實踐更形舉步爲艱。

籌集資金並不算太困難，我們的報紙可以採用集股的方式，向有心支持的基督徒（更重要是對我們的報紙有信心）推銷。沿用一個完善和具規模的管理制度，使整個經營系統企業化，能夠自負盈虧，獨立生存。

廣告收入始終存在着一個極大的隱憂。我們的報紙跟其他報紙不同，色情和煙酒廣告我們絕不刊登。但煙酒商一向是報界的大客戶，所以這個取捨原則，給我們報紙在經濟上的打擊實在不容忽視。

縱然困難重重，但辦報的意念並未因此而被窒息。一位資深的報人說，現在香港有基督徒共四十萬（包括天主教徒），只要有十份之一的基督徒願意買我們的報紙，報紙的銷量就有四萬份，如果一份報紙在開始時的銷量就可以達到這個數字，已經十分可觀。

理想與前瞻

基督徒作深入民間的文字工作現在還在開荒階段，我憧憬着將來香港可以有一間多元化的基督教出版社，它辦日報、週報、少年、青年和成年人雜誌，還出版叢書，跟讀者論及家庭生活、生理、科學等。我不期望出版社財源廣進，但我的刊物一定要有質素，並且受人重視。

如果可能的話，出版社會另外投資和組織一間獨立製片公司，出版電影，藉着更多不同的媒介去深入社會的腹地。

（被訪者爲一多年從事文字工作的姊妹，訪問整理者現正攻讀中大教育學院。）

中國啊，中國！

特輯小組

CHUAN 傳
ASIAN OUTREACH 亞洲歸主協會中國通訊
傳傳福音廣播
天風
編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出版者：中　国　基　督　教　协　会
上海圓明園路169号三楼

中國，一個永遠令人頭痛却又不能逃避的題目，越來越貼身而且引來香港教會分歧表面化。

假如我們有收集所有香港基督教中國事工機構的通訊和出版物，大抵早就覺察到其中的幾個對「中國教會」或籠統來說對「中國」的立場。事實上，除了部份保守教會對中國不聞不問外（有的是基於年老傳導人昔日慘痛的經歷，有的則出於神學上的自我規限如政教分離，有的更是出於無知），香港有的地方教會或機構會比較接納三自教會，另一些則視三自爲共產黨統戰部的傀儡，較多報導及讚揚家庭教會及「自由」傳道人，與三自的「正統」路線對立。

這些年來，這些不同的機構各自做自己的工作，一般來說有研究、出版、廣播、宣傳等，彼此甚少往來，宣傳時大家也很客氣，通常只會婉轉地表示不同意某方面的看法而不會正面點名批判，但近年自從中國三自領袖們多次出國訪問，對外接觸比較多以後，再加上九七問題變得熱門，模稜兩可的立場必須撤換成明確或正或反的立場，亦因而使分歧從隱藏移化表面，甚至含有攻擊對方的成份。

舉例說，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便因不滿意許多機構單方面報導家庭教會情況，於是新出版了一份消息性刊物《橋》，多報導三自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消息以作抗衡，另外它出版的《景風》，在七十四期（83年6月）更以張亦非的筆名，質疑另一機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估計之大陸信徒數字的可信性，指該中心不科學的誤導其他機構及信徒，甚至暗示香港遠東廣播公司誤用資料以求籌款。此外，香港福音證主協會83年7月至8月的《守望中華》更加是「劃清界線」，指三自是「新派」、「不認爲需要傳福音」的，差不多說成「不是弟兄」，又指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爲三自會在港的「代理」，暗示它們危險云云……

現在，中共的三自會差不多視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爲香港教會的正式代表，又多方對福音派基要派教會進行統戰工作。大多數教會及機構都冷漠回應，僅有一些較年輕的機構領導人有保留地與之交往。總之，目前的香港教會狀況，除了徬徨愕然退縮外，便是混亂分裂。不錯，對大部份地方教會來說，在現階段暫時仍可保持緘默，但當中國把香港的主權治權都收回時又怎樣呢？近兩年的甚麼教牧研討會神學生日等都有以九七爲題的討論，一般都只有空泛的看重會友靈性栽培啦、趁最後自由傳道機會傳福音啦等口號，至於甚麼弄清國家政治社會觀、嘗試新教會模式等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總言而之，教會對這政治可能有的轉變的投入都很稚嫩，更遑論爲中國教會摸索出路。

這樣的批評並非一時意氣，又或者只破壞不建設，事實上，《橄欖》所關心的便是我們青年信徒對此的一無所知，又或者迴避不理。我們必須承認，在香港這塊土地上，社會制度、風氣潮流、教育

出 版 者：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編　　輯：鄧肇明
地　　址：香港沙田道風山
沙田郵

編輯□〈驛〉編委會
通訊：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1456號

你看過這些有關中國教會的刊物嗎？

制度等在在都不鼓勵人作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分析與反省，學校從小至大從來不著重政治社會公民民族教育，傳播媒介中稍有政治色彩也會被禁被剪（連《家在香港》也被剪去八分鐘非色情非暴力的鏡頭！），也許有一天過一天、隨俗跟大流是很可以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亦因之而來，我們這一代的香港長大的青年弟兄姊妹實在很難掙脫這些思想箝制，突破那份蟻民心態。不錯，要培養民族感情，對中國對中國教會有超出夢幻式委身的投入是需要極大決心與努力的，但要若不如此，我們只會永遠任人擺佈，沒有完成主託我們治理大地的使命。

今期推介的幾本書，並不意味讀了便能立時通曉中國教會，但在不妄亂隨着別人走的基本信念上，相信也可以給我們一些較客觀的看法。當然，《橄欖》會毫不猶疑的推薦校園出版社新版的《誰爲神州理舊疆》，福音證主協會出版的《守望中華》文集《浩浩恩雨沛中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香港前途與香港教會》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中國基督教史綱》，但其下推薦的，更是一些較有洞見的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反省。鑑前車，警後轍，能看較學術性文章的大專弟兄姊妹，別忘了看完後作出全面的反省，再把心得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

在各方面互相指責的氣氛下，求神給我們大專信徒獨立的思考，屬靈的洞見，看清楚主要我們怎樣做，好去承擔補足教會的一切缺乏。

敢言、直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勇於承擔責任，願主替香港教會預備更多守望者以迎接九七，更願更多弟兄姊妹起來，計劃、摸索整個中國教會的前路。

中國啊，中國！七十年代開始，大專界帶出認識祖國的方向，而《橄欖》也扮演過先知的角色，把中國及中國教會問題帶到教會圈子。今天，香港研究和推廣中國關懷的教會機構已然不少，但時代亦已由一個重新認識的階段發展到立場抉擇的地步。對香港衆多宗派堂會以至個人來說，除非我們深信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治權後香港眞的可以維持現狀，「馬照跑、舞照跳」、「教照信」，否則，去或留，走三自的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路線抑或化整爲零的學校家庭教會的聚會形式等便要成爲切身的考慮。中國領導人曾揚言必定在八四年底前宣告香港前途的具體方案，究竟在這段中英政治對談的僵硬硬氣氛下我們應如何自處呢？而香港教會內部與及海外華人又怎樣看急中國教會呢？《橄欖》在這方面仍然未有定論，且看神將如何引導我們。今期刊載的文章只作參考，純屬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橄欖》或者港大團契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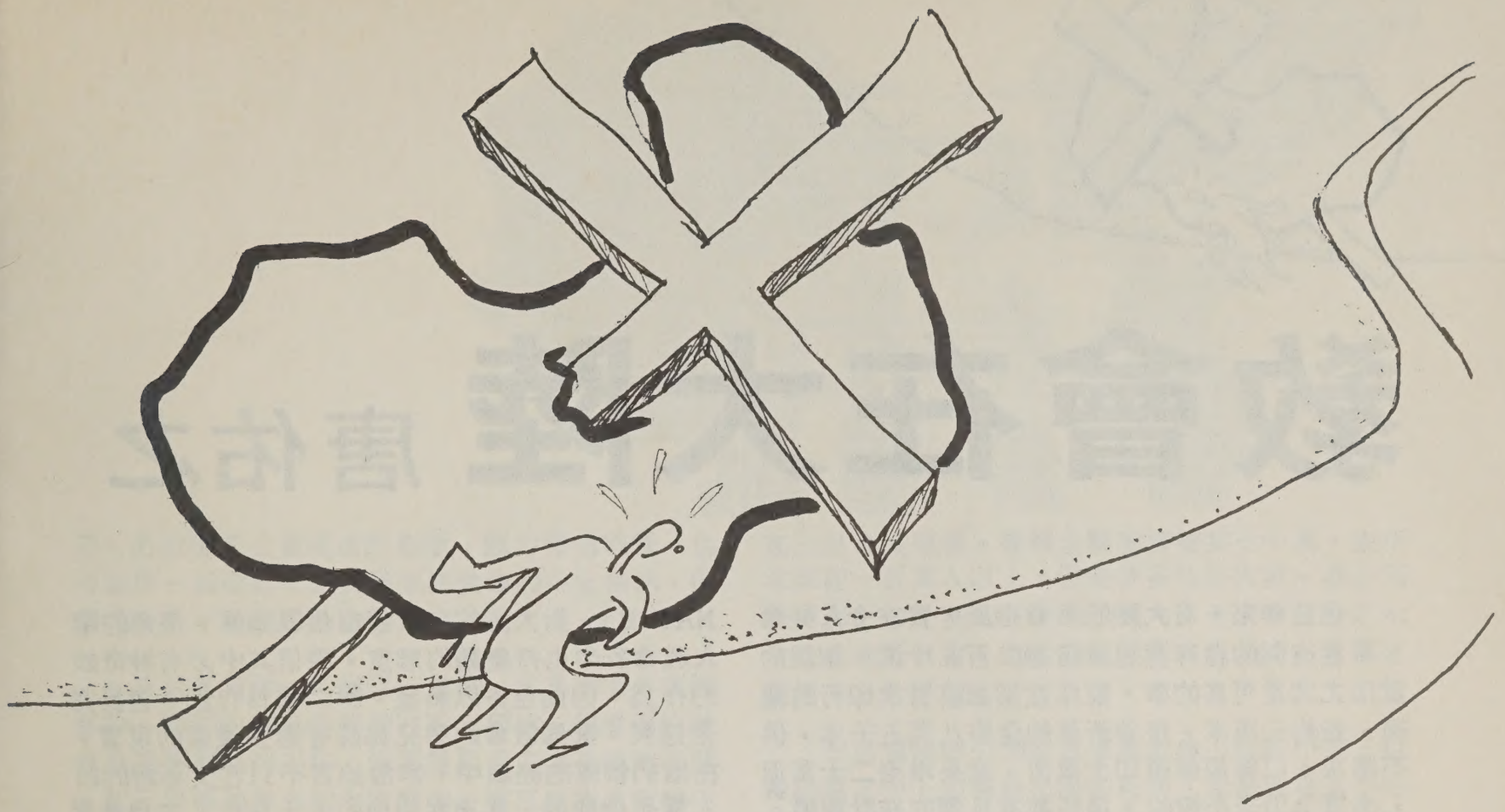
認同與承擔
七十年代的反省

余達心

七十年代可以說是覺醒的年代。在七十年代裡，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浩劫，以及其後的權力鬥爭底噩夢中驚醒起來，在尚不及回首之時，她又猛然覺悟到本身的貧窮落後，務要迎頭趕上四個現代化。海外華人滿懷熾熱的“認祖”感情，也察覺到“認祖”所需要付出的承擔。中國在六十年代成功地製造了第一枚氫彈，又在七十年初登上國際舞台，這的確使到海外華人頓感驕傲振奮。“認祖”於是成了一種口號、一種時尚、一種趨勢。在這個情勢底下，樹立起中國人的身份，就彷彿好像必然要認同共產中國。至於，反省檢討中國內部的基本問題或批評共產政權，都給視作逆流。可是，縱然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事件還歷歷在目，但是却不是以使到海外華人覺醒中國內部的問題和矛盾。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近年來，坦然呈現大家的眼前，就不能不叫人深思反省了。眞正的認同並不是任何的口號，而是有認識的，透過反省，抱有承擔的態度。所謂的承擔是指願意負起對共產政權作出建設性的批評，以至探討中國文化重建的責任。由此可見，一面倒地歌功頌德共黨，視爲認同的表現，實不合時宜了。

七十年代也可以說是華人教會覺醒的年代。七十年代期間，華人教會才開始正視共產中國存在的事實。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中，大部份的華人教會都視共產中國如一場噩夢，從來不敢提及共產主義，或者反省共產政權裡的神學和歷史意義，並且在制定福音策略和憧憬教會的未來中，也不把中國大陸計算在內。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最初一些有關中國大陸教會情況的傳聞，便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以後繼有一連串的傳聞、故事，接踵而來。自此，在各地區便逐漸出現了爲中國信徒和教會禱告的行動。而“中國研究”也就成爲了華人教會熱門的課題。不過，許多關於中國及中國教會的談論以至研究，都來得非常感情化，其中不乏浮誇的言詞（RHETORIC）。以一九七四年在BASTAD及LOUVAIN分別舉行的會議爲例，會中評估及探討“新中國”與其神學和歷史的意義都表現得過份樂觀。又一九七五年在馬尼拉舉行的“主愛中華”會議中，感情蓋過客觀的分析和反省。不過，無論怎樣，由此可見，教會願意對中國作出認眞的反應，已是可喜的現象。

香港有不少的基督徒，爲了擁有中國人的身份、有承擔中國歷史前途的責任、對共產政權該抱有何種的態度、教會在中國重建方面可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曾有不少的掙扎、激辯與反省。對於香港的基督徒而言，這些問題就更來得眞實和尖銳。在心態上，香港人跟星加坡或馬來西亞的華人並不一樣。不少香港人甚覺得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認識到個人的身份，以及香港的文化、歷史命運是與中國緊密相連的。再者，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就更加令到香港人覺得香港至終都是屬於中國的。除了有少數的人大可以一走了之外，大部份的香港人面對中國收回主權的問題，大概不外抱有兩種態度：一就是基於認同中國的大前題底下，只得任由共產政權替中國及個人塑造歷史方向，這是消極的看法；另外，於認同中國之下，積極參與塑造中國和



個人的歷史前途。看來二者都需要有承擔的責任，而後者的承擔較前者爲深遠。

對於香港的基督徒而言，承擔中國就來得更沉重呢！作爲有責任感的中國人，就要承擔重建中國的歷史責任；又身爲基督徒的中國人，就更要負起向中國宣講、見證神的使命。然而，基督徒面對着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基本衝突，就不能不問，處於共產政權之下，認同中國到底包含了甚麼意義？雖然聖經要求信徒順服掌權者，但是他們又認爲掌權者所擁有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當認定神握有絕對主權的時候，基督徒就不能不批評掌權者將個人的權威絕對化，因爲“批判權力”（CRITIQUE OF POWER）是基督徒肯定神有絕對主權的引申。可是，建基於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的共產政權，要求治下的人民絕對信服共黨，並且要實踐這套思想所蘊含的一切。由是，基督徒迫得時常處於絕對信服神與共黨的衝突之中。在這個局勢之下，基督徒認同與承擔中國可有不同的意義了，而這種認同與承擔可又帶來不同的後果。在這認同與承擔底下，基督徒所背的十字架眞的成了事實。基督徒一方面要計算保持基督徒身份所要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又要衡量參與塑造中國文化歷史前途所要作出的犧牲。可惜，有不少的基督徒的想法都很消極，態度相當被動，以爲存共產政權下只有爲了保存基督徒的身份，難免要受一點苦。由是，所謂“爲主受苦”的含意只限於此，而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對國家、社會、政權所肩負的先知責任。如果基督徒準備要爲主受苦，就必須擁有實踐作先知使命的受苦心志。基督徒可有資格作先知嗎？尤其在共產政權之下呢？相信這問題較其他的問題更富挑戰性。共產主義之所以興起，就是因爲資本主義猖獗、帝國主義橫行，而只有共產主義負起不正是指出基督徒要履行先知責任必失敗的歷史事實嗎？基督徒要思想共產主義的歷史意義，也得要一併把失敗的可能計算在內。

過去數年內，香港有不少基督徒曾爲這些問題激辯過，面對許多掙扎。其中較尖銳的問題，就是在認中的前提底下，香港基督徒對共產政權該抱有怎樣的態度。認同是否就是否定了批評？又基督徒憑着甚麼的經驗對共產政權作出批判？面對着這些問題，中國大陸的基督徒所抱的態度與自省可否作爲參考呢？

探討這些尖銳的問題，却主要只有一份學生刊物獨力承擔，這究竟說明了些甚麼呢？這實在很值得教會長執好好反省一下的。

（作者現爲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

教會在大陸

唐佑之

這三年來，看大陸的教會進展，實在令人興奮。正在復開的禮拜堂已經超過二百五十間。聖經的重印尤其是可喜的事。前年在聖誕前首次印行的聖經，新約五萬本，接着新舊約全書八萬五千本，供不應求。以後原擬續印十萬冊，結果增至二十萬冊，事實上仍是不夠的。這些都有具體的統計報導。至於家庭教會人數之衆，以及由海外携入的聖經及屬靈書刊之多，更無法計算。三自會忙於編印書籍，並在南京大學的宗教研究所設置傳道訓練之課程，以供應各處教會的需要。我們在海外的信徒興奮之餘，是否應該再作密切的注意與深究呢？因爲我們必須看清我們的責任。

解析三自會動向與目的

三自會從一九七九年恢復活動，一直到現在，有幾項行動，說明他們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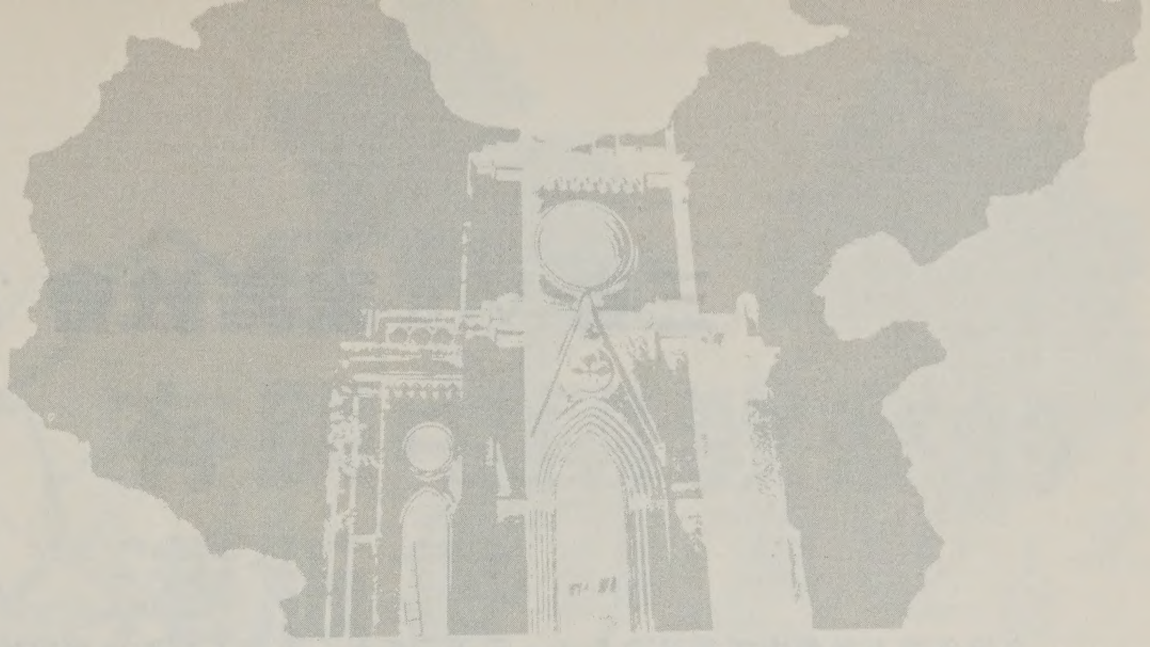
㈠**重申宗教自由**—那年秋天，三自會的代表應邀來美，參加世界宗教和平會議，之後在美國東西各地訪問，特別強調大陸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宗教的迫害只在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的錯誤。政府始終允許宗教自由的。這樣說法至少有兩項目的。

第一要改變海外人士對共產政權的觀感，去掉成見，有助於中共四個現代化依靠西方科技與經濟援助的目的。這是統戰的任務，必需達成。第二，他們在國內重申自由的用意，爲要贏取在大陸的家庭教會重建對政府的信心。開放教會就是以事實勝過雄辯，證實宗教自由的眞象。第一項目的大致是成功的，三自會的活動不遺餘力。在去年春天，組中國基督教會代表團訪問香港，九月香港基督教聯會應邀組團訪問大陸。十月三自會與天主教代表訪問加拿大，參加加拿大教會協進會的會議，提指「新的開端」。海外的西方教會本來就十分天眞（NAIVE），對大陸的宗教自由信以爲眞。海外的華人教會多半也持樂觀的態度，深信其中必有神奇妙的作爲，因此也寄以熱望。第二項目的就不容易完全達到。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有過去峻嚴的現實。在他們慘痛的經驗中，宗教迫害不只在文革時的四人幫所促使的，甚至在以前的五十年代，三自會還爲政府「幫兇」，加以迫害，他們仍舊不能十足相信這自由。以「四人幫」爲理由的，尤其是很愚拙的政治謊言，很難取信於信徒的。共產政權是換湯不換藥的，容易欺騙外人，却瞞不過身臨其境的人。

㈡**確立三自原則**—重印聖經無非強調「自立」，這樣可以名正言順地拒絕外來的聖經。聖經由海外親友帶入與郵寄，又有若干西方的機構計劃大量運入，早已成爲大陸當局一個頭痛的問題。去年六月「洞開的門」這機構偷運百萬聖經往至廣東汕頭，更增強他們的說詞。以「三自」爲名重印聖經，實行限制聖經的帶入與流通。

爲「自傳」的名，來劃一教會的信仰與組織，設置神學教育的函授課程，是三自會又一貢獻，在招收學員方面，首次僅限四十名，教育程度及思想背景都在考慮的項目。宗教研究所出版的函授課程共十二輯，計劃每年續出十二輯。這一定與讀者對象有關，大陸的基督教力量究竟是在家庭教會，必須有保守的信仰，才可發生功效。在課文中避免進化論的神學論調及社會公義等問題，確是經過很聰明的設計。以後的課程呢？現在無法斷論，是否會照東歐基督教思想的模式？或採取南美倡導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以符合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這些都值得注意。

前幾年盛傳大陸重譯聖經，三自會組織也承認這事，目的在於將經文現代化，語體與人民日報相仿，而且也防止現代新譯本進去，怕新譯本有些詞句，是帝國主義我資本主義的用語，不適合人民的思想，但是目前他們重譯的工作尚未完成。聖經重



印，仍取聖經公會現成的紙版，既可節省經費，也可取信一般信徒，尤其是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究竟信不過重譯的聖經。

在自養方面，三自再三強調，尤其摒棄外來的幫助。他們的觀念仍停留在五十年代，對外面的教會及差傳宣教的工作，仍認爲與西方文化侵略有關。在三自領袖發表的十四點中，再三反對外來的任何有福音目的之舉動，決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控制。大陸福音的門實際仍沒有洞開。

㈢**自三自至教協**—三自會領袖在海外訪問時，一直表明家庭教會是四人幫逼害的產物，却認爲與三自毫無對立衝突的成份。這難免是想對海外掩人耳目的方法。事實上大陸信徒在五十年代就遭逼害，受三自會的陷害，是有目共睹的，當然三自會儘可美其名爲「反帝」來作清除的工作。三自會重開禮拜堂，爲爭取家庭教會（其實不是爲爭取，而爲控制）。但是他們也知道三自的形象已經在信徒心中十分惡劣。這連政府的宗教事務局部都知道，所以另外設立「中國基督教協會」。名稱不同了，似乎更可理直氣壯發揮自立自養自傳的理想。當然與外界接觸，尤其是與普世教會協進會可以維持正常的關係。

教協的負責人明是三自的領袖，雙管齊事，對內對外似乎更加有利。三自領袖現在最感頭痛的，在外面有海外福音派的教會，在內裡有家庭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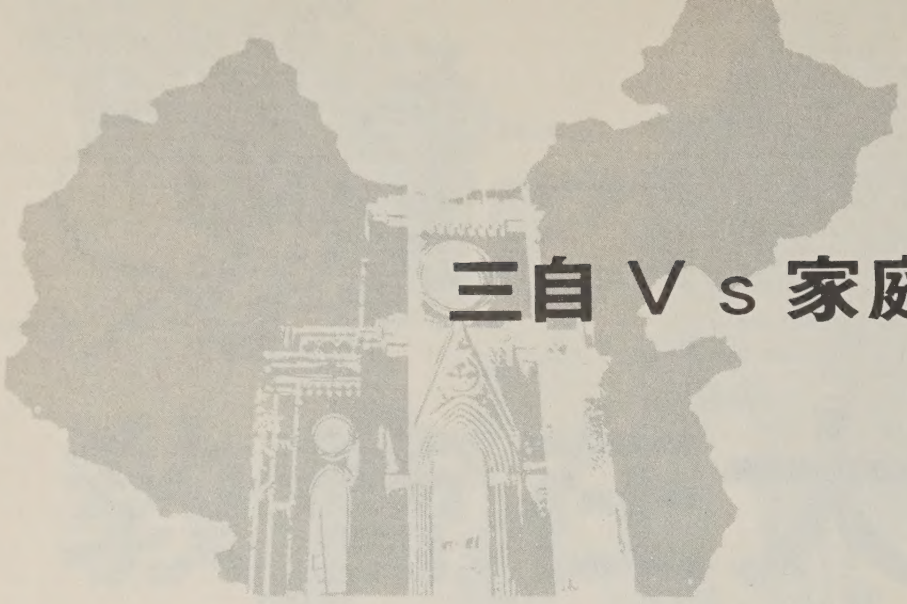
三自會一直低估家庭教會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發現重開的禮拜堂有那麼多人來聚會，是意外的驚奇。再從外邊聽聞家庭教會的活動，更加驚覺。他們在海外訪問，許多人問起家庭教會，他們也只得裝作十分了解的樣子。在大陸的政權當局一定也給他們相當重大的壓力，促他們控制。

在一九七七年有人到大陸去，想知道家庭教會的實況，據三自領袖（三自會還未正式恢復）說，家庭教會只在鄉市、城市並不存在，上海市根本沒有，去年有人再問他們，他們說上海大概有二百間，人數在十萬人以上。可能實際的數字還要更大。在三自會復原後，聲稱全國基督徒共七十萬，去年承認在一百萬人以上。但是許多往訪大陸，存心調查研究，估計在五百萬至千萬人，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在家庭教會，雖然無法證實，人數在一百萬之數倍，必有可能。

三自領袖會公開指責家庭教會，認爲不在三自會組織之中，仍稱是反叛的行爲。但是現在又不得不加以安撫，否定矛盾，力求合一，只要求家庭教會愛國，並堅持三自的原則與方針。在「教協」的名義上，供應聖經書籍的及傳道人，更是名正言順的事。有些家庭教會確向三自完全開放，加入教協。有的却仍存觀望的態度。其實家庭教會重開始就自立自養自傳，在勞動生產一直就有好的表現，並且守法毫無叛行，（至於他們是否贊成中共政權，那是另一回事。）家庭教會在福音上努力，也實在是應人民普遍的需要。「三信危機」已經十足反映人心的虛空，需要宗教信仰！

研討海外教會回應觀感

海外的西人教會大多對三自運動持正面的態度。在自由派（或稱新派）的教會（大多爲普世教協的）認爲毛澤東思想符合聖經眞理，人民翻身成爲「新人」（NEW PERSON）。文化大革命是救恩歷史（HEILSGESCHICHTE）的延續。人民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十足千禧年的理想。以後四人幫倒台，他們仍沒有推翻原來的論調，因爲在基本的態度上永遠與共產政權站在一起的。所以三自領袖來美前，已將解放神學的書籍全部裝箱運去，貴客來訪尤其興奮。這些海外西人教會自動爲三自宣傳，並且不住讚揚，却對家庭教會採取懷疑的態度，尤其認爲家庭教會不足置信。當福音派教會提倡信徒到大陸去，帶着科技傳福音，他們就極力反對，他們的理由是政治與經濟的方法在這樣理想的政權中，不容人們以宗教的途經橫加破壞。到大陸去，不可有任何傳福音的意圖。



三自Ｖｓ家庭教會？

在海外西人教會中福音派的人士，因着近年教會的開放，反共的意識隨着消弭。神已應允多年的祈禱，福音的門大開。三自領袖是神忠心的僕人，在風雨中保守教會，功不可沒，家庭教會發展也是好事，應儘量扶持，以後能參加開放教會就達成理想了。當然有些福音派的人士不會那麼天眞，因爲三自領袖公開反對聖經進入大陸，反對廣播進入大陸，也反對科技人員進入大陸有福音的意圖，那些領袖究竟有什麼信仰？是怎樣的信仰？值得質疑。

在海外華人教會呢？信徒曾在大陸政權下生活的，大多是持懷疑的態度。最熱衷的是在海外生長的，尤其有華文基礎，要發展民族意識。他們甚至去過大陸短期旅行，看到祖國風光，及一些有限的景象，回歸與認同的心更強了。他們不願再聽見任何反面的說法以及反對的論調。他們既缺少政治認識，也不想將共產主義以堅定眞理來衡量，只要有福音在大陸就好了。致於三自的論調不難加以分析，一切形勢看好。

三自領袖表明在大陸的教會，宣教工作已成過去，宗派分歧也不復存在（ POST—MISSIONARY AND POST—DENOMINATION）。這是多麼令人興奮。今日還在談宗派，難免落伍，宣教事業既與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相連，大陸摒棄這些，實在值得稱道。三自會提倡自主獨立，完全本色，確是中國教會的路。他們甚至強調中國教會有主權，福音工作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其實福音的主權是在主手中，教會本身那有主權呢？這並不合乎聖經的眞理。而且海外信徒必須認識，大陸福音的門實際上沒有打開，仍是關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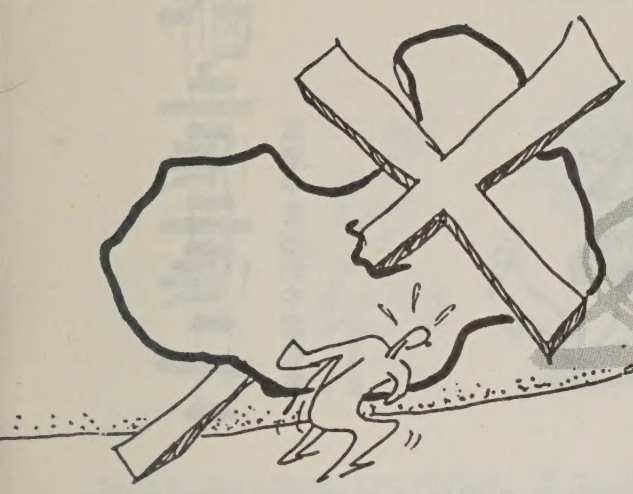
在去年十月於加拿大召開的國際神學會議中，大陸來的代表曾發表十四篇論文。其中強調「新中國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三自運動是一切可行的方法中最完美的方法。」這只合乎「適者生存」的原則，並不合乎聖經的眞理。共產主義製造貧窮與仇恨，製造混亂與革命，即使我們苟同，後世的人必有歷史的評值與足論。這些代表甚至以反省四人幫及回應四個現代化大談歷史哲學更經不起聖經眞理的考驗。唯物史觀，不僅以物質經濟爲依據，也以矛盾論來辯證。這可說與聖經完全背道而馳。聖經中先知的歷史哲學是以屬靈的動態（ SPIRITUAL DYNAMISM ）爲依據的。神可以使用歷史的每一個細節，達到祂的目的，祂雖暫且允許惡者的猖狂，但祂仍加以控制與引導，神的審判在歷史之中。共產主義的「完善」，只在革命初期非常引人的理想與烏托邦，日久在經濟上首先看出其弱點。且看今日的蘇俄、東歐國家以及大陸的貧窮。共產政權以「貧窮」起家，結果就有長遠的赤貧，蘇修主義及大陸修正的四化並不是解決的途徑。聖經的經濟觀是「民主資本主義」（ DEMOCRATIC CAPITALISM ），實行起來雖因人的罪惡而有缺點，在經濟發展中比共產主義要完美多了。

大陸的宗教自由與開放教會都是政治的理由，統戰的方法。當教會被利用的時候，主的身體仍受限制，肢體仍在受苦。我們在海外的肢體不也因此受苦麼？但是神的兒子使我們自由，我們就眞自由了。大陸的家庭教會是最好的見證，我們從他們學習信心的功課，傳福音的熱心。我們也教導他們在眞道上建立，在知識上長進。當大陸三自領袖們在製造一套神學思想，順應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我們應設法傳遞純正的信仰。我們向大陸的信徒要肯定眞道，愛心代禱與服事，主心給我們智慧與能力！

大陸福音的門沒有開，主却一直在裡面。旅遊的門洞開，我們進去只爲福音的緣故，人爲的力量無法阻止！因爲在那裡有主的寶座，主的權能！

（附註）六年前在橄欖刊登載拙文「海外華人教會與大陸福音」，現在有重寫的必要，但是基本的見解仍未改變。

（作者爲美國金門神學院講師。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編委會立場。）



介紹幾本有關中國教會的港版書

書介小組

身爲基督徒，又是中國人，但在殖民地裏長大的我們，思考兩者身份使命，地域、文化、制度種種收窄了我們的視線，不自覺地將兩者關係切割起來。偌大的中國，對我們來說，還是遙遠、模糊，連可倘餘的民族感情也不具體，基督徒對國家的責任，也少及思想，切割難免，然而，時代總有洪流，叫我們安逸不得。

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近百年中國滿有苦難，今天，你我既是基督徒，又是中國人，受苦十架路必然走上，願我們在窄路相遇！

《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編輯及出版

中國。

教會。

迎着八十年代，鄧小平領導的「務實派」班子逐漸掌握中國政權，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成了統治原則，但不旋踵又提出了「四個堅持」壓制了幾許民主運動發展……究竟在將要來的日子，中共會用甚麼政策處理宗教問題呢？繼續懷柔統戰？激進化？究竟中國教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可以怎樣活下去？

三自教會。

家庭教會。

在中共三十多年的統治期內，中國基督徒分別在各地或公開或秘密的聚集一起敬拜主，雖然有的人看視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爲非信徒，但從一些傳記及歷史記載中，這些三自領袖亦往往是經過沉重思想掙扎的決定，也是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壓力下的抉擇，究竟三自跟中共的宗教事務局、統戰部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家庭教會是否眞的是一些刊物所言的眞教會嗎？三自和家庭教會是對立的嗎？

歷史教人聰明。

信仰令人委身。

假若你曾經想過中國教會的前途，過去歷史的見證能使我們有洞見，在作出抉擇時能有更加理性基礎，加上我們對教會的承擔，特別是中國信徒對中國教會的承擔，又或是作爲香港信徒對九七陰影下的香港教會的承擔，我們堅信神絕沒有棄絕中國十億生靈，但我們要怎樣帶動教會面對未來呢？

嚴謹詳細是《中國對基督教的政策》的特色，不過整本書的調子是對中共抱有極大的懷疑，但既然書中旁引詳列，大抵可以讓我們反覆考核，再決定立場。

這一本份量重（指學術味）價錢稍高的中共與基督教問題的文集，在面對九七的現在來說，肯定是適切的。

《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

林榮洪著

天道書樓

屢提及的「一九九七」問題，竟有被看爲力挽普遍脆弱信徒生命的巨流，巨流迫近，不得不思想，不得不長進，而回顧歷史洪流，二十年代的中國，反對基督教運動挾著文化存亡、國家安危等大命題，予中國教會猛烈冲擊，教會如何反省、應變種種，竟也是我們今天所應思想的課題，審愼檢討過往教會歷史，吸取教訓，找出我們的方向，《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一書便扮演展示過去洪流，予即將面對洪流一點亮光的角色。

二十年代的中國，正面臨一種前所罕見的文化冲擊，新文化運動崛起，強調科學與民主，科學方法不能接受一套絕對性、最終性的宗教理論；任何形式的宗教統治違反民主時代的風尙，人本主義精神顯而易見。國家又正面臨危急關頭，外敵內亂，造成民不聊生局勢，救國救民使命，匹夫有責，國家主義便成爲了當時價值觀念的批判標準，反對基督教運動便在這紊亂的局勢中發生，導火線源於一九二二年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由攻擊資本主義，漸轉移爲反帝國主義；教會學校亦飽受抨擊，認爲宗教教育只會剝削中國青年的民族意識與愛國熱誠；教會歷史上過犯，也備受批評，種種予教會有猛烈責難，在複雜和多變化的政治社會局勢下，中國信徒如何建立一個正確適切的福音信息，身體力行，向當代人宣講呢？時局不容耽誤，護教思想嶄露頭角，是本色化問題。

當日的神學討論，許多題目早已在西方教會裏出現。教會領袖站在不同的神學立場，多方護道，引起不少爭論，神學反省工作，最後回到以建立基督爲中心的護教神學，基要派和自由派爭執在基督裏得到解決？基督所表揚的公平、博愛與服役的精神，用以協助拯救當前中國社會危機？基督能把基督教信仰與中國人經驗連貫起來？但仍要具體應付文化傳統與國家主義所引起問題，本色神學仍未能提出更有效方法應付文化危機！還是一個漫長的建設，牽涉基督教定義、文化的身份和它們兩者的結合？至於國家重建的使命，基督富有革命性人生便成爲支持政治參與意識根據？並多方討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然而，二十年代教會領袖均認爲，基督教內公平、服務、犧牲帶有內在價值的美德，可超越任何政治制度的限制。基督論神學構成了在反對基督教運動聲浪中本色神學的核心。

本書結構便根據以上所討論的問題，共分七章，有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對話，各方論辯均能很扼要引述出來，讓讀者掌握當時一些的爭論；並能綜合多方意見，指出當時的方向，讓讀者在各執一持的爭論中，亦能看到一些方向，反省信仰眞義。

如作者所說，「二十年代中國教會的本色護教神學的成敗，實在難以估計」，雖在理論上，已對國家問題進一言，但反對基督教運動並沒有減弱，歸向基督教的人也不多。但如今，事隔六十多年，洪流暗湧翻起無數，我們對這時代洪流，又有甚麼交待呢？會否一敗塗地，還是推前發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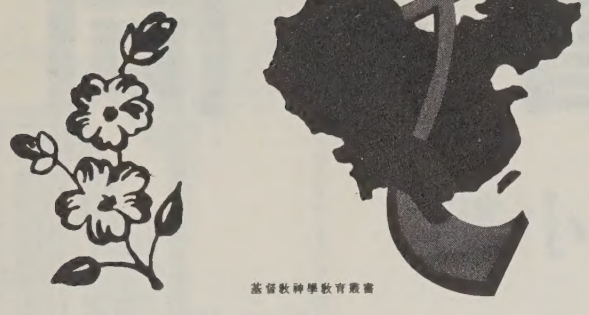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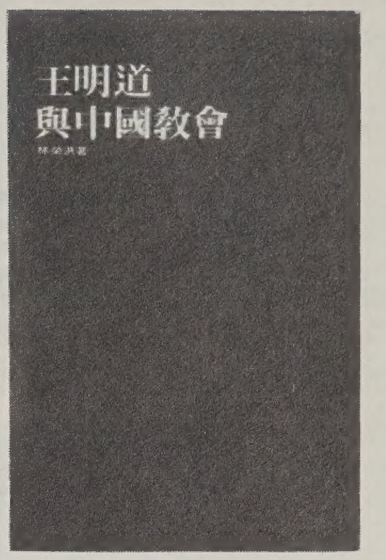
吳利明著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基督教是否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
基督教是否迷信和反理性？
基督教對中國社會重建有何貢獻？

吳利明先生的《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一書，正是中國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急劇變遷之回應的寫照，本書以五個人物爲中心，他們是趙紫宸、吳耀宗、王明道、徐寶謙和吳雷川，在整個基督教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他們亦有一定的地位。作者介紹了他們的工作及神學思想，並分別作出了評論。

除了王明道以外，其他四位都企圖顯示出基督





教對社會所能提供的具體的 貢 献 或 有效的改革方案，而本色化運動更是當時的急務，雖然起初四人都是以自由主義的社會立場出發，但到頭來得到的結論並不類同。趙紫宸是唯一堅持他起初社會立場的一位；吳耀宗則由自由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徐寶謙因對純理的討論發生了厭倦而決定親力參與農村重建工作；吳雷川因看到傳統本色化工作的矛盾而爲本色化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從以上所見，可知上述四人均深深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只有王明道仍持守着傳統的神學思想。

綜合全書，可見當時的信徒多沒有接受系統的神學訓練，而他們的神學思想，多夾雜了濃厚的西方色彩，如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而且，他們的思想體系亦多隨着急劇轉變中的中國社會而改變，而最終目的則以基督教作國家重建的基礎。他們多是決定了社會重建的行徑後才把基督教加上去，這樣的做法，作者認爲到頭來只是將一些社會理論加上基督教的名義，因而令基督教失去了獨特性及其對社會改革的特殊貢献，這是一個危機，也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九七問題越來越迫近時，香港信徒再不應以旁觀者的身份去探討中國問題，此書除了給我們一幅前人爲教會爲國家探索過的途徑的俯瞰圖外，更提醒了我們，面對現時的中國社會，我們怎樣從基督教當中爲中國找尋出路？「鑑往知來」，相信是此書給香港信徒最大的啓示。

《王明道與中國教會》
林榮洪著
中神出版

王明道先生是近代中國一位膾炙人口的屬靈偉人，也是傳統保守派教會領袖的主流，王氏篤信聖經要道，萬事均以聖經爲依歸。他性格倔強，重原則，不妥協，決不向強權低頭。而他這強頑的性格，對其日後的經歷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林榮洪的《王明道與中國教會》一書中，對王氏的生平事蹟、神學思想及其與中國教會的關係均作了詳盡的闡述。

本書共分爲兩大部份，首部份主要描述王明道的生平事蹟。王氏生長在中國最動盪的時期中，從他十四歲重生始，至他蒙召及委身的過程中，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內心掙扎。王氏在無望痛苦之際，往往從聖經中得到安慰及鼓勵，這種從讀經而得到的直接經歷，在王明道的心路歷程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本着聖經的原則，經歷了新舊派神學之爭、共產政權之壓迫等挑戰。

第二部份，作者以重生爲骨幹，從福音的本質、基督論、聖經眞理、屬靈的成長以及教會觀各方面去分析王明道的神學思想。當中，作者嘗試將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新神學派思想與王氏的保守派作一對比，面對不同神學思想的冲激以及當時的反基督教運動，王氏本着聖經眞理，致力於護教工作。事實上，王氏的實踐神學純粹從個人性的立場出發，缺乏社會性的意識，而他的思想亦涵蘊着強烈的對立課題：個人福音與社會福音、屬靈與屬世、教會與世界、神的兒子與神的仇敵。王氏思想中的對立，正反映出現今信徒的內心矛盾，故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及探討。

從本書對王明道的生平及神學思想的闡述中，均能爲信徒提供一個信仰反省的機會，尤其是面對今日不同神學思想的冲激，我們該怎樣回應呢？王氏看重聖經原則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效的，然而，我們亦應注意這種過份看重從聖經中得到的主觀經驗所產生的危險，我們是否看重聖經的眞理而忽略身處的環境？我們又當怎樣將信仰和生活結合，成爲一個表裏一致的基督徒？此外，面對香港前途問題，政教問題已成爲信徒所關注的課題，基督徒該怎樣在香港獨特的問題上作出回應？我們又會否像王明道一般肯爲眞理付代價，將生命置於度外？這一切的問題均是此書給我們的反省及挑戰。有意探討中國問題的弟兄姊妹固然要閱讀此書，對於那些願意眞誠面對信仰，希望能作反省的信徒更是不容錯過此書。

爲甚麼會不同

港大主愛中華祈禱小組

以下是我們在八二年尾回廣州探訪當地家庭聚會的弟兄姊妹後的一些所見，所聞及所感。我們不打算討論國內的宗教政策，也不敢說廣州的情況是中國信仰生活的代表；然而我們正反省着……。

初初接觸國內信徒時，不難有一種驚訝及不安的感覺。原因是他們實在太熱誠了，緊握着我們的手，不斷地問安。那親切的接待，確實令我們感受到雖身處異地，却是眞正的肢體。他們很着意分享（一位弟兄的分享長達兩小時），分享的內容却不是一些膚淺的生活近況，而是進深的靈裏交通及在神裏的經歷。更難得的是，面對着一班陌生人，却毫不吝嗇地渴求有生命的交流。使徒時代未經組織化及形式化的教會生活似乎歷歷在目。

也許香港的基督徒談「相交生活」，「彼此相愛」談得太多了。團契週會，屬靈書籍教我們怎樣去過肢體相交，以致這些情操變得好像是與信仰分割，需要別人提醒和刺激後才來的。國內的信徒不談這些，却在生活上流露了這些生命的特質來：聚會前後彼此的問安、掛念、照顧、代禱。反觀談了不少「相愛」的我們，却在實踐上大大的趕不上。

香港的基督徒，尤其是大專基督徒，總喜歡把信仰的內容，化爲一大堆概念，如「委身」、「相愛」、「傳福音」、「社關」、「愛國」等；我們所謂的「分享」，也不外乎環繞這些概念，發表自己的意見，或勸勉別人我們「要」怎樣做。國內的弟兄姊妹，可能是教育程度低，不懂得把事物概念化，但他們交通，分享的是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他們不「教導」別人「要」怎樣做，却在得勝和失敗的見證中，榮耀了上帝，又叫人得着勉勵。「概念化」了的信仰不但對我們信仰實踐沒有多大幫助，反而阻礙了我們的經歷及體驗，做成了另一種迷信：以爲信仰只是一套概念，明白了這些概念便以爲得着了一切，不進深一步的去尋求。學生時代的「浪漫」產物，面對現實世界便顯得有限；不少基督徒也因此失落，跌倒。

與我們在一起的有幾位年老的弟兄姊妹，有些行動不便，有些視力不好，但却因神的同在而有其「外體日衰，內心日新」的一面。當他們細訴他們的經歷及受苦時，我們看見了神怎樣改變人的一生，用祂的僕人，以致祂的名被榮耀。一位老姊妹流着淚的述說她的跌倒，另一位爲她自己以前的頑固不信而懇切認罪；足見那用生命去經歷神浩瀚恩典的實在；及那不簡單的謙卑。

對我們來說，因爲客觀環境不同，我們慶幸沒有具體的痛苦，但我們又遺憾我們甘於安逸。誠然，逼迫受苦不可強求，但我們對信仰有足夠的執着及委身嗎？它能夠叫我們面對變化的時局和未知的未來而屹立得穩嗎？

國內信徒對聖經的緊守及服從教我們慚愧。說話中，不時引用聖經的話來互相勸勉，口中常說「感謝神」及「等候主的安排」等；有時甚至說得太多及忽略其中的含意。無可否認，他們對信仰的回應是比較感性，較缺乏理性的基礎。然而回想他們客觀的限制，缺乏解經書籍，有限的教育水準及思想的訓練時，我們看到單純信心的重要。

我們受過相當教育的信徒，却常常讓各種知識、不同的解經方法去冲激而不知所措，彷彿知識不能與信仰共存，以致活在懷疑矛盾的爭扎中。在建立我們信仰理性基礎之同時，我們可能忘却了最後的依歸——聖經的話。在瞭解聖經的信息上，我們

有不少輔助的研經資料；國內的信徒因缺乏這些而傾向於膚淺的層面。然而，若他日所有屬靈書籍，研經資料都沒有時，我們能否從聖經中知道祂的心意？當然，我們不可要求自己由有知變爲無知，而且神對不同人的要求也有不同。我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學術思想及知識時，我們的信仰也應該藉着這些而鞏固。讓我們有成熟的思維，也有單純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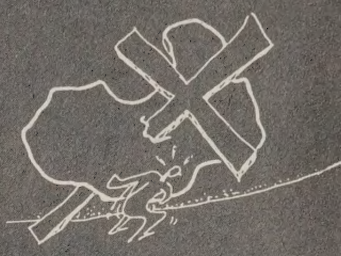
在國內聚會及傳福音的機會不多也不自由，但是信徒會珍惜這些機會。小小的房子，坐滿了五十多人，每人都缺乏伸展四肢的空間，但却可以坐上兩小時多，留心聆聽講員冗長又不太有趣味，但是聖經的話。他們禱告十分懇切，着重讚美神，研經很有規律，對聖經很熟悉，實在令我們佩服。

此行沒有帶給我們任何知識的增長；然而我們看見了生命影響生命，但也看見了國內信徒的不足——流於感性，缺乏釋經知識，對罪惡及魔鬼過於敏感等（抑或是我們麻木了？）及一些不利的客觀條件——不可公開宣教，不可有家庭聚會，缺乏聖經，傳道人等。然而，這也加強了我們的負擔，在可能的機會下盡量帶一些合用的書籍，替他們代禱瞭解大陸的現況及關注內地的福音及栽培工作。

在不同的環境及文化下，信仰的表達及理解都會略有不同，我們不可要求現在有組織的教會去瓦解爲細小的聚會點，又不可能要求我們去認同國內信仰生活的模式；然而相信神要求的是身處異域，不同時空的人，掌握不同的條件作出適當的表達及回應，至於我們生命的豐盛，對週遭世界的影響，就應該是超越文化及時空，如活水江河地湧出，以致神的名被萬民所稱頌。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主愛中華祈禱小組）

八三・三・八



「一九九七・香港」及福音派教會《傳》

八三年初，香港一班福音派教會及機構領袖聚首一堂，用整日時間，祈禱、思想、討論「一九九七・香港」這題目　。會中對「三自」有作一些明確的評價，也有一些結論，是能對香港衆教會起提醒作用。謹錄如下，以饗讀者。

- 對香港來說，當主權、治權歸回中國時，極有可能有「三自委員會」及類似的活動出現。
- 假若沒有三自而由中國基督教協進會代替的話，香港的協進會將更活躍地影響香港教會及信徒。
- 香港教會（福音派教會）爲要面對一九九七的挑戰應全力注意推行下列措施：
  - 香港教會對一九九七不宜只抱悲觀態度，也應作積極之準備。
  - 使信徒認識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基督教的看法及政教應有的正確關係。
  - 使信徒了解在精神和心志上合一，減少過度強調宗派組織上之合一。
  - 使信徒適應多元化的聚會方式。
  - 推動以聖經爲中心的社會關懷。
  - 目前被尊敬之領袖們宜多站在福音派立場講說話，指點正確方針。
  - 教會要多訓練平信徒領袖，使他們能更多負起領導教會的責任。
  - 神學院的課程宜作適應，使學生更能適應將來的需要。
  - 培養信徒在靈裏更獨立，不必太倚賴其他弟兄姊妹——特別是牧者。
  - 推動信徒簡樸生活。
  - 培養信徒有爲主受苦的心志。
  - 基督教出版界宜盡量出書，內容應注意上述各方面的需要。
  - 由現在開始，教會更應多著重本地傳福音的工作。

（本文轉載自亞洲歸主協會中國通訊《傳》83年5月至7月號，其內容頗能代表一部份教會人士對未來的看法，故臚列於此，備作參考，未必代表《橄欖》立場。

「普世派」、「福音派」

前言

中國基督教代表團於八一年三月訪港，一時引起了香港教會普遍關注，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雖然已事隔兩載，但其影響猶在。《橄欖》於31—32期也報導了這次訪問的經過，在總結中更預測「三自」會所提出的「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將在香港教會中造成更大的分歧與衝突。《橄欖》的預測言猶在耳，教會內便發生了一連串與中國教會有關的爭執。當基督教協會接二連三的舉辦了交流會，傳來一片「宗教自由」的歡呼聲之際，一些「福音派」機構却報導了家庭教會被禁及廣州林獻羔被逼害的消息。而年前的「東陽義烏事件」所引起的爭論到現在仍未平息。更重要的，教會內部針鋒相對的局面已引起了輿論界及大專界的關注。《廣角鏡》雜誌在一期「教會、香港、一九九七」的專輯中就選錄了一篇由黃祈思所寫的「基督教中的福音派與普世派」，而近期的理工學生報亦以兩派之爭爲主題。當然，所謂兩派之爭有其深遠的歷史及神學根源，並非純粹由於他們對「三自」存不同態度而產生。但在「香港前途」及「中國日近」等複雜問題籠罩之下，兩派之爭的激化實在與「三自」因素有密切的關係。

一般認爲，「普世派」的「親三自」與及「福音派」的「反三自」都是出於兩者對信仰的不同理解，因此對立是「必然」的現象。但筆者認爲這樣的假設實在大有商榷餘地，下文將會詳細討論。平心而論，在面對香港前途的大前題下，紛爭只會令教會更無能去面對時代的挑戰。閉起門把別人罵成「不信派」、「敵基督」固然不對，但單方面的把「消費福音」的惡劣性「公之於世」也不是君子所爲。要解決紛爭實在需要坦誠的交流，而身處言論自由社會的我們，是有足夠條件作這樣交流的。現在不把問題說得一清二楚，難道要等到「控訴大會」等的場合才拿問題出來「清算」麽？（當然，筆者並不認爲三十年前中國教會發生的事必定會在香港重演）因此，筆者實在希望透過《橄欖》這個開放的園地，引發兩派作出深入的反省及坦誠的討論。

普世派的認同三自

如前所述，兩派的對立既與「三自」因素息息相關，要澄清對立的局面，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兩派現時對「三自」的態度是否有其「必然性」。但在解決這問題之先，我們必須尋求兩派各對「三自」的看法的根源。以下筆者嘗試先從三個角度—意識形態、神學觀點、實用考慮—分析「普世派」認同「三自」的原因。（筆者會先討論頭兩點，然後才回來討論第三點。）

1. 意識形態上的認同

(a)從愛國主義出發

在談及中國教會史的時候，「普世派」與「三自」都有一個共同看法，就是基督教會經成爲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對中國造成極大的破壞和侮辱，而基督教之所以不能在中國植根，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曾與帝國主義勾結。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生長，就必須擺脫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教會亦必須做到絕對本色化，參與國家建設的行列，向中國人表示基督徒也是愛國的。

此外，「三自」與「普世派」另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對新中國的認同—也是基於強烈的愛國情緒：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禍害，使中國人能眞眞正正的「站起來」，這是自滿清，軍閥以至國民黨統治以來所未有的成就，故此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b)對資本主義的反感

「三自」與「普世派」都有同一個觀點，就是認爲資本主義社會是建基於不平等和充滿剝削的社會制度上，因此有改革的必要。於「三自」看來，國民黨之所以失政權，就是因爲它容讓官僚資本家剝削低下層人民，造成社會上極度的貧富懸殊，相反共產黨之所以受權護，就是因爲他站在人民的一邊，爲中國帶來了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縱觀「

與「三自」之間

衞民浩

普世派」所持的「站在低下層一邊」、「反對不合理制度」的原則，正好與「三自」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不謀而合。

2. 神學上的認同

(a)對傳統西方神學思想的抗拒

「三自」與「普世派」既然全盤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對於在這制度的價值取向下所產生的西方神學思想，自然也沒有多大好感。「普世派」把傳統神學痛斥爲「消費福音」把信奉這「福音」的人罵爲「已得眞理者」，這是我們熟悉的。至於主張「三自」的教會領袖，如吳耀宗等，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已對傳統西方神學作出了無情的批判。王明道、倪析聲等小群教會領袖之所以受批鬥，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的教會外表雖然做到「三自」（自治、自養、自傳），但他們所信奉的仍是一套「洋教」，而他們對國家、民族超然的態度，更爲「三自」領袖們所不恥。

(b)著重「處境」的神學建設

既然認識到「洋教」不能在中國生根，那麼「三自」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套適合中國需要的神學思想。中國基督教代表團於蒙特利爾「新的開端」會議所提出的「和解神學」（神人之間，基督徒與中國人之間及信徒之間的和解），就是「處境」神學建設的一項初步成果。既然認定神學必須在「處境經驗」中產生，生活在中國「處境」以外的人，即使抱著關心和同情的態度，實在沒有條件領導，甚至干涉中國教會。因此除了禱告外，海外人士不應有任何損害中國教會主權和「三自」原則的行動。這就解釋了「三自」爲何要採取「分別情況，區別對待」的對外政策，與及爲何要急不及待地替不友好的外國團體加上「反華、反共」的政治標記。

至於「普世派」，他們在本地（香港）當然有一套針對本地「處境」的神學方法，如他們所著重的社會行動，就是「處境」神學的一項表彰。在處理中國教會問題的時候，他們雖然強調香港是中國地方，香港人是中國人，香港教會也是中國教會的一部份，但因爲客觀「處境」的不同，要面對的問題也不同，因此香港信徒也是「外邊人」，而「外邊人」要囉囉嗦嗦地督促中國教會的發展是不要得的。被問及香港基督徒對中國教會能作出甚麼貢獻的時候，「普世派」的答案就好像坎特伯利大主教倫西所說的：「中國教會正如大病初愈，正在康復，我們不要搞擾他，甚至給補藥也是不適宜的，我們所應做的，只是寄以同情並祈禱。」這正好與「三自」對外的要求一致。

3. 實用價值的考慮

在香港前途的談判中，「普世派」希望透過「三自」與中國當局取得更多默契是有可能的，但筆者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因此不打算作出任何猜測：

另一個原因可能與「三自」所提出的「分別情況，區別對待」有關。「三自」既然決心把敵友區別清楚，一切批評「三自」的言論都有可能被視爲敵意行動。因此「普世派」爲了維護幾十年來的友誼，還是尊重「三自」的要求，保持緘默爲妙。但正如前面所述，沉默對於教會前途是沒有好處的，因此這方面的考慮也實在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值得商榷之處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普世派」與「三自」之間實在存有很多共同觀點，但問題是：這些共通點是否足夠使「三自」成爲「普世派」的「堅強盟友」？「普世派」又是否要因爲這些共通點而「必然地」一面倒認同「三自」呢？

除了「處境神學」一項外，以上所提出的共通點都有一個共同特質：它們都是建築在一個消極和往後看的基礎上的。「反帝」無疑是愛國的表現，但並不是全部，況且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成爲歷史陳蹟，既然承認共產黨已把中國人民救離帝國主義的魔掌，使中國人重新「站起來」，那麼現在再題帝國主義的威脅未免是自相矛盾（中國官方也不提了）。同樣，反對資本主義未必一定就是讚同共產主義，即使是贊同（或有好感）也要問共產主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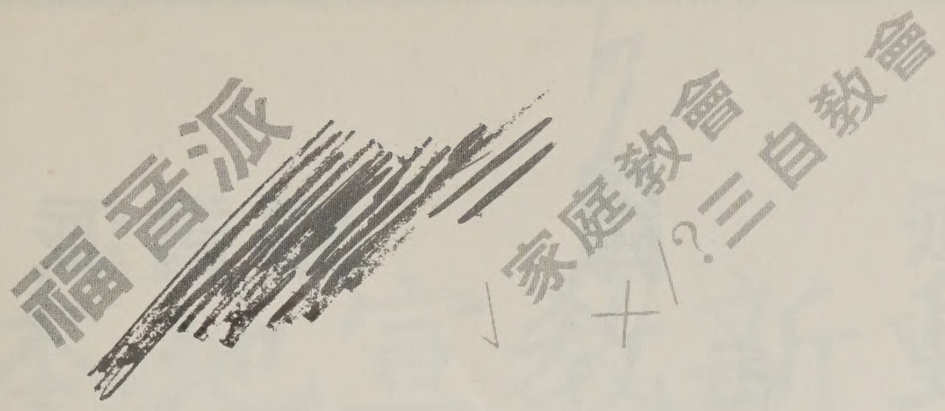
普世派 三自教會 家庭教會

否等於共產黨？革命時代的共產黨又是否等於現在的共產黨？在抗拒西方傳統神學之餘，也要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和解神學」是否就是西方神學「唯一」的「代替品」？若果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而單從「負面」或「消極」的基礎上尋求認同，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爲歷史告訴我們，從「負面」的基礎上建立的認同往往是脆弱的。中國政壇上的死對頭一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豈不曾在「反軍閥」和「反日」的號召下建立聯盟嗎？但他們後來怎樣因爲「正面」的問題一救國方案一而弄至反目成仇，這是有目共睹的。再者，一切強調「反」對於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就好像五四時期所提出的徹底「反傳統」，就爲中國帶來了幾十年的思想眞空，而以「反」起家的毛澤東，帶領中國經過「反帝」、「反日」、「反美」、「反資」、「反右」、「反修」，最後却帶來了充滿破壞的「文革」，造成十年禍劫。讀歷史可以知興替，大唱認同新中國，認同「三自」的「普世派」，實在有必要自問認同是基於甚麼基礎？在「正面」的立場上是否可以完全認同「三自」？以下筆者嘗試提出幾點來討論。

在愛國的立場上，「三自」除了反對帝國主義外，更提出了「站在人民一邊，替四化作出貢獻」的口號。但在提出「站在人民一邊的同時」，他們又宣佈要熱愛共產領導下的新中國。再者，他們經常把不友好的外國團體罵成是「反華、反共」，而「反華」和「反共」兩詞又幾乎是互通的。這當然不能視爲他們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却可從中推論他們對政權的一項基本假設：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代表人民和國家利益的。當然，「三自」的發言人從來沒有公開承認這點，況且丁主教在「十四點看法」中也提出愛國不能盲目，必須帶批判性，並且承認共產黨曾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們只說人是難免犯錯，却沒有指出錯在那裏，他們更從來沒有表示如果黨的決策與人民利益有衝突的時候（這是大有可能發生的），他們將會站在那一方。再者，在寧波及雲南兩地的「三自」共同守則中都包括一項「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條文，並注明如有違犯者，應及時制止或交由政府有關部門處理。由此可見，「三自」對共產黨的肯定和擁護是遠遠超過批判的，更重要的就是他們已把黨的利益等同於國家人民的利益了。

「普世派」當然贊同愛國就是站在人民的一邊，而愛國也不能只是抽空的去愛一個古舊的文化，而是切實的去愛一個國家（包括其政權），但他們能否贊同「三自」的立場，認同共產黨是必然地代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呢？我們當然有理由看信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但他們可以相信這個主要由軍人和官僚組成的「革命先鋒」一共產黨一是足夠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嗎？（在中共的最高權力機構內，工人和農民只佔極少數，）再將眼光放遠一點，若果中共眞的已經代表了全國全民的利益，那麼爲甚麼還要搞民主運動？爲甚麼還要支持王希哲等民運份子？爲甚麼還要提出「第五化」呢？「三自」聲稱擁護共產黨（並聲言如有違者，便送官究治），這就叫人懷疑他們究竟是站在人民大衆的一邊，還是站在「既得利益（權力）」者一邊了。

關於和解神學一點，筆者認爲也有商榷之處。陳澤民在「中國神學思想點滴」一文中指出，中國神學之所以不同於南美洲的解放神學，就是因爲中國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而現今的中國，就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因此中國教會當前的任務是和解，而不是批判和解放。既然中國社會是「一切可能下最完美」的，那麼一切社會行動，包括政治改革的要求，便沒有存在意義了，因爲社會行動的一項基本假設，就是認爲現存社會及其制度存在著很多弊端，有改革的必要，但如果一切都改好了，就沒有甚麼社會行動的需要。由此推論，「三自」在中國所推行的不是社會行動或政治參與，而只是社會和政治「動員」。反觀「普世派」却強調以行動改革社會和政制，更重要的，他們改革的對象不但是香港這個未經「解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更期待透過香港的民主改革能夠帶來中國的「第五化」一民主化。如果他們同意「三自」，認爲中國已經得著政治解放，爲甚麼還堅持中國需要民主化呢？在「三自」看來，這樣的要求豈不是侵犯中國和中國教會的「主權」嗎？



當然，以上所提出的矛盾，「普世派」人士大可以認爲是無關痛癢的：既然香港與中國的「處境」不同，信徒的經驗也不同，那麼不同的見解是無可避免的，爲甚麼要強調兩者的分歧呢？況且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是中國，當然比較著重和解，而香港基督徒所面對的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因此比較著重社會行動，這不過是重點不同而已，何來所謂矛盾呢？當然，如果我們正身處北美，或者根本與中國教會沒有關係，那麼我們大可以與「三自」保持一定距離，以「旁觀者」自居，抱同情和尊重的態度而不作任何批評或建議。但身爲中國基督徒的我們，對愛國是要有承擔的。更重要的，香港不能永遠與中國保持距離，而香港教會與中國教會也不能永遠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下各自獨立存在。隨著香港前途的漸趨明朗，「中國日近」已是不議的事實，而「中國日近」也代表著「三自日迫」，故此香港教會對「三自」的態度實在影響著整個教會未來的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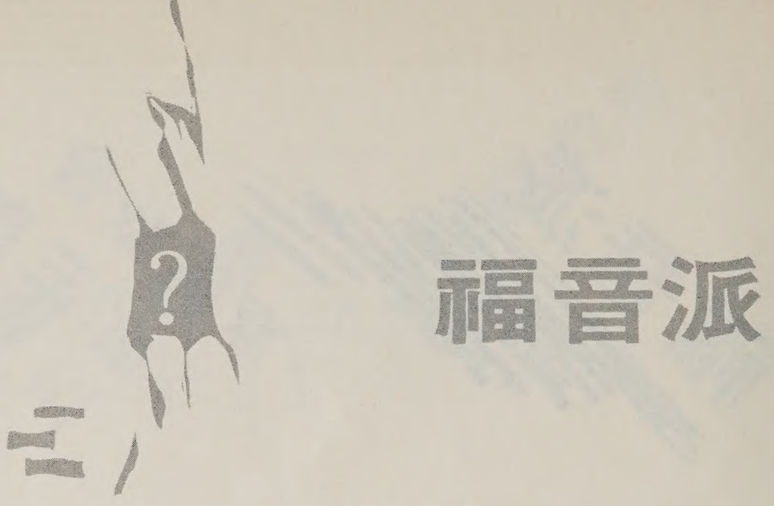
「普世派」人士可能並不同意筆者這樣的分析，他們仍然堅持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環境與中國不同，而在「港人治港」的情況下，香港可以享受更大的自主權。況且，即使一九九七代表更大的不自由，甚至教會被逼害，但如果教會是站在群衆那邊，有良好的群衆基礎，那麼「民主參與」不但能在香港實現，更能夠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加速「五化」實現　。但這樣的設想不免有不足夠之處。社會及經濟環境決定一切的理論固然經不起歷史和現實政治的驗證，而一些本地學者早已指出「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不可行　。當然，群衆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況且共產黨也是搞群衆運動起家的。但當我們在頌揚毛澤東的「群衆路線」的時候，却不要忘記他的另一句名言—「槍桿子裏出政權」。波蘭教會是因爲有群衆基礎而不怕「槍桿子」，但波蘭不同香港：波蘭雖然是華沙集團成員，但在國際上仍是獨立國，外來干預實在不容易；但香港在國際上沒有地位，中國就是要派解放軍南下我們也沒奈何（雖然這可能性很低）。再者，若果以爲香港實行了更大的民主便能夠加速中國政治架構的開放，這未免是過份簡單的推想。而認爲在香港實行自治，自養，自傳可以完全獨立於國內的「三自」（因而可以將「三自」與「普世派」之間的矛盾置之不理）也未免是一廂情願的假設。事實上，「三自」到目前爲止仍未明確地就香港教會前途發表聲明，故此過份樂觀或悲觀的假設都是不著實的。有人提出對政權甚至對「三自」都要採取「批判地合作」的態度。合作固然應從現在開始，而批判更不能等到一九九七之後。若現在仍保持沉默，或只曉得談「認同」、「肯定」，恐怕人家要以爲我們只懂得「一面倒」的合作而不敢作些微的「批判」。這對於教會甚至整個香港的前途都是沒有好處的。

綜合以上所論，不難發現「三自」與「普世派」之間實在存有很多不同處，因此完全認同甚至「一面倒」都是沒有「必然性」的。當然，「普世派」可能已察覺這些矛盾，但仍然保持「親三自」的態度就可能是因爲其他的考慮。

福音派立場的商榷

所謂兩派之爭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普世派」一方，「福音派」也是要負部份責任的。因此要解決這場爭論，單針對一方是無濟於事的。下文將就「福音派」的立場提出討論，但在討論之先，筆者希望對一些問題稍作澄清。

上文曾經提過「普世派親三自」及「福音派反三自」的二分，但筆者認爲這種二分法是有問題的。「普世派」曾公開的表示認同並肯定「三自」的成就，因此稱他們爲「親三自」尚算有理，但「福音派」却從來沒有公開表示要反對「三自」（批評不同反對），因此以「反三自」來標記他們實欠公允。事實上，研究中國問題的「福音派」機構亦不只一個，因此意見分歧是難以避免的。就算是「福音派」內部對信仰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提出不應該將教會分派分家的理論。鑑於這些困難，要將「福音派」對「三自」的態度好像上文一樣歸納起來實在不容易。而爲了避免重覆「三自」的



某些立場及神學觀點，上文只會單就「福音派」一般對「三自」的態度提出商榷之處。

雖然說「福音派」沒有公開表明立場，但他們却間接地透露了一些對「三自」的看法。最明顯的可從他們對「家庭教會」的態度中看見。「福音派」雖然擁有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但他們之間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與國內「家庭教會」保持密切聯絡，而他們的機關刊物也經常報導這方面的消息。近期的《中國與教會》就選錄了一篇國內某家庭教會對「三自」不是神的教會　。當然，這未必就是「福音派」的立場，因爲「報導」不代表認同。但如果我們將《中國與教會》這期對「家庭教會」的報導與以往對「三自」的報導手法比較一下，便不難發現「福音派」（至少是《中國與教會》的編輯）雖然並不認同「家庭教會」的徹底反「三自」，但却對「三自」採取一定的批判態度。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福音派」對三十年中國教會史的分析看見他們對「三自」的態度。《中國與教會》第二十五期就是以「苦難」爲主題，總結了在「三自」領導下的中國教會是在「苦難」中成長的　。由此可見，在「福音派」看來，「三自」雖然不至一無建樹，但它爲中國教會帶來的却是壞多於好。「福音派」不但把過去解釋爲「苦難」，展望將來的時候也不免帶有受苦的意味。一些教會領袖在談及一九九七的時候，都喜歡以「準備受苦心志」、「發展家庭教會」、「改變福音策略」及「加強神學教育」等作爲總結，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基於香港教會的未來不能獨立於「三自」控制的假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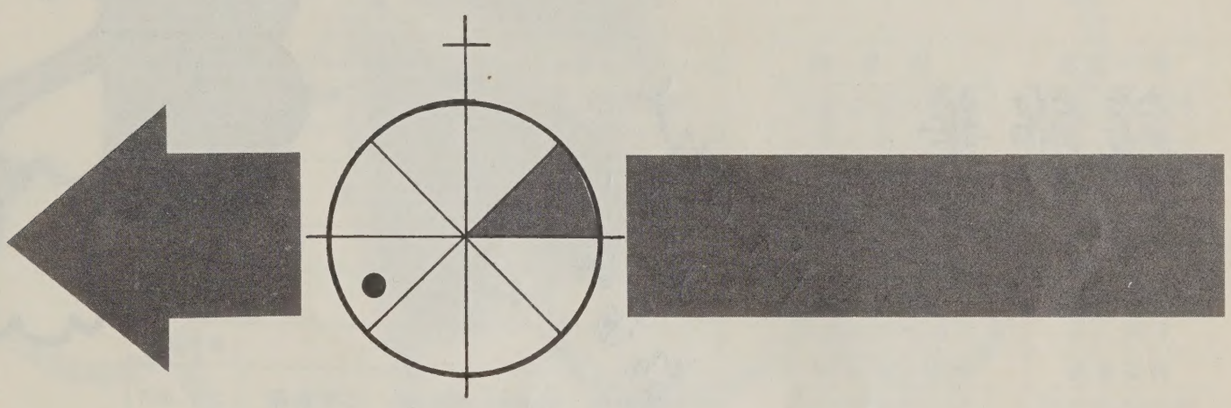
筆者當然並不反對對「三自」及「政權」保持一定的批判，但若果批判是代表對派別的更大執著，甚至自我封閉而拒絕作任何神學上的反省，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筆者十分欣賞一些「福音派」學者在神學反省上的努力，但反省畢竟只限於一班學者，而一般教會却仍處於封閉的狀態。單從他們對福音的理解，便可以發現「福音派」教會仍是以「完成使命」爲大前題，對四週的處境却沒有足夠的回應。面對轉變的將來，他們的答案只是「改變聚會方式和福音策略」，却沒有考慮對香港人的普遍承擔。而在一九九七的壓力下，「福音派」教會的自我封閉實在有強化的趨勢，加上一些牧師和傳道人在宣傳「苦難」的信息，預言中國教會的遭遇將會在香港重演，這一切只會加深信徒對「三自」及「政權」的恐懼，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便把自己關閉起來。這對於整個教會的前途也是沒有好處的。看來，「福音派」的「致命傷」就是缺乏坦誠、開放的態度。

總結

綜合以上所論，「普世派」對「三自」的認同既沒有「必然性」，而「福音派」謹愼的批判也未必沒有危機，那麼因爲「三自」而令兩派之爭激化就是不必要了。況且在面對九七問題的時候，強調分裂也是沒有益處的，因此「普世派」與「福音派」之間實在需要坦誠的交流。當然，解決了對「三自」態度的分歧並不表示兩派之爭便可以迎刃而解；相反「三自」問題只是爭論的一部份，它的解決也只是一個開始。但筆者深信這第一步是應該走也是值得走的。前路當然充滿障礙，筆者也深感「兩面不討好」的壓力，恐怕換來的「回應」不過是對筆者個人的批評甚至責罵。只盼望透過誠懇的態度引發出坦誠，深入的討論和反省！

（作者爲港大學生。文章屬個人意見，不代表編委立場。）

本地宣教新動向



發刊詞

專輯小組

佈道會、福音日、福音營、福音週……

青少年、工人、吸毒者、學生……

不同的聚會方式，不同的福音事工，織成了本港教會的佈道工作，而隨着七十年代陸續關注不同的福音工作對象，亦開始對「福音」有了不同的理解。

年代轉易，社會上的人口結構有了新成員的加入，地理上的人口遷徙，經濟結構下衍生的居住結構……既然福音是要對症下藥，對應人的需要，而且福音又是超越一切文化、政治……等對一切人都適切而且重要的，那麼，福音工作也自然因着一切政治、經濟、社會、人口等的變化而有新的著重點和對象。所以，有所謂「宣教的新動向」！

今期介紹的新宣教實驗有「新邨新人」計劃，又描繪木屋區和新移民福音工作的需要與初步實踐，這一些工作，或許仍屬實驗階段，但那一個合用的方法與成制沒有經過實驗階段呢？這一些新動向，新方法，也正好衝擊我們一貫的宣教概念與實踐，看看怎樣校正方向，擬定目標，推展本地宣教工作，更能對應今天的香港社會。

令人鼓舞的福音行動

——新邨新人

錢錦華

福音不單是抽空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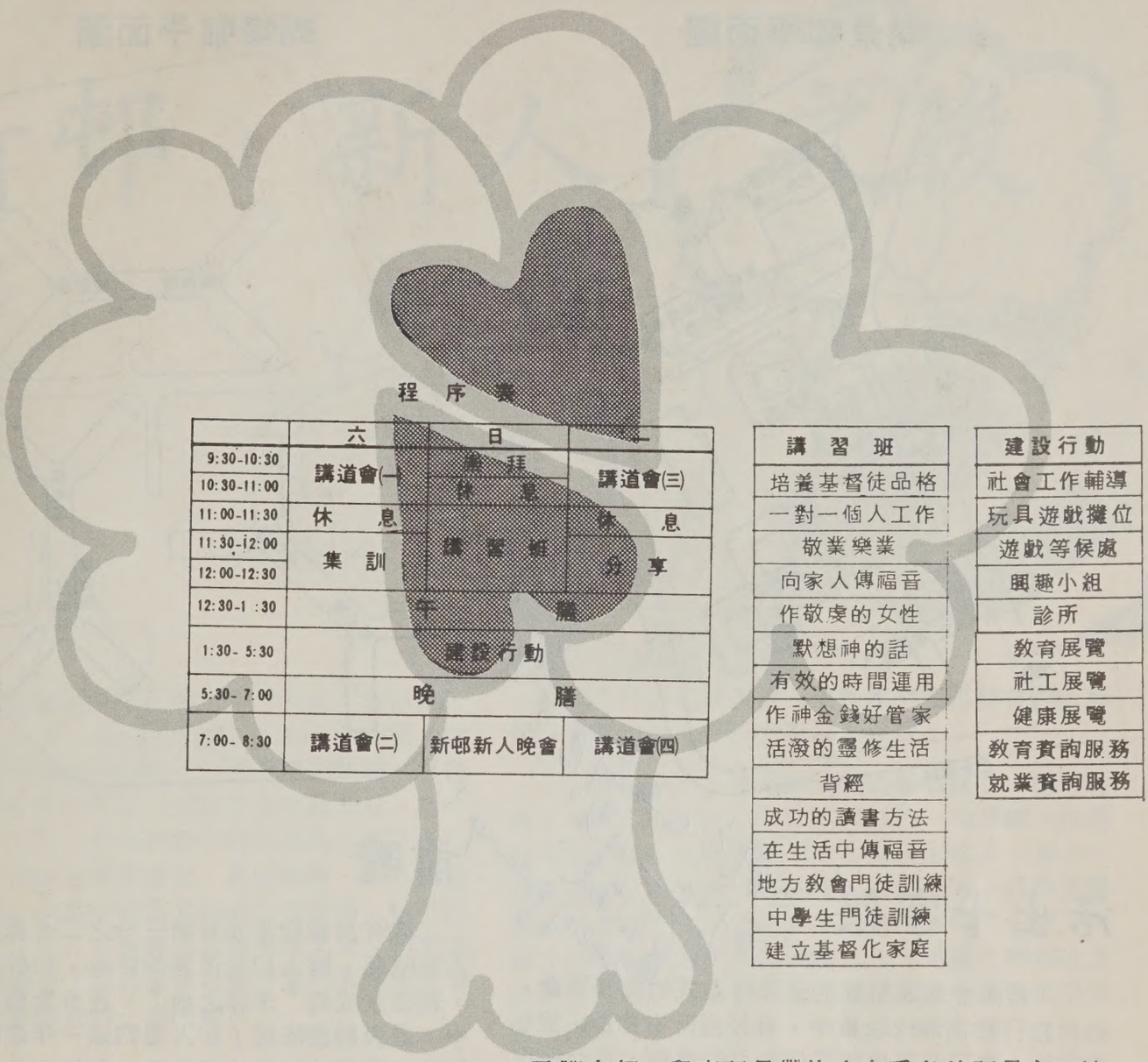
「每一次我去反省傳福音這問題，撫心自問，我傳福音給人，很多時都是很機械式的將福音講述一次，是基於責任多於對別人的關懷和對別人的愛。因此，我覺得很乾，所傳的沒有絲毫生命力。……後來在大會中，看見一位弟兄，拿著裝滿了水的水樽，在會場門外，把一杯一杯的水給那些被烈日晒得叫苦連天的小孩子，他臉上那副憐恤的神情，給我很深的印象，令我想起主爲那些失落的人所動的那份慈心，因而在我心底裡，有著很大的激勵和動力。我看到了一個滿載愛心的福音，而不是一個滿載理論的福音。」一位參與「新邨新人」的大學同學憶及整個計劃時作了如上表示。

這一段誠實的反省，是有血有肉的信仰體驗，相信引起不少弟兄姊妹共鳴。基督徒時常以宣講福音爲第一要緊的事，以此作爲人生目標，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覆宣講中，所宣講的東西淪爲抽象，空洞的語句，與生活不適切，缺乏生命的投入。沒有實質體驗和行動，福音只成爲腦海中的空概念。漸漸有傳福與人，自己反被棄絕的感覺，生命枯乾，沒有絲毫生命力。面對基督徒的大使命，我們要嚴肅地反省整個傳福音的模式，宣講是否等於傳福音？佈道會是否適切今天的需要？如何傳福音？甚麼是福音？相信有不少基督徒都絞盡腦汁，嘗試以不同方法，將福音適切地傳遞。「新邨新人」就是一項新嘗試。

建立社區教會

「……教會把自己困在四塊牆內，孤立在象牙塔中，與社區完全脫節，教會雖然位在社區中，但對那社區却毫無關係，像鹽失去了味，完全沒有作用。「新邨新人」的社區建設行動，是企圖突破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我們看到諸多新市鎮中，居民離開昔日久居之地，離鄉別井，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地生疏，那種流離感突然濃厚。他們需要人的關懷，需要與鄰舍建立互愛互助的關係，也需要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教會在新區內影響力微，過於隔絕。所以我們推行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建設社區精神，以基督愛心關懷及服侍區內的邨民，另一方面我們更希望藉此把福音帶到區內，讓人從我們的服侍和宣講中認識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新邨新人」籌委主席蘇穎睿牧師的序言，提出了以服侍和宣講的結合的概括論述。整個計劃是希望讓人認識主耶穌，堅守和學習主耶穌服侍的態度（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方法是嘗試以社區爲單位，深入社區各階層，包括低下層工人、主婦、小孩子和學生等，將福音傳遍整個社區。適逢播道會正計劃在湖景邨籌辦一所附於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的教會，蘇牧師就以此教會作爲一項嘗試，建立一所社區教會。於是九百名基督徒，以僕人的態度，針對邨民的需要以提供一些適切服務，藉此創立一所社區教會。



程序表

	六	日	
9:30-10:30	講道會(一)	崇拜	講道會(三)
10:30-11:00		休息	
11:00-11:30	休息	講道會	休息
11:30-12:00	集訓		分享
12:00-12:30			
12:30-1:30	午膳		
1:30-5:30	建設行動		
5:30-7:00	晚膳		
7:00-8:30	講道會(二)	新邨新人晚會	講道會(四)

講習班
培養基督徒品格
一對一個人工作
敬業樂業
向家人傳福音
作敬虔的女性
默想神的話
有效的時間運用
作神金錢好管家
活潑的靈修生活
背經
成功的讀書方法
在生活中傳福音
地方教會門徒訓練
中學生門徒訓練
建立基督化家庭

建設行動
社會工作輔導
玩具遊戲攤位
遊戲等候處
興趣小組
診所
教育展覽
社工展覽
健康展覽
教育資詢服務
就業資詢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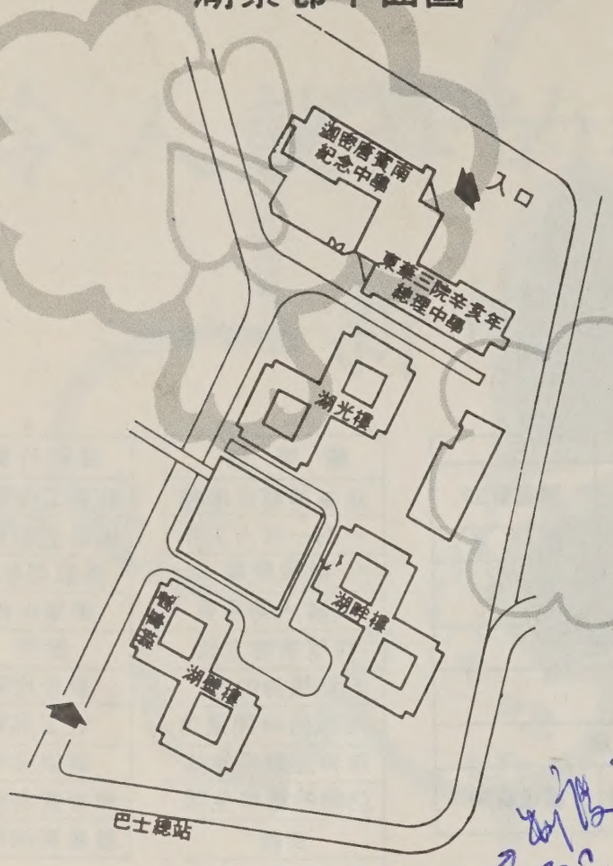
“新邨新人”計劃

湖景邨、蝴蝶邨於八二年十月入伙，至八三年年中，約有三份之一入伙，該兩個屋邨在地理上較爲孤立，未有足夠巴士行走，交通不便、隔涉，而醫療設施需求甚殷，在一萬八千名居民中，只得一所私家診所，若有任何急症，必要轉送至荔枝角瑪加烈醫院。邨內家庭多是核心家庭，即由一對年青夫婦和一或兩個孩子所組成，兒童在人口分佈的率約佔一半。由於仍未全面入伙，很多設備，例如社區會堂等都未建成，故此，這九萬的兒童就未有足夠文娛康樂設施。就是成年人，也因路途遙遠，出入市區相當費時，當地娛樂場所又十分缺乏，所以，文康體的活動的需求更是逼切。有鑑於此，以適切居民的需要，提供各種服務，故所有服務所涉及範圍十分廣泛，於是，需要聯絡的政府部門相當多，包括房屋署，勞工處、警務署和教育司署。整個計劃初時被認爲“太大野心”（A BIT TOO AMBITIOUS），經過冗長的討論後，政府部門才一致通過，於六月三十日正式批准整個行動，八月廿七日至廿九日爲三天工作日。大會提供服務有：健康檢查，職業與學校諮詢，牙齒檢查，家庭輔導，電腦介紹，兒童玩具攤位（有千多件玩具），清洗屋邨與晚會。三天裏的聯繫工作和推行工作並沒有特別困難。整個行動約花五萬元，區議會贊助一萬七千元，其餘由銀行、廠家、個人和教會所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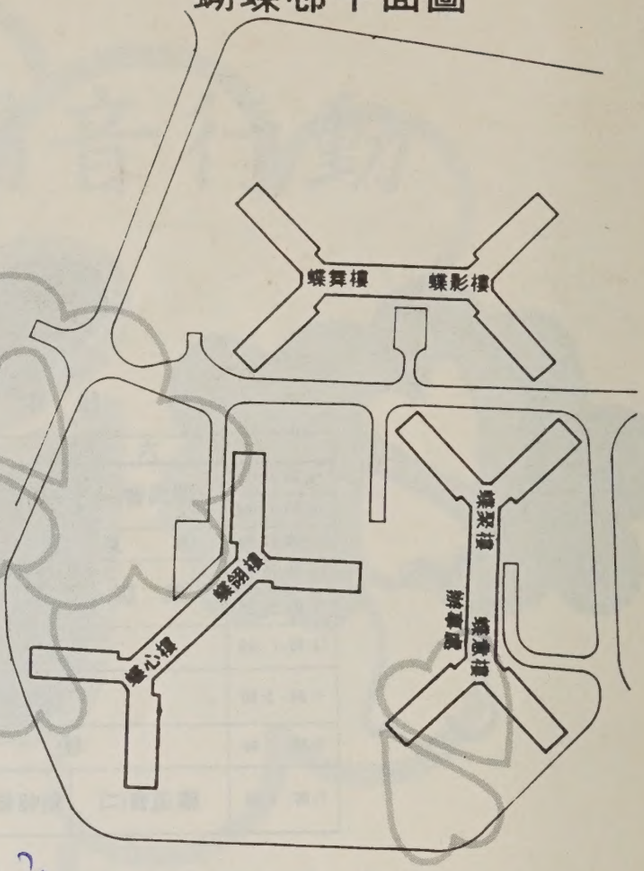
一般居民反應都很熱烈，由於整個行動是在暑假期間，所以吸引不少區內兒童和學生參加。而一般主婦主要工作是照顧家中孩子、丈夫出外工作，早出晚歸，時時感到與時代脫節，生活變得沉悶，加上鄰居仍未熱絡，又缺乏娛樂場所，很容易產生情緒問題，對所提供的服務中，遂以家庭輔導和晚會特別感興趣。一般邨民反應比預期好，不少項目都有“排長龍”的局面出現。暑熱的天氣亦未曾阻攔了他們的熱誠和投入。

經過幾天接觸，發覺邨民一般經濟情況並不如想象中差，生計不成問題；教育程度方面，一般成年人已達到中三或以上。再者，在他們剛剛入遷的第一年，對新事物容易接受，對這些宣講和服務都願意接納，誠然這確是一塊福音未得之地。

湖景邨平面圖



蝴蝶邨平面圖



活出十字架

「行動中最吸引我的是那呼召式的福音聚會，雖然在行動高潮的晚會中，蘇牧師仍有佈道，但相信邨民心裡只是等候着下個節目的來臨，反而決定性時刻是在晚會後弟兄姊妹陪他們離場時的「鍥而不捨」，叫不少人歸了主。」這位參與者的話反映出個人的接觸、討論，才會帶來溝通，這些接觸點是出於自然環境下產生，對信徒與非信徒均容易表達個人的感受和經歷，未信者沒有任何阻撓地聽福音，他們的耳朵是願意聽的，他們的心是開啓的，最後由信徒將福者介紹與別人。

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傳福音方法是怎樣？傳些甚麼？是否撥一套四律、三福出來就行呢？是否過於教條化，抽空和概念化呢？很多人根本看不到十字架與自己的關係，好像十字架只是二千年前的神話故事，今天的生活再看不到十字架的實際意義，這些話不斷地浮現在非信徒當中，怎樣處理這些辣手問題？在「新邨新人」的行動中，他們嘗試以僕人的態度，走到兩所新屋邨當中爲他們服務，從而產生接觸點，透過個別接觸，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把十字架活在他們當中。「新邨新人」確引起一點衝激力，有近一百五十名邨民決志信主，他們的工作相信帶給香港教會的福音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和反省。

前瞻

政府房屋政策預算將三分之二的香港人口遷徙入新屋邨，將人口散佈整個香港，相對於這個政策，新邨就成爲“未得之地”，在分散與重組的過程中，這段轉接時間（即入遷的頭一年或兩年時間），被認爲是傳福音的好機會，邨民容易接受新事物，對福音抵抗不大，在這個有利的客觀環境低下，再透過服務產生接觸點　以服侍和宣講結合，將福音傳遞，跟着由區內信徒建立教會，建立基地，確立社區教會。

「新邨新人」的實驗工作確令人鼓舞，不單是決志者，就是未信者，對基督徒也會從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開始，漸漸對教會產生好感，最少家長亦會願意讓他們的子女相信，對基督教不再敵視，不再視爲西教，並產生信任。

當然跟進工作是更重要的一環，若沒有適當的栽培和牧養，信徒必會軟弱，甚者流失，相信是一項富有挑戰和艱難的工作，扎根的工作有待跟進者的努力。

「新邨新人」是踏進社區教會模式的第一步，這一步屬是屬非，在此短暫時間中不擬作定論，容讓歷史去判斷。但我們今天却看到一點成果，確實令人鼓舞和興奮，希望香港的教會以此行動作參考，反省個別教會的福音工作，讓香港教會能適切地將福音廣傳，基督教能在香港生根。

（作者爲《橄欖》資料組組員。）

「新邨・新人」之後

欣若

筆者最近參加一個名爲「新邨新人」的活動，這活動爲期三天，是利用連續三日的公衆假期，地點在屯門兩個相鄰的新邨——湖景和蝴蝶邨。有爲數九百多的基督徒參加，內容主要有兩部份，其一是培靈聚會，其二是向兩邨的居民提供三個下午的社會服務，包括有健康檢查、家庭輔導、教育輔導、勞工輔導、清潔居邨及其他共八項服務。參與的人中有學生、工人、教師及其他專業人士，可說是史無前例地集合了如此衆多各類行業的基督徒從事社會服務並傳福音的一項活動。

主辦這次活動名義上是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和基督徒醫學團契，其實籌和推行的是幾位「門訓」工作者，這次盛會，反映了「門訓」工作者所持的信念及所看到的新方向。這次活動參與的人數最多，工作最落力的是一羣「門訓」查經班的組員，筆者感受到「門訓」路線在短短六、七年間，確實見到很大的效果，不但人數增加，而且開始深入社會不同的階層，一些在傳統教會中被忽略的白領和藍領，「門訓」工作也開始在他們當中生根。

雖然「新邨新人」有三個下午的服務活動，然而這是貫徹「門訓」工作者的信念——透過服侍去建立關係，透過良好的關係去傳福音，服務與傳福音的結合，至少在這三天是達到了。然而在筆者的感覺中，服務始終是在工具的地位，傳福音才是目的，各人都關注信主的人數，可有幾人爲這三天所發現到的社會、家庭、個人等問題繼續尋求跟進的辦法。

今次的動員量是罕有的，（即使並非史無前例），更難得是看到各人所長可以拿出來一同配合，基督徒中間實在有很多不同的才幹，只可惜缺乏機會去互相配搭，短短三天可以嘗到各盡所能的滋味，難道不可以有更長遠、更緊密的配搭機會嗎！籌備這次活動的人或許也有這個理想。

「新邨新人」也是破天荒在新邨建立「即時教會」（INSTANT CHURCH）的一項嘗試，經過三天的活動，有一百數十位居民決志信主，加上一位傳道人，新邨的「景福堂」就此誕生，當然更艱鉅是跟進的工作，有待許多基督徒參與，一些「門訓」查經組組員已打算繼續投身。這種在新邨建立教會的模式，目前還不能作結論，然而確是值得認眞考慮。

「門訓」路線過去七年來在教會以外發展蓬勃，然而在教會當中則受到很大的阻力和壓力，許多教會領袖及弟兄姊妹都感到「門訓小組」攪小圈子，影響教會一般性活動，並害怕「門訓」路線成爲教會內分離的一股力量。這種憂慮並非無根的，不少「門訓工作者」對教會的工作如團契、主日學等都十分看淡，視爲無甚果效的工作，栽培信徒，完成大使命唯「門訓」路線一途，隨着「門訓」路線人數的增加，與教會矛盾必日益激烈。「新邨新人」在這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透過今年活動，有幾間教會參與，他們的領袖深爲活動的果效所感動，對「門訓工作」有新的看法，說不定會在教會中推行「門訓路線」，這也是「新邨新人」另一重大收獲。

這六、七年間，可說開始證實「門訓」路線是有果效的，它亦將會對呆滯了的香港教會帶來很大的衝擊，究竟「門訓」的成功是「方法」的成功？抑或是「眞理」的果效？「門訓」所結的果子是草木禾稭或是金銀寶石？師傅們，各人要謹愼自己的工程。

（作者爲港大畢業生。）

教會的忽略

——新大陸移民

中大團契社關小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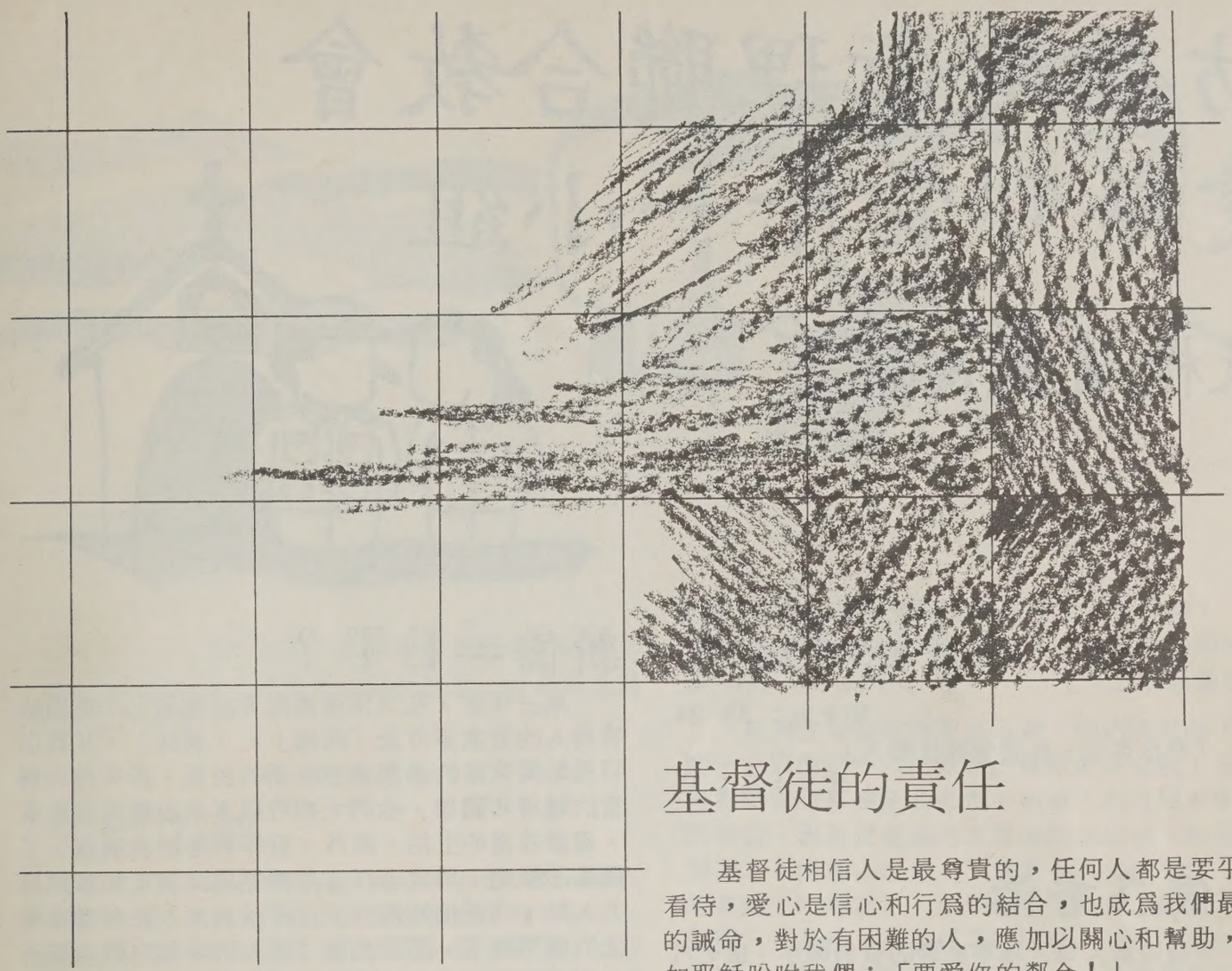
歷史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由大陸湧入香港的人數爲1,285,000人。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五月中，非法移民湧入的人數約爲三十萬人。一九七八年，更有不斷的大規模湧入現象。政府的「抵壘」（TOUCH BASE）政策則始於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改變爲任何非法移民，一經拘捕即予遣返，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三年間，從中國大陸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香港，並獲准居留的新移民的達四十萬人之多！新移民大多數是青年人，他們適應來港的生活感到有困難，大量移民使原來已面臨的房屋、醫療、就業、福利、教育、交通及治安問題更形嚴重，於是中國移民成了最顯著代罪羔羊，香港人便將這些社會問題歸罪大陸來客，所以據調查所得，普遍的香港居民對新大陸移民有很強的「因着偏見」（STEREOTYPE），他們喜用「綠印者」、「大圈仔」、「阿燦」，形容新近來港人士。

分析

資料顯示，移民極多投入建築業及製造業，入息及社會地位卑微，自然成爲香港社會結構的最底層。這樣一來，產生「移位作用」，促成「階層化的社會流動」，把本處於底層的本地勞工抬高到較高的地位，而中國移民變成階層結構中「墊底」的一層，他們成爲香港眞正的勞苦大衆。

香港人對新大陸移民的偏見是不正確的，有人把香港的經濟問題全歸咎於大陸移民是推卸責任的，因爲製造業頗大部份產品依靠出口賺利，勞工增加而引至工資停止攀升的情形，使對外競爭力強，直接造成更多就業機會。亦有人說數年內驟然激增的人口對原有屋宇構成競爭，使租金上升，但新移民的購屋能力低，而且要居留七年才有資格申請公屋，暫時不會威脅現正輪候的人士。而很多人認爲許多罪案都是「大圈仔」所做的，但根據最新的警方統計數字顯示，在八二至八三年裏，在原居民中有百分之二至十一被檢控，而新移民只是千人中有十八人而已，故此，事實上，新移民的犯罪率比原居民還低；他們亦因爲覺得香港居民對他們的不接納，而更加反擊香港人是「醜陋的香港人」，「同是炎黃帝胄之子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香港人和新大陸移民往往有一種敵對的心態。



他們的困難

除了適應方面感到困難外，他們最感困難的要算居住問題，他們大多數居住在木屋區：他們在香港很難找到一份適合工作，特別是大陸下來的知識份子，他們國內教育的資歷不受香港社會所承認，故許多教師、醫生、工程師等都在工廠及建築行業工作，相信這個問題需到一九九七才可望解決。另一方面，他們在語言及文化背景的隔膜大，與人交往極感困難；新移民大部份年齡由廿至卅五歲，而且多爲男性，形成婚姻的問題：新移民中有百分之十一是學齡兒童，因其英文程度低，使其學習上有很大困難，很快在中三淘汰試中被淘汰。

在四月二十九日，一個由福建來港的少女，因居住環境擠迫，與弟弟口角而蹈海失踪；有兩個女子來港被迫與人同居；有一個女子險遭賣落火坑，亦有一女子，爲求留港，委身鰥夫而被騙。這些新大陸移民的悲劇，每天在上演，我們是否袖手旁觀!?

基督徒的責任

基督徒相信人是最尊貴的，任何人都是要平等看待，愛心是信心和行爲的結合，也成爲我們最大的誡命，對於有困難的人，應加以關心和幫助，正如耶穌吩咐我們：「要愛你的鄰舍！」

J.R.W. STOTT在ONE PEOPLE-HELPING YOUR CHURCH BECOME A CARING COMMUNITY一書中說基督徒要有聖靈的神力必須要有見證（徒一：八），耶穌關心勞苦大衆底精神意味着教會應以勞苦大衆爲我們見證的主要對象，但願我們到審判臺前，耶穌不會對我們說：「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

最近，在關心新大陸移民的組織中發生了一件很可悲的事。基督教服務處的新僑服務因缺乏各方面的支持而結束了服務，對新大陸移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們要問香港教會爲甚麼對新大陸移民不聞不問，袖手旁觀？

我們作爲大專基督徒的身份，是應該盡我們的責任，引起教會人士對新移民問題的關注及有正確的認識，承擔起對勞苦大衆的福音使命和負擔，使其不被社會醜化，使社會善待他們，通過多種服務，協助新移民適應本港生活，提高他們工作技能及社交技能，使生活得以改善，增強他們作爲香港市民的責任感；基督徒的愛心在具體行動的社會關懷上彰顯出來，以致基督的名因基督徒的見證而受尊崇。

訪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邨堂十一小組

橄欖資料組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

利十九：33-34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嗎？」

太二十五：35

新僑在香港

根據香港人民入境事務署的資料顯示，由七八年至八三年初從內地進到香港的新僑人數有超過五十萬之多，亦即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在這五十萬新僑當中，有七成的年齡是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男性約佔百分之七十，來自農村，恰巧亦佔了七成。最初到港的新僑多數集中在木屋區，不過到近期，他們喜歡集資去租一些大廈單位來居住。現時新僑多分佈在香港的工廠區，如柴灣、北角、觀塘、秀茂坪等，原因是他們多是出身自勞動階層，比較適合工廠、酒樓和地盤的工作，而且這等工作時常可以加班，可以多賺點錢。

近數年，因爲香港的經濟狀況有倒退的趨勢，民生在沒有保障下受到威脅，於是新僑問題的嚴重性相對地提高，亦開始受到各方人士的注意和關懷。

新僑對香港的認識有限，亦未必有錢去過香港式的消遣，他們工餘時間頗難打發。有些有上進心的會到夜校唸英文班，但大部份的新僑仍然喜歡關在自己的圈子內，有的則受不了香港歪風的影響，染上了嫖、賭、飲的惡習。

新僑的男女比例是七比三，可是女性的僑民多數喜歡以香港原居民作擇偶對象，而香港的女性普遍看不起大陸來客，所以新僑在擇偶上亦出現困難。

新僑＝Ｅ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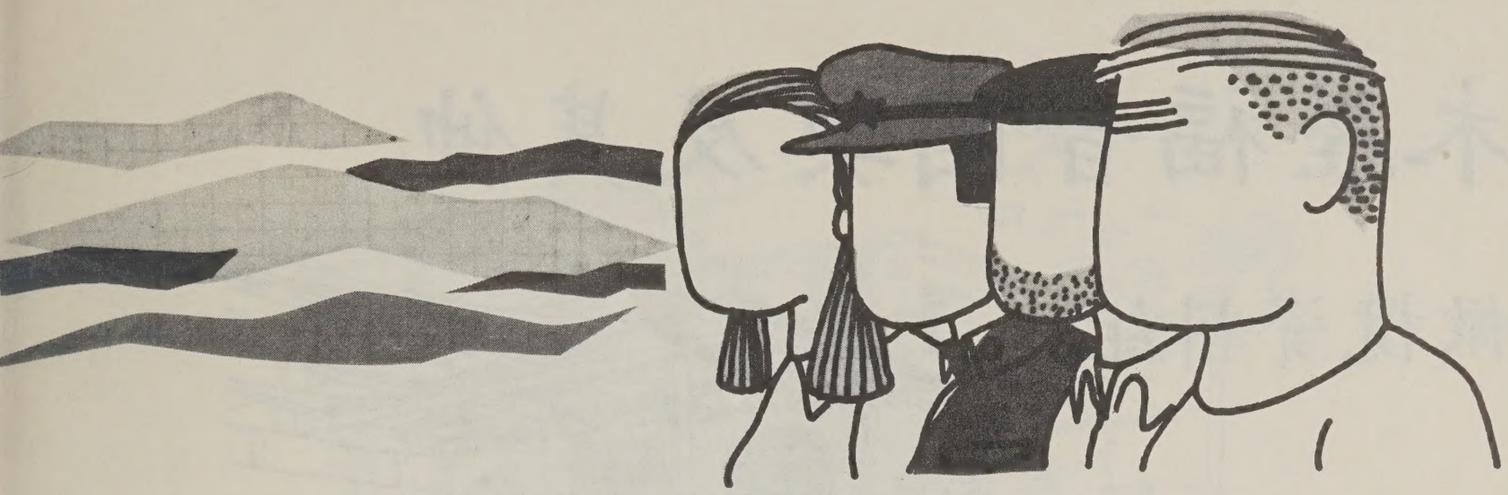
兩三年前，在大衆傳播媒介的渲染下，新僑給香港人的形象不外是「阿燦」、「表妹」。其實這只是新僑來港的過渡適應時期的表現，若果得到適當的輔導和關懷，他們大都可以逐漸脫離這些形象，適應香港的生活。此外，近年香港經濟衰退，工商業不景氣，導致各行各業都要縮減開支和裁減員工人數，而新僑的湧入，正好成爲港人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因而加強了港人對新僑的敵視眼光。不過在最近中大一份研究報告書中，發現港人對新僑的印象有改觀的趨向，原居民已開始接納他們成爲香港的一份子。

據被訪者稱，新僑給他的印象普遍是「肯學肯搏」，有上進心，善於觀察，但思想比較空白，容易受人影響。大部份的新僑都有家族的約束力，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很易爲人所知，假如一旦在港犯案，消息便會迅速傳到家鄉；這股心理上的約束力，迫使他們要奮鬥向上。被訪者又透露稱一些新僑會後悔來到香港，主要是他們未能適應香港生活，可是內地的親友都不相信他們的境況，令致他們進退爲難。

其實新僑的犯案率並不比原居民的犯案率高出許多。「大圈仔」的出現多是由於新僑民長期處於自我孤立的環境，對香港的生活又無法適應，在對生活水平要求高之下挺而走險。被訪者亦承認一些新僑來港只是爲了享受和犯案。

新僑問題日趨嚴重，香港又有些甚麼回應呢？

香港政府曾經作過一些片面的調查，諸如新僑人口的分佈，男女比例等，就着這些調查簡單的分析，但始終未有實際行動。至於志願團體方面，計有黃大仙鄰舍輔導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國際社



會服務社、男青年會等，爲新僑提供服務和輔導。而地方教會方面，就有循道衞理教會、愛華村堂爲新僑提供服務。

十一小組

「十一」這名稱的由來是新僑人數佔香港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十一小組」成立的宗旨是要充實自己，服務新僑。現時小組有四位基督徒導師，其餘的組員均爲新僑，而未信主的佔了大部份。十一小組最初是循道衞理愛華村服務中心的一個新僑英文班，經過一段時間，導師跟同學熟落起來，逐漸發展成爲現在這個團契模樣的十一小組；小組由成立至今，已經一年有多了。

小組每星期聚會一次。週會的編排和內容，主要針對新僑的全人成長。這個全人成長的訊息包括了德、智、體、羣、美、靈六方面，所以小組的週會有知識性的，如介紹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又有信仰性和交誼性的。被訪者強調他們的服務絕不是傳福音的手段，信仰性的教導是全人成長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福音訊息的傳遞，其實是導師與組員相交時的自然流露。

至於服務其他新僑的目標，小組會按着本身的能力去行。現在小組不斷鼓勵組員爲自己說話，如投稿報刊雜誌、和接受電台、電視台訪問、教育原居民、肯定自己的價值，並在文化、藝術等方面作出貢獻。

現時小組的最大困難是沒有足夠的弟兄姊妹願意投身事奉，幫助照顧組員。其他客觀困難諸如導師與組員間的語言隔膜，又新僑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多不能經常參加聚會等。

沉默的教會

經濟沒有給新僑帶來困難，他們擁有勞力、時間，所以他們可以比原居民賺取更多金錢；居住沒有爲新僑帶來擔憂和恐懼，斜坡下的木屋未曾使他們動容，因爲更危險的木屋他們也住過。新僑離鄉別井，不惜攀山涉水，千辛萬苦的來到香港，在人地都陌生的境況下，他們最需要的是家庭的扶持和溫暖、安全感、並烏托邦的理想，而這些精神上的支持，正是教會所擁有的資源。可是教會到現在還沒有察覺和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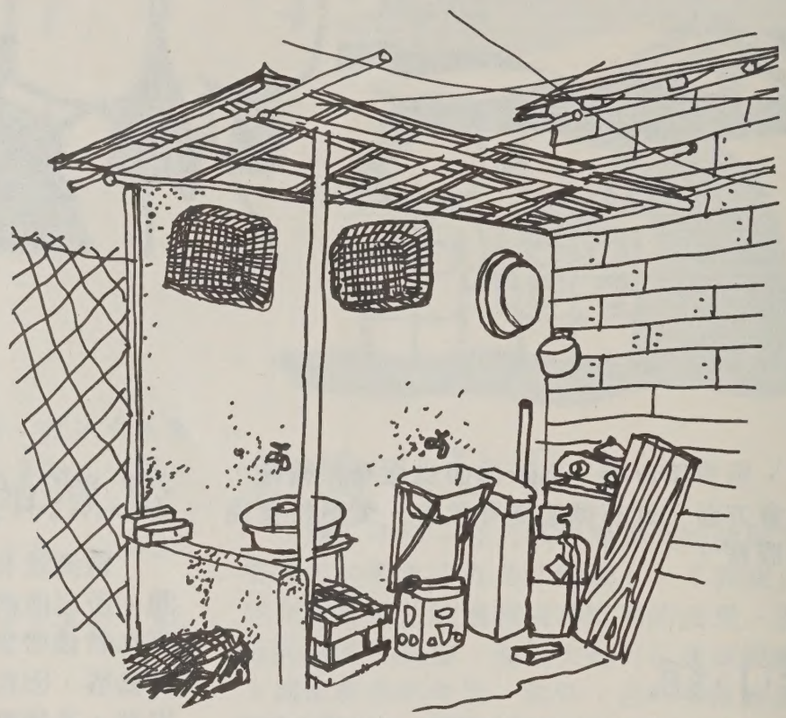
被訪者認爲透過新僑工作，教會的一貫宣教模式必定會受到正面衝擊，開始去體驗服務與宣講結合的成果。地方教會其實應該把握時機去吸納新僑，例如透過一些教會辦的廣州話班和英文班等去接觸新僑，更希望在班內跟新僑作生命的交流。

推廣異象

十一小組除了注重組內的栽培，對外的服務外，又計劃將小組的異象向其他教會傳遞。每季小組都會來一次總動員，去探訪別的教會，並且介紹小組的情況、目標和需要，盼望喚起弟兄姊妹的關注和支持。

木屋福音團契及其他

橄欖資料組



香港木屋問題

木屋是本地宣教工作焦點之一。

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解放，大量移民湧入香港，非法僭建木屋問題日益嚴重。近年來，由內地非法偷渡入境的人數不斷增加，再加上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市區的遷拆和重建計劃等因素，木屋問題更趨白熱化。昔日空置的官地或農地，甚至危險的斜坡地帶和後巷，均被利用作興建木屋。據統計，在一九八一年間，就大約有七十五萬名木屋區居民。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都沒有一個專責部門去處理木屋問題，亦無法制定一個全面而又妥善的政策來解決木屋問題。政府所關心的木屋工作就只有遷拆和環境上的問題。因爲工作上分界的困難，很多時候會有多個政府部門分別自行處理同一件工作，既費時失事又容易互相推卸責任。

考究一下，木屋區實在有許多居住上的問題，普遍來說是生活設施不足——如衞生設備及水電供應缺乏，垃圾堆積，和缺乏防火設備。電力、食水供應常被不法之徒干擾和控制、僭建、販毒、勒索、恐嚇、搶劫等治安問題，實難令居民有安定的生活，使他們覺得自己是沒有保障的一羣，生活得全無安全感。

除了居住環境惡劣外，木屋區也常受到天災的威脅——旱天有火災，風季有風災，雨季有雨災和山泥傾瀉，居民只有誠恐誠惶的掙扎渡日，政府雖於一九八二年度通過「十年建屋計劃」，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却是一個無了期的等待。

木屋福音團契的成立經過

一九八二年五月，香港多處木屋區先後發生嚴重的山泥傾瀉和木屋倒塌，釀成二十九人死亡，七百零九間木屋被毀，千餘名災民無家可歸。一羣關注木屋區問題的基督徒組成了「基督徒關懷木屋區小組」，商討一些實際可行的關懷途徑。這小組的成員包括社工、專業人士、義工和學生。七月間，小組曾到部份木屋區作實地觀察，又替木屋區評議會作問卷調查，了解居民心態、生活及對遷拆的意願，亦進一步的裝備己身對木屋問題的承擔。

同年八月，該小組舉行了分享會，邀得數位牧者和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到來參加，共同探討木屋關懷的方案，希望有較落實的行動，在注視這問題時，發覺一直以來教會並未有整體地接觸木屋區的福音工作，於是便開始聯絡對木屋區有負擔的教會和福音機構。其後，伯特利教會秀茂坪堂、工業福音團契、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部先後加入關懷小組，遂成立了「木屋區關懷計劃委員會」，去探討木屋福音工作的方向和模式，並在八三年初向政府申請註冊成爲「木屋福音團契」。

團契的異象

「木屋福音團契」的異象是協助和發起弟兄姊妹關注木屋問題，藉着愛心和對神的信心，結合宣講和關懷行動，落實地將福音傳到木屋區內；團契的最終目的是在木屋區內建立基督徒羣體，過整全門徒的生活。

現時團契正在官塘大聖村進行着一連串的活動。其實大聖村的工作乃團契所擬定之一個爲期一年的工作計劃；透過教會、機構和小組的合作，以一個嶄新的形式在木屋區內進行福音工作。在這期間，團契以大聖村外圍的伯特利教會秀茂坪堂作爲福音工作的基地（團契稱之爲「邊緣教會」）；一年之後，若果計劃可以順利完成，團契將會退出大聖村，把以後的跟進工作全交給伯特利教會；而團契會到其他木屋區開始新的工作。

大聖村工作計劃

大聖村是政府改善木屋環境的工作重點之一，它現有的設備，估計可以維持五至十年。但實際上區內的衞生設施、街燈、走火通道、水嚨喉等，都有改善的必要。

居民當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是新移民，其餘的都是香港原居民。他們生活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安全感，經常擔心火災和暴風雨的來臨，居民日常的生活十分簡單，除了在家中看電視，或是三五知己「耍樂」一番外，很少有別的娛樂。鄰舍之間大都彼此存有戒心，很少能融洽相處。

大聖村內沒有教會，却有一間「大聖廟」。

八三年上半年度，團契的工作重點是與村內居民建立關係和樹立團契形象，活動包括在新春期間派揮春、舉辦新春聯歡會、和做家訪，讓居民認識這個團契。在四、五月，有「健康月」，重點放在居民的「身、心、靈」健康問題上，有專人負責替居民免費驗血、驗眼、磅重、度高等，亦有嬰兒護理和家庭衞生的介紹。此外，又會在伯特利教會放映幻燈，內容談到怎樣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介紹心理健康等。同時亦邀請村民參加教會，讓他們知道教會是開放和歡迎他們的。

在八三年下半年度，團契開始村內的福音工作，所採用的方式仍在摸索的階段，還未有清晰的概念。大致上是以家庭爲單位，以父母作爲主要接觸對象，而後影響其兒女，又藉個別家庭將其影響力向外發揮，因此這形式會有點皓似家庭教會，以木

屋區內的一兩個家庭作爲根據地，舉辦查經班、祈禱會等聚會，不過這模式是否可行，迄今還是未知之數。

由於職業上的關係，區內居民的上班時間與一般人不同，他們的工作時間比較長，所以傍晚的教會聚會會不太適合他們；加上街燈不足，通道狹窄不平，居民極少夜間外出，所以團契需要構思一些不同形式、不同時間的聚會來接觸和栽培他們。

一點反省

將來木屋區教會是以怎樣的姿態出現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有形的組織，或許因受不起時代變遷的衝擊而崩潰，因此較這更迫切的工作是加強整全信徒的訓練，建立個人對信仰、對家國的正確觀念，而這正是每一個基督徒應履行的，在信仰反省中不斷警醒和裝備自己，尋得信仰的可靠性和眞實性，將來不會因任何政治或經濟社會的變遷而畏縮下來。

回顧近年來教會的「關社」行動，已有不少健康的進展，社會關懷已由空談轉移到落實的工夫，關社行動亦與福音宣講享有平衡的地位，使信仰與服務溶合，發揮合一的見證。現存的問題是有否弟兄姊妹願意參與、領導、策劃和推動工作？社會關懷的實際行動，又能否由一小撮教會推廣到香港的每一間教會？

無可否認，現今大多數教會，對「關社」問題仍抱着保守和觀望的態度，一個例子就是「基督徒關懷木屋小組」在八二年八月舉行的分享會，受邀請的教會有六十多間，但只有三、四間派代表出席。教會能否打破自己狹猛的圈子，進到人羣，照顧他們，就要看教會的領導人如何面對信仰與時代的適切性。

將問題再作分析，便涉及到傳道人的訓練方針，一般教會的傳道人通常是在中五或中七畢業後，進升到神學院肄業，受保護的教育環境裏長大，很少接觸周圍的事物、或任何思想上的衝擊，因此他們也許未嘗試嚴謹正視教會對社會的責任問題。

但無論如何，一班醒覺的弟兄姊妹，已着意地從關懷社會入手，進行木屋區宣教工作，將宣講福音和關懷合一，實踐在擁有七十多萬人的禾場中，預備撒種、栽種，他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班能與他們同心合力的義工，你有否負擔加入這個撒種行列？

V. Good Inde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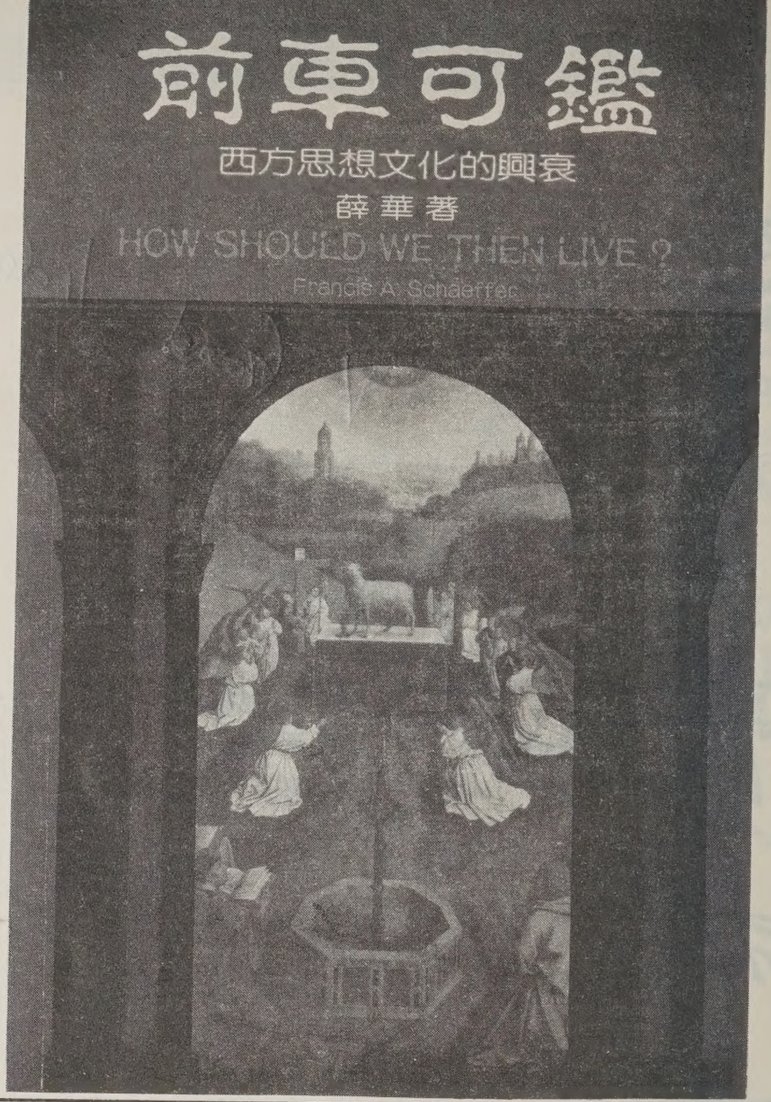
構成神学的因素

余约翰

凡對神學關心的人，都會對神學發生幾個問題：第一、關乎神學的內容的問題——神學研究些什麼？二、關乎神學的方法的問題——怎樣研究神學？三、關乎神學的目的的問題——爲什麼研究神學？當代一位存在主義神學家約翰麥考利（JOHN MACQUARRIE）在「基督教神學的原則」（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一書的引言說，神學是「藉著對信仰的參與和反省，從而尋求用最清晰、最連貫的語言來表達其內容的學問。」（註一）他說明了構成神學的幾個重要的因素：信仰的體驗——「參與」、信徒的思想——「反省」、和信仰的表達——用最明瞭和系統的語言。神學不是信仰的本身，也不是對信仰的一套客觀的概念而已，而是一種親身的體驗，經過深切周詳的思考、理解，然後表達出來的信仰。

當我們要著手研究神學時，當然要弄清楚神學的內容。我們常常以爲聖經就是神學的全部來源，神學研究就是聖經研究（聖經研究是神學研究的一種），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把神學的範圍和發展的可能局限了。或許，是由過火的「聖經主義」（BIBLICISM）所造成。其實神學最基本的來源和思想的範疇應該是上帝在基督裡的自我啓示，上帝可以透過自然、歷史和人際關係來作啓示，但上帝以道成肉身的基督，作祂最具體和最完滿的自我啓示。而聖經就是上帝在歷史中的救贖作爲的記載，亦是上帝在基督裡的啓示的記錄。但聖經不是我們信仰和崇拜的對象，它的作用是給基督作見證的（約5：39）。聖經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提後3：15），但基督才是救主，祂才是擁有生命之道，本身就是生命之道的那一位。聖經作爲使我們能認識上帝的指引，是神學的來源之上，而非神學的全部。

此外，我們應該重新思想我們對「傳統」的看法。羅馬天主教認爲上帝藉聖經和傳統傳達其啓示；基督教向來只接受聖經。當我們研究教義的發展和教會的形式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傳統能幫助我們了解和確定正確的教義。尤其是當我們應付異端的問題時，我們更要從教會的正統性和連續性入手，確定信仰的正解。在聖經寫成並編輯成集之前，是以口傳的形式流傳在教會中（林前11：23；15：3），後來，各教會所「流傳」的材料更成爲編寫新約聖經的根據。教會後來要決定那些經卷是正典，那些不是，亦是根據各教會有沒有接受或使用的傳統。正統神學（教義）的建立和澄清，亦是以使徒一教父一脈相傳的傳統爲基礎。「傳統帶領我們回到經文或教義的歷史的脈絡中，找尋其原意



並所駁斥的謬誤，而讓我們在今日的實況中加以再思。所以研究神學時，不能不注意神學的「教會傳統」。而我們亦會發現，神學的研究常常受到不同的教會傳統所影響。

構成神學的因素，還有其他的因素，經驗、文化、和理性都佔一定的成份。所謂經驗，包括信仰的體驗，和人生的體驗，信仰的體驗是引起神學反省的動機。沒有信仰的體驗，就沒有研究神學的動機。沒有經驗或不以經驗爲內容的神學，是沒有生命的神學。但我們不能過份強調經驗，因爲宗教經驗有很多種，太強調經驗的，很容易會因某一種特別經驗而歪曲了神學，或以某一種個人的體驗泛濫成爲普遍的屬靈原則；個人的主觀經驗，必須受到信仰的團體——教會集體的客觀所平衡。

神學也是一門思想性的學問，當我們嘗試「用最清晰、最連貫的語言」表達信仰，使別人也能明白的時候，我們就牽涉到文化的問題。人人都會受到他自己的文化背景所影響，神學家的思想方式直接會影響到其神學的見解。因此，根本沒有一套完滿的神學，神學需要不斷研究，因爲神學的架構受到文化的影響，在不同的文化中，需要不同的處理。當文化的形式改變了，神學的表達也要改變。所以神學必須「本土化」，我們沒有可能把西方的神學全盤移植過來。美國一份神學性雜誌「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的編輯指出基督教的教義有太重的「雅利安偏重」（ARYAN BIAS），使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新興教會發揮自己神學的創造力和傳福音受到很大障礙。（註二）今日華人教會，無論在神學教育的形式、教會的模式、神學的思想、護教和佈道的方法，不是從美國搬過來的就是向德國借過的，並且以爲是最純正的神學或是最先進的思想。別人的經驗，我們不妨分享、參考，但我們自己的東西，什麼時候才可以建立起來呢？

最後，我們要考慮理性的地位。有人認爲理性與啓示勢不兩立。其實上帝的啓示必須爲人所理解和接受，我們需要理性去接受和瞭解啓示，神學是一門智性的學問，排除了理性的功用，神學就不能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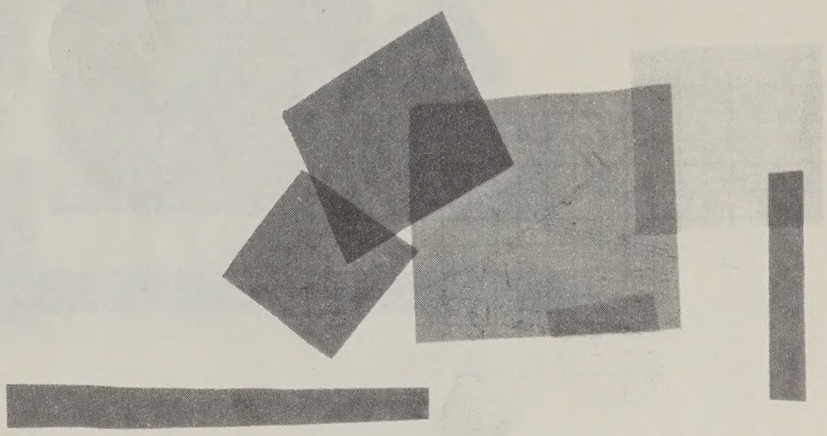
（作者爲香港信義會平安堂堂主任。）

註一：John Macquarri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77, p.1

註二：Alan Geyer "Towards a convival Theology"
The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23, 1969, p.542

也談《屬靈操練禮讚》

士林



書名：《屬靈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作者：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
譯者：周天和
出版（中譯本）：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年4月）
頁數（中譯本）：共197頁

引言

素來缺乏閱讀習慣的香港基督教圈子，近來正爭相談論一本書籍，不少教會也相繼成立了讀書小組。掀起這股熱潮的，正是《屬靈操練禮讚》。

此書之所以廣受歡迎，除了蘇恩佩姊妹不可磨滅的推介功勞外，書籍本身的質素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坦白說，這是筆者近來所看的書籍中較滿意的一本）。作者以簡潔、淺易的言詞筆觸，在不足二百頁內清晰地交待了他對「屬靈操練」的意見，且不時輔以親身的體會，指出各項操練的重要性、功能及實踐方案，使讀者能具體地掌握書中要點，這是作者成功之處。

此外，當香港教會自以爲屬靈，信徒（包括筆者在內）普遍自滿，或雖自覺膚淺但苦無出路之際，作者却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禍因是淺薄」，不啻是當頭棒喝，喚醒了不少弟兄姊妹。而書中關於默想、禱告、簡樸、獨處、慶祝等章節的討論也發人深省。這正是本書可貴之處。

基於此，衆多著名牧師長執紛紛爲文，給予本書高度的評價。在數十篇有關的書評、讀後感中，筆者發覺有提出一點反面意見的，似乎只有莫昭友弟兄一人。筆者也願借此機會分享一下對《屬靈操練禮讚》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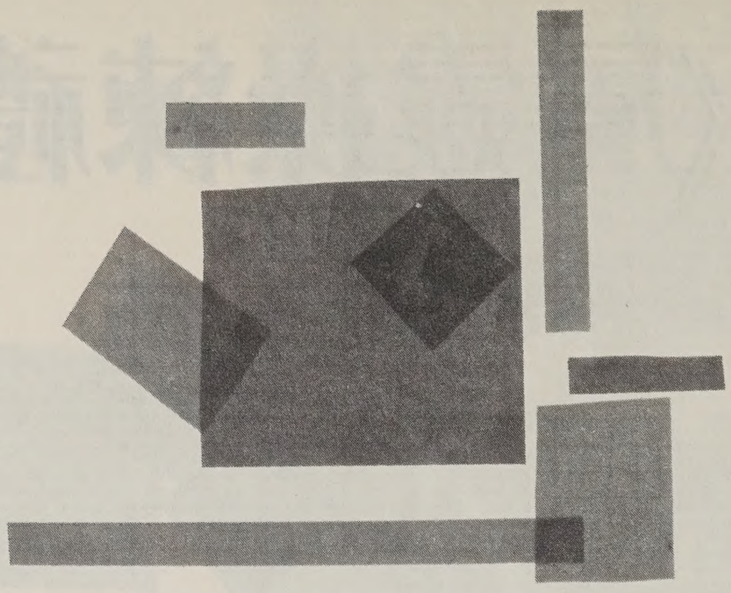
首先，筆者認爲書籍既爲人所寫，便必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也建基於作者主觀的價值取向及個人體驗之上，這是無可避免的事。作者立論及推斷時既無可能百份百客觀，則書中論點及內容之受作者的背景、文化及體驗影響和局限，只是個自然和合理的推論。而《屬靈操練禮讚》也不例外。筆者執筆爲文的目的，並不是要給本書撥冷水，而是冀望能冷靜、客觀地嘗試提出幾個簡短的論點，以供大家討論。而既然事前已有極多讚揚《屬靈操練禮讚》的文章，筆者也不欲重覆這些觀點，只集中在本書無可避免地含有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上。

何謂「屬靈」？

本書雖名爲《屬靈操練禮讚》，但却沒有開宗明義地指出何謂「屬靈」。當然，作者本身相信對「屬靈」一詞會有其個人理解，只可能是基於種種假定（如信徒對屬靈的體會應無大分別，故不用界定等），沒有爲「屬靈」下個定義，而逕自談甚麼叫「屬靈操練」，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作者本身爲美國人，其寫作對象相信不會以香港信徒爲主。那末，香港信徒在接收「屬靈」這個訊息時，是否會以一貫對「屬靈」的理解取代了作者的理念，而誤解了作者的意思；又或者作者對「屬靈」的理解，是否也是無懈可擊呢？這些都是我們在讀這書時要留心的。

香港的華人教會，普遍還是持着一個特別的人觀——即人是由靈、魂、體三者合成；靈爲三者之



首，是與上帝溝通，有知罪悔改功能的部份；魂是指個人的理性，雖可盡思維推論之責，却不能與生命之源溝通，罪的傾向也潛藏在內；體則更是取死的身體、是慾望的化身。此外，亦有持守着清教徒傳統，把「靈」與「慾」，「屬靈」與「屬肉身」、「屬世」完全分割對立起來的。

基於此，我們常常容易的把屬靈與否等同爲一些活動，或是一些工作。比方參加聚會爲屬靈、看電影爲屬世，讀經祈禱靈修爲屬靈、跳舞打球聽音樂爲屬世等等，例子不勝枚舉。於是我們便常常看一些蓄短髮、手抱皮面金邊聖經、滿面嚴肅、口邊常掛着基督教術語，只看「屬靈書籍」、興趣是讀經祈禱、嗜好是「傳福音」、渾身「靈氣迫人」，甚至比上帝還屬靈的「屬靈人」。

但是，屬靈眞箇只是一些活動、一些深受某個特定階層的文化所影響的形象嗎？要是如此，防止墮入律法主義、教條主義的保障在那裏？能肯定這些活動和形象是正確而又全面嗎？

從聖經的角度看，我們可發覺屬靈原來是「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裏」，是一個恩典、一種信仰狀態，而不是一些活動、一些形象（註）。於是，我們便不須執著以說方言、用皮面金邊聖經、返聚會從不間斷、滿口溫柔愛心、熱心積極事奉爲屬靈的準則。因爲這些都是一些行動，一些表現，縱然這些表現是屬靈的自然流露，也不應與屬靈本身混爲一談。

屬靈＝宗教禮儀、個人主義與神秘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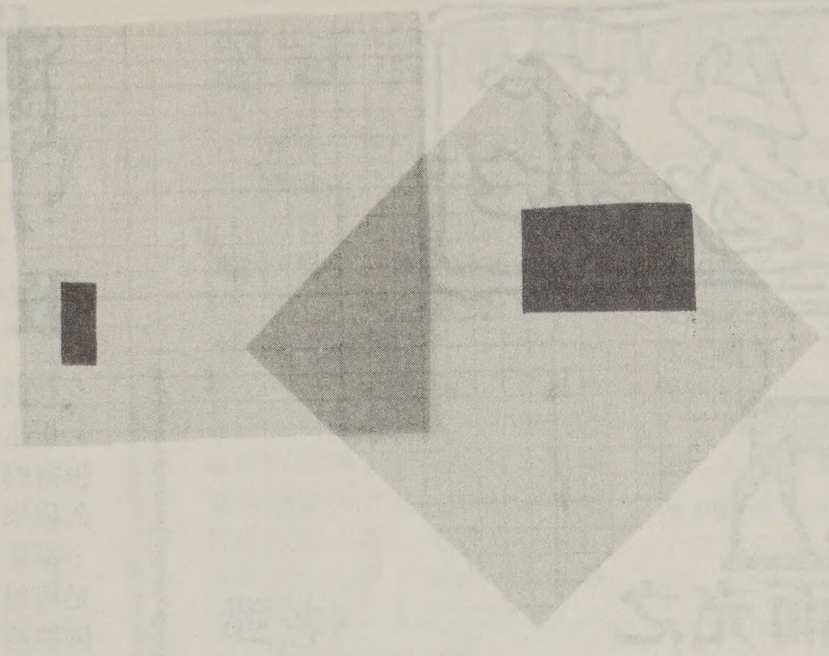
回到書籍本身。作者既未能爲「屬靈」下定義，而逕談「屬靈操練」，實在犯了治學著書的大忌。就正如我們教導一些不知火爲何物的小朋友不要玩火，縱使我們的教育技巧高超，表達生動，小朋友也頂多只知世上有樣東西叫火，和它所帶來的某些後果，却仍不知究竟「火」是甚麼。

然而，我們也可從譯者論「屬靈操練」中整理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作者談屬靈操練時，自然包括了屬靈最重要的表現，即默想、禱告、禁食、研究、簡樸、獨處、順服、服事、認罪、崇拜、引導和慶祝。關於作者是否認爲這便是屬靈操練的全部項目，我們無法單以一本書知道。但我們却可肯定，縱使作者認爲屬靈表現還有其他項目，這些項目也不太重要，否則作者已包括這些項目在書內。細心分析，我們可得出如下歸納：

1. 除研究和簡樸外，其他各項操練均與傳統的宗教禮儀有密切的關係。
2. 各項操練雖可於羣體中進行，但大部份還是較宜於個人操練，作者也常常強調個人修養的重要性。
3. 作者更不斷提及與注重操練中的「屬靈經歷」，並常常以此爲準則。

先談第一點。承接聖經對屬靈的定義，我們可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大部份與書中所述的屬靈操練有關的宗教禮儀，都是源自屬靈的合理引伸，也是任何基督徒羣體中必然發展的運作規章制度。可是，我們必須警惕的，是切忌把這些禮儀作爲屬靈的準則，或乾脆等同屬靈。林後三章17節提到「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自由」，再配合信仰中其他要點，明確地指出屬靈的必然後果是自由釋放。這種自由，是除去一切蒙在臉上、心中的帕子，是超越活動表現界限規條的自由，是從罪中釋放自己及他人的自由，是免受教條割禮規範的自由。

關於個人的一點，筆者基本上同意信仰是個人的事，而因着各人對信仰的不同理解、各人取向各



異也是個人的事。但是，上帝却須下命令，叫我們在重生後必須加入羣體中生活（否則便不需要建立教會），而上帝更給予我們一些普遍的召命，如學效基督的樣式、遵守祂的誡命等，以作我們生命的大方向。如此，我們的「個人」是必須在某些特定範圍內才有意義。相對現時個人主義泛濫的情況，，我們在讀本書時似乎須加倍警覺。

第三點是關乎「宗教經歷」、「內心感受」的問題。作者在談屬靈操練時，極強調一種內心的領受、以致有時給人一個屬靈就是唯心、神秘主義的印象。誠然，信仰既是主觀選擇，亦要求我們全然委身，便必然包含唯心、神秘主義的感性成份。然而，我們的信仰却絕非只有唯心、神秘主義的成份，屬靈亦不一定與「合理性」對立。在書中第一章裏，作者談及默想時，對夢的高度重視，就使人有這樣對立的印象。在談及研究時（第五章），作者說這是一種特別的經驗」（頁62），却沒有詳加闡釋，也沒有提及研究中極重要的理性。此外，在談及禱告時，作者對「想像」的處理也發生了同樣問題。歸根究底，要是我們相信我們的理性和感情皆按神的樣式而做，那末，我們爲何不能相信兩者皆爲與神溝通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同時相信兩者均有其獨特功能和是相輔相承的。

與此相關是屬靈與計劃的關係。不少信徒認爲我們既要尋求聖靈引導，就必須摒除自己的意見和計劃，而靜心尋求聖靈的指引。本書不少地方（如順服、引導等）的處理，在這方面均不夠徹底，作者亦時有模稜兩可，甚而有屬靈、計劃互不相容之意。事實上，如上推理，計劃肯定不是與屬靈對立。如此，我們又爲何不能在信仰的路途上，使用上帝按祂心意自由賜予我們的理性和計劃才能？畢竟，葉慕羅和尼希米豈不是重理性、重組織、重計劃，而又深受神重用的僕人嗎？

最後，承接上文關於屬靈的定義和討論，筆者認爲要是我們眞正明白屬靈的意思，便須在本書加入自由的操練，羣體生活的操練，運用理性的操練，愛鄰舍的操練，聖潔的操練，公義的操練，時代先知的操練，道成肉身的操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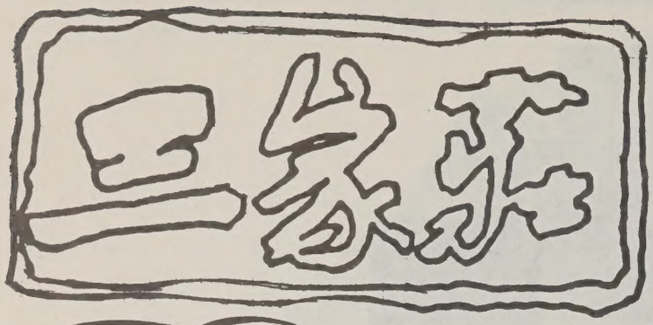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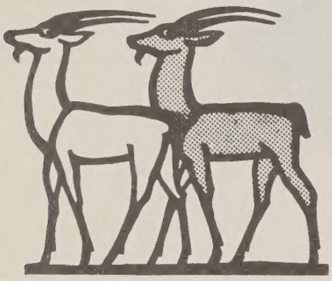
本書還有另一些較微少的瑕疵，如作者在討論每一項操練時，都會提出一些實踐的方法步驟，這是十分好的。但是，讀者在閱讀時，該緊記這些方法是作者從特定的環境和資料中提煉出來的，並不一定適用於每個非西方信徒。如林徑漫步，四十天禁食，二三天的退修研究，認罪禮、澄清會議、排演家庭復活節話劇等，都是一些較明顯的例子。

總括而言，筆者認爲這是一本極之值得推介的好書，也是一本我們看後應實踐的書。只是筆者認爲閱讀書籍時須有一個獨立批判、基於實際處境、客觀全面而又開放謙卑的態度，方能有所裨益，亦不致辜負了作者一番心血，才冒昧提出幾個簡短的要點，以圖一起建立屬靈操練的觀念。文中間或有看似嚴厲的批評，亦不過是筆者抱愛之深、責之切之情，以免糟蹋了這本好書而已。

倉猝成文，錯漏在所難免，還望大家多加指正。

註：筆者無意詳細討論屬靈的眞義，讀者可自行參閱HARVIE CONN的“ CAN 1 BE SPIRITUAL & AT THE SAME TIME HUMAN？”（中譯本見《橄欖》第16期）。





把愛擴而充之

老鄧

現代社會，二人世界甚爲人所重視，因爲在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裏，沒有了傳統社會那種親和緊密的關係，個人難以找到安身的地方。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變得陌生起來，總之難以找得到較爲恆久的關係。而二人世界却可補此之不足，個人可以去掉孤獨，可以有一個人時常伴在身邊，互相傾心吐意，在大社會裏一切令人不滿意的怨屈，都可以在二人世界這個關係裏找到慰藉。依此說，所謂兩情相悅，基本上是內向的（INWARD LOOKING），不需要其他人參與；而事實上，第三者亦難以分享。很多基督徒戀人也是如此，滿足於卿卿我我的二人世界，像「拖拉機」一樣形影不離，於是就與其他人脫節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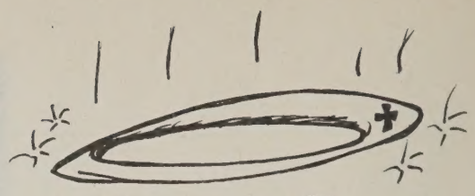
依這個分析，由戀人之間產生很多麻煩，其中一個原因，亦在於兩人之間的關係是內向的，太過專注於二人之間的感情關係，於是互相要求對方如何如何，當對方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時，就會產生很多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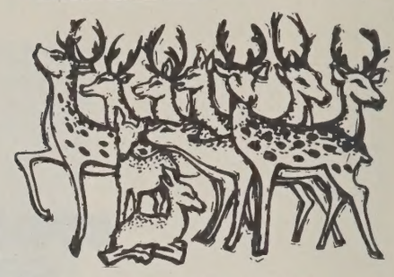
可是，在基督教說來，愛應該是散發出去的，所以二人相愛的結果應該是外向的（OUTWARD LOOKING）——透過兩個人，更能將神的愛彰顯。即是說，二人相愛的結果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應該是跨越二人，向外顯出光輝的。說得更形像化一點，二人世界的關係尤如一個「基地」，有了這個「基地」，我們可以散發更多愛，與人分享。

這個說法的實際含義是，兩個人是否應該重新反省，純粹二人世界的時間是否太多了一點呢？是否能將這份甜美的時刻更好地利用，分與其他有需要的人呢？二人世界除了是逛街、看電影、談心以外，是否可以參與某些羣體性的活動呢？是否可以用來服務其他人呢？把這個概念加以實行，等到戀人結婚後，相信他們更能懂得將自己的家庭開放起來，與其他人分享。

以上所述，不過是一些提議而已。綜觀基督徒的談戀愛模式，不少都走向「二人世界」的老路，把兩個人封閉起來。而且，談起戀愛來，總是感情先行，理智掉在後頭，很少會想及這些問題。因此，在談戀愛問題上，基督徒能否產生一套新的「抗衡文化」，還有待各「新進」戀人或「準」戀人一起去開創，去發掘。

（作者爲中大同學。）





教會辦學？

教育顧問團的報告書出版了，引起不大不少的反響，雖然報告書的內容了無新意，只是將長久以來香港的教育問題再次鋪陳：母語教學、考試過多、學位不足等等。却也叫人重新關注起這個被冷落了的社會問題，座談會，研討日紛紛出現，熱熱鬧鬧的，總算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吧！

突破論壇就這個問題舉了一次論壇，題目是「教會辦學與教育改革」，出席這次論壇之後，心裏有點激動，實在不吐不快。

席間基督教協進會的REV. WENDELL KARSEN說了一句一矢中的的話：要先放棄福音主義，才能使學生成爲基督徒（FIRST GIVE UP EVANGELISM BEFORE WE COULD EVANGELISE STUDENT）。事實上，基督教近百年來在中國辦學的主要目標是訓練傳道人，將基督徒全盤西化（WESTERNIZED），避免他們沾染世俗。結果却是使基督教無法在中國生根，以外來者的身份介入國是，引發國人「非我族類」的抗拒；那群從教會學校訓練出來的基督徒則完全與中國文化抽離，未能設身處地了解中國本土問題，更遑論對國運有所貢獻了。這是歷史的教訓，是付上沉重的代價所獲取的。

今天，在香港這塊土地上，教會辦學的勢力龐大，却似乎是未鑑前車。我們的目標不再是訓練傳道人，將他們全盤西化，却是極力使他們成爲基督徒。教會辦學的目標是傳福音；於教育，

光

則只有教導學生適應考試制度，後果是訓練他們做順民。

我們有以考試成績著稱的教會名校，訓練一批又一批入大學或出洋深造的學生；但無力幫助那些被淘汰的「低劣份子」。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再接再勵、找職業先修學校、報私立大學、甚至出社會謀生，做好頂天立地的好人；却無能挑戰整個教育制度。考試繁多和學位奇缺的情況依然。學校扮演着社會階梯的角色，少數能應合這制度的往上爬，大多數不能順適的依舊往下沉。教會辦學所培養出來的人與教育制度要求的產品並無異樣，只是他們不再是抽離文化，却是無條件的順服這大制度，百分百的委身於香港文化的人。教會辦學不斷的強化這社會分層，結果是基督徒漠視既潛藏亦表露着社會矛盾，不乏基督徒名流却缺少基督徒改革者。一塊最明顯的試金石便是九七問題，想想基督教能爲香港前途的謀途有多少貢獻，又試問我們從歷史上吸取了多少教訓。

教育改革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是與整體社會連在一起的，與房屋問題、青少年問題、經濟運作、政治文化背景不可分割的。檢討教會辦學故然少不了討論校長和教師的關係，學生和老師的質素，問題學生輔導等等。但這些都非主要的矛盾。關係重大的是教會辦學的方針和路線，和她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只有確立了方向，我們才能人道地照顧學生的需要。（作者爲港大同學。）

是新宗派抑或邪教

見

前兩年某些專挖港聞的報紙以揭醜聞的方式報導「邪教」，主要是懷疑好些女學生持聖經跳樓及其他自殺案與之有關，加上一些神秘教派的迅速增長在時間上脗合，以致「邪教」一度成了市民熱門話題。礙於這些被標烙爲「邪教」之教會的封閉，許多教會人士都往往因資料不足而不敢貿貿然批評表態，但近月來又有新教派發展到屯門去活動，使當地居民、教會及教育界都焦燥起來，甚至驚動了政務處，現已實行特別觀察。

在本港被疑是破壞而非導人向好的教派之中，有被形容引人入性的「上帝的兒女」（THE CHILDREN OF GOD），有呼喊派（極端靈恩？）的「香港眞耶穌教會」，及被人疑爲導人自殺的「香港的教會」。

在「上帝的兒女」散發的單張中，充滿了性愛暗示或死亡恐懼的訊息，彷彿濫交便是愛的眞諦，又用恐嚇信徒不得叛教或在教外揭露教中一切。這教派無疑對社會既有秩序不利，更非聖經教導下教會應有的表現，堪稱「邪教」，人人得而攻之。

除了神學上對「神醫」、「方言」等的辯論外，極端靈恩派在公禱時的手舞足蹈，大聲呼喊實使教內外人覺得教會的秩序混亂。這種嚇怕人多於讓人知情意的信徒表達方式，實在不符現代社會情況，徒使人覺得這似精神病院多於教會。這類教會畢竟慣於與其他宗派友善，一般性較傾向基要主義，除說似「怪教」外，並不似「邪教」般使人清晰指出謬誤，但實應收斂那種禱告方式。

更混淆難分的，是新教派的情況。歷來新教派的出現，多源於某些人對傳統教會的不滿，覺得不能透過其固有制度及工作方式實踐使命，於是拉集班底，自己在新的工場地點建立教會。這些教會一般都會覺得自己所創立的制度、儀式、工作方式、釋經等較符合聖經。有的漸漸察覺到己力在閱歷經驗信仰理解上有未足之處，是可以參考傳統教會或書籍的，便會漸次開放自己，透過交往吸收他人所長；另一些却走了極端，覺得他們的教派是唯一的眞教會，又專利化似的控制教會的釋經教訓，說其他的不外是異端。

自命爲信仰的唯一仲裁者，便會很有理由「搶羊」，用強暴方式傳「道」，勸止會友有較廣闊的視野……在沒有批評（也不接受批評）的情形下，封閉、自義等引來神化式的教會領導層，帶有恐嚇色彩的栽培控制，局限了信仰生活活潑多元的性質……沒有與其他信徒接觸交流的結果，還不是看不到自己那一套的強弱處，亦未能乘着對更佳方式的了解更正改進。

我們不是要一棍子打死這些發展迅速的新教派。他們往往不致像異端般歪曲基督教的救恩觀，但却會有好些不智的、過份的儀式、工作方式、神學思想等，把片面的聖經眞理擴大而漠視了另一大部份。既是領導層一時未能察覺自我封閉的不良影響，大抵進了大學的弟兄姊妹，可多開放自己，不囿限於同教會會友的細胞小組，而與其他教會弟兄姊妹多交流溝通，把別家的經驗看法參詳比較，把反省結果帶回教會，便有利於教會的更新，也免了外人對宗派主義見笑。（作者爲港大同學。）

●墟集 阿丙獨愛這瓢飲

紐人

在教育界那個圈子一一一班「壓力人」、「教育專家」、「顧問」說：「要推行免費教育；讓學生有平等的教育和學習機會」、「提高教師的專業精神、改良教師質素；設立教師公會」、「取消中三淘汰試；考試給學生太大壓力了」、「學校課程不應被考試帶動；考試制度足以支配學生在課室裏的學習方式及內容」、「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推行活動教學法」……。

在學校一一

教師甲在授課的時候：一個學生站起來在原位轉一個圈後坐下。

教師乙翻開教本，準備授課的時候：坐在後排的一個學生走到課室門口、開門、步出走廊、倚欄張望，兩秒鐘後返回課室。

教師甲在教員室批改作業的時候：一個學生拿着一把鋒利的小刀站在他面前說：「這小刀可以殺死人嗎？我想用它來自殺。」

教師乙走過小六的課室的時候：一個寬解了上衣鈕扣的學生向她招手說：「姐姐，有興趣嗎？」

教師甲繞着課室巡查學生家課的時候：一個學生的頭低靠書枱，他褲子的拉鍊沒拉上。

在教員休息室一一一班教師和一個校長在開校務會議，他們投票通過了上次的開會紀錄：「你，不能要學生留堂；家長會罵學校的。你，搞這麼多活動幹甚麼？學生不會聽你那套。你，想吃飯就不能體罰學生；罰企也是體罰。你，最好將那班不合格的績分改爲合格，不然家長會要學生轉校。你，想搞好那班的秩序，要先收買他們的大家姐；那個黑社會的。你，不能趕那學生出校，因爲他正在接受九年免費教育。你，那個學生今天要跟家人去吃喜酒，你讓他早點下課吧！」

讀書季節又告一段落，大學和師範學院仍舊湧出「學飽」的熱血分子，他們大多抱着理想準備爲人師表。實在教人想不通：年復一年，總有人量估不清自己的能耐，愛心和毅力（自我高估似乎是一般人的心理衞生方法），剛踏出溫室就跳入作育英才的「冷水缸」。爲免熱血人成了冷血人，日後拉拉扯扯的混飯吃，也許要㈠熟讀「愚公移山」，學習恆心和毅力。㈡細讀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節「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學習那份勇氣與儆勁。㈢研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學習做人持守由始至終如一的做法。㈣學習「文天祥視死如歸」不怕犧牲的精神。㈤時刻以最近引人注目的國際教育顧問所引述的一番說話作警惕：「引進新制度之難，非其他困難可比擬……所有在舊制度下獲益之人，固然會與之爲敵，即使是可從新制度中獲益者，亦只會作冷淡支持。」

想保持暫時的心境愉快，心靈純潔，大可以把前面的點點滴滴當作虛構的，純屬巧合和雷同的事。

不過，這時候在一所中學的頂樓班房盡處，阿丙正勸告學生愛惜光陰和留心上課，一個手舞足蹈的學生大叫：「你都儆的！」阿丙呆望着枱上教科書和大堆學生的作業，低緩的自言自語說：「是，我是儆的。不過，希望我儆都能教你不儆。」阿丙獨愛這瓢飲。

●墟集 冒險，值得嗎？

陳佐才

隨着一九九七年日漸接近，港幣價值日日下挫，香港人心的不安，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個時候，教會能做甚麼？

許些教會的人，假如是屬於中產以上人士，早就開始設法移民。

也有一些懷着羨慕的眼光對我們做牧師的說：你們比較容易有出路，因爲美加移民局對於牧師申請，容易批准，雖然那邊牧師已經不少，但只要教會說要的是你，因爲是宗教偏好，移民局也會尊重。

一眼看來，好像有點悲觀。

但情形却不全是一樣。

一位神學教育的同工在考慮何時出國深造時說：「我不會選擇這兩年，因爲這兩年對香港的將來有決定性的影響。人生幾何，我不願意錯過這個與別不同而又關鍵性的時刻。」

一間基督教雜誌公開宣佈，它的工作人員不會撤離香港。雜誌也不準備關門，除非被禁止，否則他們會繼續辦下去，爲青少年工作。

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也說：他不會移民，他會繼續留在香港，與市民學習一起生活下去。

一位神學畢業的同學特別和丈夫跑到外國去學

習農科，預備學成歸國，爲中國四個現代化獻出他們的一切。

一羣神學教育工作者看到了異象，深覺將來教會中配搭的重要，正全力提倡彼此欣賞，互相尊重，同心合力，爭取時間，努力建立良好的基礎，使香港教會在面對轉變時，能更有準備。結出更美的果子。

有人喜歡「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的生活。但有人却喜歡在黑暗中去摸索，在風浪中去操舵。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的氣慨。

其實以上所說，都隱藏着一個假定：一九九七是香港暗晦無光日子的開始。但這個假定是會百份之一百眞的嗎？

十年的文革不錯使人心寒，但在文革過程中，那一個中國人沒有受過創傷？既然廣大的人受到創傷，誰肯去把文革「復辟」。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好些地方都不大成功，但在人民生活保障水準一般的提高，全國衞生教育的成就，教育的普及化，現在務實政策的推行，宗教自由政策的再度落實……等等都該可以使我們放心。

我問一位國內的教會領袖有關愛國愛教的問題。他激動地回答說：直至現在，如今的政府是近代最能管理全國的政府，我不去支持她，使她更公義，我不去愛她，使她更人性化，誰去負責？難道是外國人嗎？

冒險？是眞的冒險嗎？

若是眞的冒險，又怎樣？

上帝爲愛世人的緣故，到世界上來冒險，祂眞的遇險了，被當作罪人釘在十字架上，但上帝的救贖大計却完成了。你我都得到益處。

一九九七是信徒信仰的試金石！願意在有生之年嘗試一次，接受大時代的挑戰嗎？

（作者爲中大宗教系神學組主任。）

●墟集 同性戀合法化

欣若

自從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修訂有關同性戀的法律以來，同性戀再次成爲熱烈討論的話題，基督徒當中正醞釀發起反對同性戀合法化的運動，筆者很想分析一下，究竟我們爲甚麼要反對同性戀合法化。

任何人如果肯客觀地讀聖經，都可得出一個結論，聖經是禁止同性戀行爲的，所以基督徒不同意同性戀行爲是理所當然的，正如基督徒不可以接納通姦淫亂一樣。然而爲甚麼在社會上佔少數的基督徒要透過法律去維持這道德標準呢？

目前香港並沒有法律禁止婚外性行爲，雖然法律上這可以構成離婚的一個理由，爲甚麼基督徒不要求透過法律去制裁婚外性行爲呢？同性戀和婚外性行爲誰較爲嚴重呢？這現象反映了一個事實，我們不會要求法律去維持每一項的道德標準。並不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不是錯的，雖然法律並不制裁婚外性行爲，大多數人都認爲這行爲是錯的；沒有人會因此而認爲法律肯定了婚外性行爲是對的。同性戀的問題就有些分別，香港一向都有禁止同性戀的法律，一旦這法律取消了，還訂明若雙方超過廿一歲而同意在私人地方有同性戀行爲是合法的，這就難免有鼓吹同性戀行爲的作用了。

反對的人說：同性戀是天生的傾向，並不是鼓吹就有的。不過事實可能並不如此，至少一些在同性戀和異性戀傾向之間的人可能會因同性戀行爲合法化而被同性戀朋友影響，以至成爲同性戀者。另一方面，同性戀的形成因素複雜，後天的因素可能更重要，一個接納同性戀行爲的環境，會否增加某些人同性戀傾向呢？這有待專家去解答了。

假設同性戀行爲合法化，做成同性戀者增加，但是同性戀對社會有何害處呢？只要不妨礙他人，同性戀只是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同性戀行爲和濫交有密切關係，濫交在健康的觀點看已經是有害的，在同性戀者社羣當中有許多性病和傳染病。在個人道德的觀點看，濫交本身會降低個人的道德意識，趨向於自私、放縱和享樂主義。法律既然要禁止毒品散播去危害個人道德，自然也應禁止同性戀行爲的散播以至影響個人道德。

不濫交的同性戀行爲於個人道德會有影響嗎？這個很難有客觀證據去回答，同性的戀愛是否和異性的戀愛相似呢？同性戀行爲在許多方面都模仿異性戀的行爲，一對同性戀者當中會有一個扮演較男性的角色，另一個較女性的角色，這難免令人覺得，同性戀並不是可以和異性戀平排的，它只是歪曲了的異性戀罷。究竟同性戀行爲和個人道德的關係怎樣，有待專家去回答了。

假設同性戀行爲於個人道德有影響，但是如果大多數人都接納這種道德觀念，基督徒又爲何要法律去維持一小撮人的道德呢？這問題的答案就很簡單，這就是社會良心的作用，基督徒有責任去促使社會走向更好的道德水平，成功與否則作別論。

雖然基督徒不接納同性戀行爲，但却應接納同性戀者，要制裁的是行爲，要幫助的是那個人，所以，除了關心同性戀法律之外，教會要作出具體的行動，去幫助同性戀者恢復一個正常的生活，若果只是嚴詞譴責，就變成法利賽人了。

（作者爲港大畢業生。）

譚啓見

豈是情書……

吱吱：

接到你的信以後，本來有股衝動，像上一回的立刻回信，但想深一層，繼續過份衝動、不懂自制畢竟是不成熟的，所以思前想後，便把回信的事擱置了兩個多星期。然而，動筆的時候，還是禁不住一絲一點自心而發的衝動，無論如何，這篇四不像的東西，總算是經過較長的思想和感受，才填下來的。

人的成長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各人的歷程也許未盡相同，成長的速度未必一樣，但隨着歲月的累進，人總會漸漸瞭解做人的一丁點。比方說，「讀書目的爲何？」這個問題便是頂好的例子。小時候，讀書是漫無目的的，之被送到幼稚園，往往主觀上只像被充軍刺配到四野皆陌的地方，既看不到一向照顧自己的父母兄姊，便只好硬着頭皮，依着老師和同學的指示攀滑梯、學寫字。其後，讀書是爲了父母。既知道爸媽置己於校，目的是讓我學懂算法寫字、衞生、常識，努力唸好書、拿好成績變成取悅愛自己的雙親的行動。漸長，讀書不再單爲取悅父母，而漸漸是爲考試而唸，爲成績佳而唸。因爲好成績不單能取悅家人親屬，更可得到同儕的仰羨，讀書已成了地位、身份、面子、光采的來源。又長幾年，讀書再非爲他人，也不爲一己之外緣名位，乃是對知識的愛好，是爲讀書而讀書。最近，這股傻勁也給壓了下去，因爲驀然發現所謂爲讀書而讀書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說法。這樣的唸書往往流於沒有方向，誤打誤撞，隨意隨環境而飄搖，故此開始以爲生活而讀書取代。若所得知識未能充實生活，給生命生氣，又或者給人一種引人入勝的魅力，那純屬妄撞。當然，正如我一貫說的，我仍願找到量度何爲「爲生活」這目標的準繩尺度，以量計進度。（以上各項固然都可以用甚麼「爲神讀書」來作幌子，但我情願少題這方面，因爲信仰是理當貫串一切生活的！）

說對讀書目的之體會，目的並不是甚麼自剖或是概念上的自我教育，只是表明人生是階段性地成長的，除了讀書這對知識上的「眞」的經歷，許多美善眞摯的內涵性成長亦往往如此。人際關係上，我自純粹改造自己滿足週圍人士的要求，好像羣衆餅模下的製成品開始，經歷了刻骨銘心的自我迷踪的階段，遂致自走極端，以爲我行我素便是開放自由，是發掘自己的潛能、恩賜。誠然，這三兩年自己有了一定的成長，對許多事物都看得「比較」清楚，但同時却毀掉了許許多多的友誼、愛、恨、彼此激勵、瞭解、分擔分享……可能我感受到的存在的渾噩及無聊是特別深刻，未必能找到相應能深入瞭解溝通的對象，但人生畢竟還有許多有趣的人、事、書，還有各人不同但同樣崇高的理想、夢想，在在都適足彼此分享分擔，但過去二年（自中七發現人生與信仰不調協起），已然平白失去了很多可以發展成關心體諒的死黨之同學朋友，亦在家庭中斷折了更深入溝通的機會。不錯，我變得有內容有味道（如果用我一向的字眼是「過癮」），但始終是未能全備的體會「眞善美」，尤其是涉及人際的甜酸苦辣，也就是神自創世以來一直容許人所有的美善氣質及人生體會。在把生活與信仰溶合上，在對神的經歷上，在所有人生可遇可感可想的一切上，我還不成熟，要走的路仍遠。

關於上回信中後半截的說話，可以說是從來沒有正正經經的說過的話，我也不知怎麼會如此這般地寫下來的，那時，眞個是太衝動了！其實，寫那信的時候，我很苦悶，心境是不知方向無所適從，好像四處是荒漠，四方八面都是茫無頭緒遠垠無岸似的，在無奈失迷之間，便妄想找個人，既是自己的母親又是自己的女兒，可以彼此撫慰一下，忘記苦悶、頹唐與無奈，自以爲憑絲絲情愫便找到歸宿之所，可以逃避現實上的無所適從。和錦光、華山、濟全他們說起，我通常叫這些作「找表妹行動」，希望能物我兩忘於迷濛幻想之中。正如上一封信所說，在第一次對異性的感應上純屬傾慕依戀的情愫，而中七那段日子則是開始痛苦地瞭解到情與慾的不相同，而經過這幾個月，我應可算明白了自己的自私無知，難道卿卿我我的環境就可以忘情一切？假如我這次當眞誤入情關，相信只有窒礙人家和自己的成長，而不是提昇二人的意識，彼此鼓勵、彼此協助成長。可以說，前幾個星期的心思裏沒有眞正的愛存在過，那時所幻想着的，也許不過是鴉

我不是「基督徒雷鋒」。

信主七年多，生活、思想變了許多趟，心裏有很多感受。

做了《橄欖》兩年，它影響了我丁點，但大體上，我仍是我，從未全身想過認中關社，也騰不出全備的信心談全人委身、奉獻、活祭等甚麼的。當然，必須說，這兩年我有一定的信仰反省。

深信信仰是滲透到生命每一部份的，思想、感情、看法，但正如黃惠瑜在《中大學生報》八三年四月號說的她一樣，我依然怕死、無料、無方向、無動力……

我是個邊緣人，沒有甚麼具體理想把我牢牢困住，也未有甚麼異象驅我焚身以赴，只能說，我流離渾噩的，在等待。

啟開自己的心，剖白自己所思，說明自己所想，重新發現眞正的我，這便是寫這個專欄的緣由。當然，我盼望您也齊來分享。

太自我中心？是的，我開初已說過，我不希望別人學我，我再說，我不是「基督徒雷鋒」！

片式的羅曼史！如今我想到的所謂愛，無疑是聖經中說的甘爲妻子捨命的委身，而斷非彼此拖累着，只顧二人世界，不能助人、不能成長、忘記見異像肩使命的所謂羅曼史。聖經說的浩然之觀可能不易掌握，我自己倒很贊成心理分析學者佛洛姆的說法，愛爲何物是沒有人能清楚定義的，但從內容來說，起碼包括瞭解、照顧、責任與尊重，愛應是容許別人是獨立自決的主體而又彼此委身，是彼此成全而不是彼此拖累。在這一切上，我還是個一點也不懂、不能、不曾認眞想及的人，所以根本不配題到觀察他人的長短，考慮終生等等。你看過佛洛姆寫的《愛的藝術》嗎？

當然，我很迷戀丁玲的《不算情書》那一類浪漫，也很能體會《美麗新世界》中那野蠻人的欲迎還躲的心理，但未曾深思熟慮的話，我仍只是小孩子，絲毫未達初嘗愛爲何物的最低標準。我會讓神使我變得更完全，好爲將來若眞的可以有「另一半」的時候，可以更完滿地獻給她，好一併獻給神。所以，請妳暫時忘了那一些說話，好嗎？

關於妳說到的自殺問題，據我這幾年在這其邊緣徘徊的體會，嚷自殺往往只屬賭氣的衝動，是無奈、無所適從、無方缺向、生無可戀的時候的胡思亂想。從自己的經驗裏，只要我又再見到一些刺激人心、活生生的生命見證人，又或者盪人心弦的事情、理想、方向等範例，便會再度鼓勵起已經頹敗的心理狀態，再去拼鬥。開解的基礎往往是接納、聆聽、感受……然後才是嘗試鼓勵。勸戒往往是不奏效的。我知道有許多人關心我，也必須爲自己的妄撞道歉，累週遭的人擔心。鼓勵往往比擔心有效……妳有目標以容全身全心以赴嗎？若找到方向，可否給我參考一下？

關於來年，我是會留在《橄欖》裏的。雖然我一向對《橄欖》的將來抱有較悲觀的看法，但近月來似乎又聽到一些利好的消息，大致是昨年才加入的弟兄姊妹都有長足的進步，又願意擔起一部份工作，但領導層却似乎仍屬空虛，我個人是極不願《橄欖》再用去自己絕大部份的時間，希望脫去甚麼基督徒的立場多想社會外圍的題目，可說是情願多做《學苑》，但寫寫文章，帶幾位新鮮人等事是會肩擔的，唯再不欲費神於整體大方向大路線了。除非一千萬個最後仍找不到適合的總編，否則我不會有任何飛身撲出的半微塵動力，況且，我也希望稍稍組織教會內三兩個較肯思想的弟兄姊妹，爲教會找一些新路線。你呢？你又怎樣考慮明年的事奉崗位？

最近，在職業問題上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希望畢業後先教幾年書，兩年官津校兩年私校左右，然後再想會不會加入全職基督教工作的行列。從前繼續唸書的念頭是壓了下去，不過這一切都可能隨時會變，還是看看神怎樣逐步帶領吧！你又怎樣，是準備教書嗎？

今回這樣寫信給妳，是希望眞的找個筆友，可以容讓自己自剖，又可以聽到妳的自剖，在成長的歷程裏多一個與別不同的朋友。面對面的時候也許大家都會變得忸怩，不是漫無目的地空聊「忽史」，便是正襟坐危的開會式討論，說自己的感受、想法的時候實在太少。我是個自小沒有甚麼秘密的人，把一些深思，或其他甚麼存在寄給妳的信裏，自剖剖人也是一件美事。妳說妳保留自己，也許這類秘密通信正好敲出妳的心事，免得妳收藏日久變得心理失常，嘻嘻！而且，這種方式不像別的容易惹起誤會，經過思想決定才寫下來的，在感情或其他上也容易控制自己，不致傷己害人。無論妳是否這個秘密的筆友，也請妳別告訴他人我今回的愚蠢戇居，二十二年來，第一次想製造一點秘密，別輕忽傷害我的弱小心靈行嗎？忽然變得婆媽「老土」，和平日「忽史成性」的形象很不相稱，眞箇有怪莫怪！

妳喜歡篆刻嗎？如果我有時間，我很喜歡雕刻蓋章，不過離開篆刻那種一揮即就的藝術性，就差得太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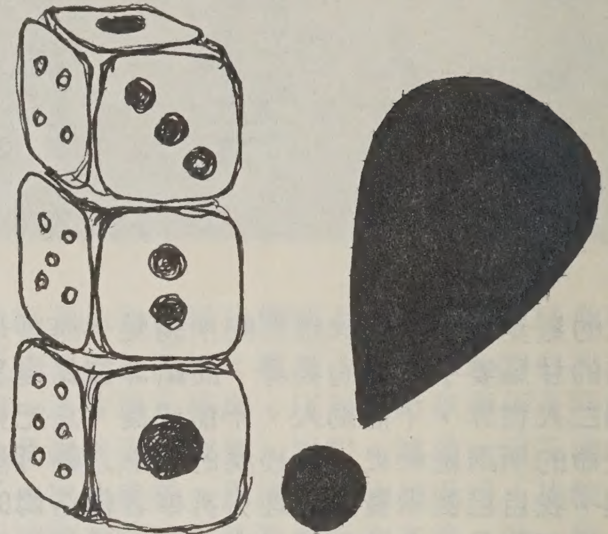
「老土」一點，不過都是祝　以馬內利！

一個怪人
啓見
四月十九至二十日

（作者爲港大同學。）

Good try! But stuck with thoughts.

彩數．．彩數



天藍

一、

衹一盞茶的時間，一段朋友間的閒話，却使人回味不已。

當時，我們站在巴士總站附近等候朋友，閒聊着。

「啊，有時做人眞係好奇怪，有順有逆，」志光一時間很感慨地說。他兩隻眼望着自己的皮鞋，一邊搖頭，一邊繼續道：「可能這就叫做人生際遇，但是——人生際遇?!」他抬頭來，「嗯，你們有甚麽看法？」然後習慣性地擺一擺手。

我覺得很感興趣，「不知道會否說得太抽象，但我始終認爲所謂人生際遇，起落升沉，可看作人生的磨練，尤其是逆境更加可以磨練出剛強的人格，有一句話我一直都記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共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弗亂其所爲……』是嗎？這句說話，我以前簡直看爲金石良言。可是現在——」頓了一頓，聲音略略提高了點，「我有時覺得做人就是撞彩數。」

淑瑜滿臉疑惑的問：「爲甚麽呢？」

「不是嗎？撇開甚麽神的旨意不說，一個人或順或逆，是很難解釋的，至於他能否戰勝環境、克服困難，許多時候純粹是由於他彩數好。」

我平常所認識的志光，思想成熟，不會胡亂發言的，他說出這樣的話並不簡單。其實人越成長，人生的問題就顯得越不容易明白。「我很有同感。」我從經驗中擊起一陣共鳴。

「但是，」淑瑜皺着眉頭。「我也不清楚，不過你這麽說不是跟普通人的看法沒有分別嗎？他們叫做『碰運氣』、『由命運安排』，但我們呢？」淑瑜很認眞地分析着。「你說撞彩數又好像有點道理，眞是矛盾。」淑瑜經常說話都是很長很長的。「舉例說，唸中七的時候，班裏面有位同學平時成績也不錯的，可是，放榜時英文却考了個“O”，即是不是合格，又不是「肥佬」，只有會考成績的水準，於是，報考大學的資格算是沒有了。我的印象很深刻，試想，如果那是自己的成績，我又會有甚麽好說呢？說自己的能力不足嗎？未必一定。說是上帝的安排嗎？又說不通。說上帝試鍊自己的信心嗎？甚麽信心呢？相信考試局發生錯誤?!相信無論如何神的安排是美好的!?淑瑜漸漸說得語氣激昂。「更難爲的是我的同學不是基督徒，我根本不知能夠對她說些甚麽。」

「於是，你很多固有的信念就會因此產生困惑。」光輕描淡寫地說。

瑜拼命點頭。

「究竟人類的處境有沒有公平這回事？」我忍不住問。記得初信主的時候，以爲只要人肯信主，改變了他的價値觀念，一切都會變好，若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信主了，世界就自然變得和平美麗，那時候的思想實在太簡單。

「但是人生本來就不盡都如意。」瑜眨眨眼睛，又希望人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個試煉，試煉我們如精金，你們剛才不是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嗎？」

「我不想隨便下結論」光又習慣性地擺一擺手，「不過，事實擺明，一個人選擇走上一條路，他所負擔的後果有時並非甚麼磨練、甚麼成長，他可以越走越糟糕。」

又一輛公共汽車開動了，車尾噴出一道濃濃的黑煙，我的眼光追隨着汽車，很想看透它將會駛往甚麼方向。

沒錯，許多許多人走的路是越走越糟糕的。果眞是司機去決定汽車的方向嗎？

「唔，你們有沒有想過怎樣理解人作爲一個主體呢？」我忽然間沒頭沒腦的問。

「這樣深奧的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光很迅速就抓得着我的問題了。然後，他說出哥哥的例子。「看我哥哥，結了婚，雖然有些積蓄，但又要供樓住，書又讀得少，香港地，讀書少，根本就沒有辦法找理想的職業，他憑着小小積蓄，想攪小本生意，本錢自然不夠，不支持他是過意不去的，但要在金錢上支持他，父母親都感困難，況且，他們年紀都大了，而我還在唸書。」我點着頭，體會着他容色間的爲難。

「其實，」他接着說下去，「這不過是「搏一搏」的心理，誰也保證不了贏虧，可是，這幾乎又成爲他唯一的出路，說實話，在香港社會，對於一個讀書不多的人基本上是沒有出路的，除非你安份守己，不講事業前途、不講發展，否則，只要你有一點點上進的雄心，你都會感到窮途末路，一是挺而走險，做犯法的事，一是像哥哥一樣做一些冒險投機的事。」跟着頓一頓，沉思。「近來，我好像忽然間明白了甚麼叫做現實。」

陽光猛烈，空氣裏透出窒悶。

「那麼，你會不會變得越來越現實？」淑瑜試探地說。

「淑瑜，」我笑了笑道：「我以前跟你的想法一樣，覺得現實就代表市儈、世俗，有壞的含義，其實，認識現實不代表同意現實，接受現實不代表向現實妥協，基督徒許多時候連現實都不認識，自欺欺人。」我感覺在自嘲。

三個人，望着六隻鞋子，各自在沉思。還是淑瑜開聲打破悶局。「我想也毋需說得這麼灰暗，我有一位中學同學，也不過是中五畢業，她考進一間銀行做事，現在參加銀行裏舉辦的進修課程，她說，慢慢來也會有晉升機會。」

「哦，這是有可能的。不過女孩子又不同呀，她的責任和角色不同。況且，這類循序漸進的晉升機會要等上十年八載，對於養妻活兒的人來說未免太悠長了。」

我知道志光心裏是在說他的哥哥，我有點明白他所感嘆的並不是一、兩個個別的例子，那是關乎社會整體的大層面。我彷彿看見整個社會的運作和階級分層卽如一堵大閘，又冷又硬，推不動移不開，憑一、兩個人盲目的抵抗比螳臂擋車來得更可笑。

此時此刻，却勾起了自己的心事，不久，高級預科考試要放榜了，如果眞如志光所說，人生是靠彩數，他又會有多少彩數呢？一轉念間，又有無限感觸，倘若這個世界的運行眞的靠撞彩數，人生的公理豈不盪然無存？人活着豈不與輪盤上的一粒骰子無異？我不能夠相信天父上帝是開賭檔的大莊家！

又一

人生的課題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篇。想不通的問題常常重覆又重覆的出現。

五月、六月是學生、老師最忙碌的季節，許多個重要的考試陸續舉行，一年一度的期終試亦在這個「旺季」重演。

六月尾了，身爲老師的當然還是在考試的末梢孜孜不倦，批卷、計分、紀錄成績、寫評語……一系列工作魚貫湧來。自從答應了做代課老師，每天，清晨卽起，回校上課，今天也是一樣，早晨起來，收拾好精神回校埋頭苦幹。路上、車上，都是穿着校服，手執筆記，口中唸唸有詞的人，他們提醒了我這一年來弟弟如何用功準備考試，這是他第二次會試了，破釜沉舟的第二次。

在教員室，工作了一會，很難集中精神，「今天中大考試放榜。」一句說話在空中飄了出去，大概希望告訴隔鄰的謝老師，她年紀輕，大家頗談得來，可是她沒答腔，我突然醒察她只教中一至中三，也許，她太專心工作了，不一會，另一句說話還是忍不住從嘴裏溜了出來。

「我弟弟今年考中大，不知成績怎麼樣？」

「哦，是嗎？有沒有信心？」

正在這時，李老師給我送來一疊批好了的試卷：F.2的英國文學卷，對話因此中斷了。

「你自己看看，喜歡的話就[拉分]吧！也不知怎麼攪的，無得救！」李老師說，一語未畢，轉身就走了。

打開分紙來看，竟然超過半班的成績是紅色的！心冷了一截。可是，即使成績差，李老師也不能因此輕視學生，對於她那一派咎由自取的語氣神態，我並不欣賞，說正確一點，我感到十分生氣。

成績怎麼會這樣差呢？心裏莫明其妙，設想一下，大半班不合格，該會有多大的挫敗感?!一定要找李老師問個清楚，她一面鄙夷的神態表示：這班又笨又懶的蠢才，是活該活該似的。原來她教的一班只有兩、三個學生不合格，試題是由她出的；試卷是由她批改的；成績好的一班是由她教的，其他兩班都有二十多人不合格；是誰的責任也好，我強烈地感到不平。

考試、成績、教育制度裏頭有幾多瑕疵、幾多漏洞！

大概我的面容出賣了我，謝老師看見我很關心的問：「怎麼啦？２Ｃ考得很差？」

「唏！人人都說自由競爭，大家都有公平的機會接受教育，所以十分公道，誰不知教育制度本身已經預定了有成功有失敗？是的是的，有人比較聰明有人比較愚笨，可是，爲甚麼偏偏要用人的能力和才幹來決定一個人的價值？爲甚麼不可以給每一個人當得的尊重？」當肚子裏的氣咕嚕咕嚕的吐了出來，又有點後悔這麼捺不住氣，謝老師一面窘迫，似懂不懂的。

也不能怪她，許多負責任、有愛心的老師都不知道自己在整個制度中正在做了些甚麼，如果我沒有讀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沒有研究過教育制度怎樣使到階級分歧看來合理，我只會天眞地堅持「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我很想坦白的告訴謝老師，整個制度本身是一個挑選的過程，這個挑選與其說是爲了公平，不如說是爲了適應社會上的需要；適應制度上的偏差；適應人情的厚薄；適應家庭背景的優劣；適應社會價值的權威。可是，我說不出一句話。

小息的時候，一大羣學生把我簇擁着，我竭力平心靜氣才能應付他們的圍剿，當中幾個人還帶着淚眼的控訴，我向他們解釋、安慰、講道理，仍舊於事無補，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升班、留班，以及被分配到Ａ班還是Ｄ班，因爲明年要應付中三淘汰試。

「其實，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怎麼會考得不好，到底有沒有用功呢？讀書方法對不對呢？何必這麼介懷分數？Ａ班和Ｄ班不都是一樣嗎？」我企圖矯正他們的思想。

「才不是哩，老師常常拿我們跟Ａ班比較，說我們表現差，這樣不及、那樣不及。」

「是嗎？」我有點感慨。

「是眞的，有時他們還說我們連中文班都比不上。」

學生總是那麼坦率，再次提醒我學校祇是一個小社會，同樣將人作比較，分等級，成王敗寇，怎麼連老師也在灌輸普遍的社會價值觀：人的尊貴卑賤全繫於他個人的成敗得失。忽然感到這些負起授業解惑神聖任務的人十分糊塗。

應付完中二的學生，又一批中六的學生，又一批中六的學生，他們憂心忡忡的也是計較着分數，四十六分可否加爲五十分之類，成績表恍如他身上的衣服，影響着別人的觀感和印象，也直接間接形成了自我評價的標準。

我極不欣賞他們這樣近視，錙銖計較着幾分的成績，可是，當周圍的人都採用這樣的眼光、這樣的天秤，誰又瀟灑得了？

回到教員室，滿心悒鬱不安。

三、

家裏，一如往日，小妹妹跟弟弟玩波子棋。我也若無其事的問起成績，弟弟才把成績拿給我看，三個Ｂ，兩個Ｃ，一個Ｄ，然而，英文Ｆ、英文Ｆ——

現實世界如一盤冷水潑來。

「成績不錯呀，」成績出乎我意料的好，「可惜那科英文怎麼會Ｆ呢？」幾乎想拿枝筆把它改了。

弟弟不再玩波子棋了，我想跟他切實地商量一下，他眼睛紅潤，借故跑出屋外的厠所。我一時無措。

媽媽是不明究竟的，得向我問個明白。「剛才他回家，我問他，他又不答話，都不把我當作母親的，一家人，有商有量嘛。」

「你需要了解他的心情，別亂說些甚麼。」

「我也沒說甚麼，他拿了成績回來，單單說：『考不到。』其他甚麼都不講了，我不就說：『考不到不打緊，不容易考的，進不了大學就另想辦法，沒關係。』我沒有罵他半句，但他一直不做聲。」媽媽是十分體貼、十分明理的好媽媽。

「媽，他英文考F，即是說預科試不合格，不能報考大學，人家只算你有會考生資格，其他都不計算，人家都不承認你這兩年下過的功夫。」我簡單地解釋着。

「那麼，這兩年是白讀了？那幹嗎這麼辛苦，日讀夜讀，早知如此，兩年前不就出社會做事好了。」媽媽不是一個細膩的人，只是他覺得兩年的光陰花得十分冤枉。

是的，非常冤枉無情，近乎不合人道，一科就定人生死，所有心機都通通白費，這是甚麼標準？

「寫信向教育司投訴呀。」可能近來請願遞信的事件太多了，想不到媽媽竟有這樣的意見。

「媽，沒有用的。」雖然這樣向母親解釋，心裏却同意必須反抗，可是，又向甚麼反抗呢？教育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掛帥？許多基督徒這樣說：這是個敗壞了的社會，只會越變越壞，我們應當注目那更美的家鄉。唉，基督徒又怎樣成爲鹽、成爲光呢？一陣酸楚和着悲痛絞着。

弟弟一向憂鬱內向、沉默寡言，在這種近乎透明的傷感裏，保持緘默跡近漠視一般冷酷，但任何說話却都顯得不合宜。

時間順着分針推移。

最後，還是他自己抱頭大睡叫人來個心安。

弟弟睡了，廉租屋村唯一的私人地方便是厨房兼浴室兼雜物角兼騎樓的欄河邊，眺望，街道也睡着了。瞬間，如缺堤的洪水在心坎澎湃，無法冷靜。學生們一張張稚嫩而恐懼欲哭的表情；李老師一面不屑的神態；弟弟的成績；考試機器的齒輪在滑動；志光說：「人生許多時候都靠撞彩數……」

信念與現實相隔千里，理想的世界彷彿被擄在雲端，現實、幻象，重疊重，天下無難事??可能，對於一些有機會成功的人，這些說話是推動他奮鬥的指南，但對於社會的「失敗者」，他的失敗早已在統計數字中被註定了，他們的努力，儘如微風揚起的塵，一般短暫、一般徒然。

在學業上，自己一向順利，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失敗的艱難，就連考試不合格的滋味也不明白，又怎麼體會人生關卡裏一個驛站關住了的滋味？

中學、預科、直入大學，入了大學幾乎等於穩操人生勝券，大學畢業試成績尚未公佈，已經受聘，憑甚麼我得着這些優惠呢？因爲我是大學生？擁有大學學位？擁有專業資格？擁有社會人士的垂青？弟弟要找份暑期工都三波四折，而我呢？人生康莊大道爲我舖排……哼，有的就越有，無的就越無?!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是這句說話推動我不敢懈怠，否則我怎能面對加予我的一切厚恩？怎麼負起那還不清的債？亦唯有這句說話使我得着安慰，人生公平的基礎在此。

然而，此刻，倏忽間搖搖欲墜，上帝啊，我怎麼好像看不見你呢？人生啊，你又何竟顯得錯謬荒誕？父神啊，我們沒有理由在苦難時就上祢的賬，我始終相信祢是上帝，但祢若是掌管宇宙萬物一切，祢要忍耐到何時呢？我怎麼不能在敗壞中感到祢的公義？在現實中看見祢的仁慈？誰把祢的愛封鎖在教堂的四壁牆內？誰又不斷的溫柔忍耐的心接納這個世界的價值和制度上的罪惡？讓我執起一枝紅筆在這個世界上劃一個血紅的大交叉，整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錯！難道人類生存又是另一個錯？心思間激起忍不住的淚，滴在欄河的鐵枝上。

我所信所靠的上帝啊，祢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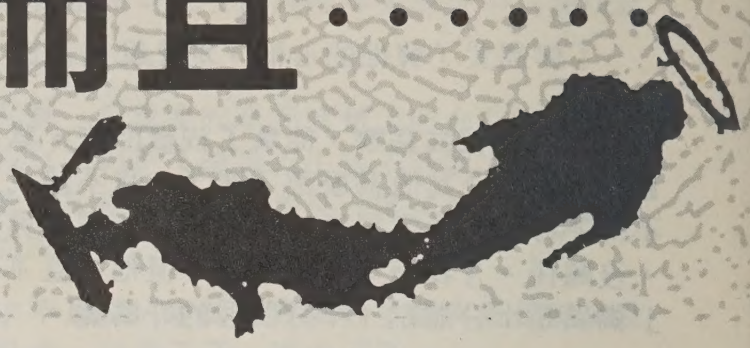
上帝啊，祢有沒有不小心出了錯？

我不會祈禱。也不能夠爲弟弟代禱，我能說些甚麼呢？我若不認識上帝，這個「禱告」的活動又有甚麼實質意義呢？我決定多看報紙，多處留意有沒有甚麼出路的機會。

冷靜下來，家庭生活依舊，電視機努力地播送着一堆噪音，祇是媽媽顯得異常沉靜，容色間刻劃着難看的憂患，我走近床沿，輕聲道：「媽，別太擔心，我會多多想想辦法。」

（作者爲港大畢業生。）

猛人已死，而且……



曹希銓

前言

大學學院中的猛人已死，而且耶穌哭了。哭的並不是猛人的消逝（因爲人人都有一死），却是猛人的生命精神底湮沒。回想起學運時代基督徒的理論基礎和生活態度被馬列信徒尖銳地批評時：火紅的年代，但是老大哥們亦有火紅的回應——他們以認眞反省的態度剖析了責難而把黃鬼暫時未退；然而牠今天却以滲透性的安逸、冷漠、自滿和不思進取的生活態度來鈍化我們以上而來的敏銳力！欷哭，却無淚（麻木？）！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當怎樣去抗衡這個殘酷的現實呢？

或許，有弟兄會對我質問：「希銓，你的那一套唐詰柯德式口號，我聽得太多了（雖然它莊嚴和偉大）。這些日子，我在無休止的挫敗後，甚麽突出的地方都給磨滑了，我完全化了——化得比水更能適應任何的容器。甚麽？迎向挑戰？這些口號我喊累了，我請求你別再把老大哥們的包袱壓在我們肩頭上，拿自己過不去。」「弟兄，你的苦水我全部簽收；因爲那樣的苦水我以前也噴得不少。對！我們絕不應將老大哥們的包袱全部接過來硬背在自己肩上；但是——，他們那種甘願承擔的駱駝精神——抗衡當日的腐化生活或謬誤理論的委身投入精神——却不可不有！除非你能說服我現代人比六十、七十年代的人生活得更愉快自由。弟兄，你同意嗎？」

那麽，大學生基督徒「現在」應扮演甚麽樣的角色呢？（我喜歡將大學生與大專生都統稱爲大學生。事實上，「大專生」這個畸型的生物只不過是那個老殖民地主義者的一些政治把戲。）對我而言，大學生應該是一個有獨立思考、勇敢面對挑戰和富組織能力的學生；在社會中扮演一個關心社區和有正義感的市民，在神國中扮演一個先鋒的角色（當然，他們不應處在高高的領導地位，而只不過是一些醒覺性高的人吧了）。冷靜反省之餘，今天的大學生基督徒實在好像哈哈鏡中的影象（爲天下笑！）。輕者令教會擔心；重者令非信徒同學失望。本文的目的在于替今日學院基督徒的負面作一個剪影（PROFILE），（因爲是剪影，所以極可能沒有深度感，請大家多包涵、多賜教；）並在文末嘗試提供一些方法去反省和突破重重傳統和人爲的關卡，以祈達到做個更能榮神，同時益人的信徒。

剪影

(1)犬儒主義與理想破產

在香港勞役式和過份競爭式的教育制度下，很多同學到了中學時期已經接受了太多競爭後的失敗感，使他們缺乏應有的自信；更且在金錢主導的價值觀不斷薰陶下，自信心已歪曲地建立在月薪、個人社會成就等等。對于大學生基督徒而言，他們懷抱滿腔熱血和理想踏入教會的時候（要承認教會也是人的羣體，難免有人性的軟弱），企圖進行不斷朝向完美的改革；但多遭到教會上層「元老」傳統人士所不信任甚或排擠（因爲他們說的多，做的少），久而久之的改革而無改善，他們就感到理想破產；終於相信原來信仰其實也不離世俗，便心灰意冷（哀莫大于心死），甘願做一個因循的信徒，完全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說不奇也是怪了，這些「失意人」對「後起之秀」所提出的理想與改革，都採取消極性的批評或妄下悲觀的結論，使自己成了最可憐的犬儒主義者，生命力從此僵化；在信仰方面，只祈求一些宗教儀文或教條來保障內心的安全感。

(2)所謂猛人

另一個極端就是一些大忙人；往往給同學們一個錯覺：以爲忙碌與委身、靈性一定成正比。這些就是這一代的所謂猛人（以浸會C.S.U.爲例，在C.S.U.做個工作量大的職員，當可列入猛人榜之列）。他們的特徵是：除了事奉和讀書外，甚麽也沒有了。難怪早些時吶喊一文中有：「只有同工；沒有弟兄」的感嘆。弟兄姊妹，我們再不可用工作量去估量弟兄的靈命，唯有切實返回眞誠，赤露敞開的靈裏交通，才能彼此激勵。

(3)鴕鳥人

鴕鳥人比較「中庸」，所以亦是最大的一羣。這些「溫水式」的信徒不冷也不熱，滿足于「安安樂樂；讀緊大學」，對周遭人情事物漠不關心（例如「單身人士請願事件」、「蘇聯戰機擊毀韓民航機」、「港元大跌」……），只求自己生活一己的安逸溫馨。難怪「大胡子們」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們口裏整天掛着愛心二字，但在實際生活中，我根本沒有感到他們有甚麼不同，他們有的只是糖漿式的小圈子私相授受的愛心生活！」「鴕俠」有時還極端自私說：「社會上有不公義的事？我不知！有人飢寒交迫？我看不到！有人被壓迫而呼喊？我聽不見！總之就算有呢D煩嘢，亦請你不要告訴我！唔好打擾我自己的寧靜溫馨的小夢境！」我個人極表懷疑這些「鴕俠」能否被稱爲聖經啓示中的「基督徒」，因爲「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那些……」。

(4)個人化和物質化

另一個令人覺得信徒虛僞的便是：「四仔主義」的殘餘仍然充塞着有些弟兄姊妹的心房，他們渴望得着上帝的「恩寵」使G.P.A.冒升上3或以上，而自己便付上一些義務——在功課非繁忙時間中出席一下教會崇拜和團契。如果談到畢業，他們最希望能夠盡快「扎起」！所以他們對讀書生活採取一個分割的立場，自欺說現今是所謂「裝備期」（其他一切不管，只要達到G.P.A.上昇爲目的），希望他日畢業後能「將最好的獻與主使用」。唉，彈這個調子的平面人往往是逃避信仰就是全時間投入，即：信仰與生活膠着一起，無可分割。奇怪的是，這些常常想冒出頭來的平面人有否反省到自己只不過是香港千千萬萬的庸俗主義者的一分子，根本並不突出。

(5)中學生化

做一個中學生並不可怕，可是大學生若降格成爲一個中學生時，不可謂不是一個悲劇。這等「中學生」放棄獨立思考，放棄單獨面對困難和缺乏社會良心。例如對周圍事物從不關心，只希望讀好書；對老師一些甚至是不合理的手段亦只是採取自我保衞手段；又以不懂得組織起來有些具體行動。雖或遇到謬誤的羣衆運動時亦不敢獨排衆議，成爲羣衆壓力下的棉花糖。就算間中有些關社口號，只不過是一面無力下垂的旗幟；徒有口號，沒有行動。對時事問題患了嚴重冷感，也不願關心社區中的被剝削者。如果談到「九七問題」時，眞的有那幾個願意留下有意識地去承擔重建香港之責呢？

(6)開放與封蔽

無可否認，很多大學生基督徒對事物和人情有甚開放的態度（不過有一點要保留，有時他們無主見之麻木開放只暴露出他們是羣沒有立場的人）；但使人感到遺憾的是：面對上帝的呼召時，他們便緊閉心門，免得上帝侵犯了他們的PRIVACY，彷彿某些心房已經早釘上了NO ADMITANCE！(上帝，祢是否太軟弱？)

(7)二分法

最後，筆者在這裏大膽指出我們過往的宗教教育大部份對人情事物採取過簡的「二分法」。我可以肯定說，信徒比起普通人在生活中必然遇到更大的冲擊——無他，因爲他們對人情事物都有較高的要求，所以用二分法觀點來洗信徒腦實在是宗教教育一大失敗，徒使信徒陷在「領受與現實」的鴻溝當中。事實上人是一個潛存無限活潑生機的自主體，而人情事物又甚爲複雜有機，又焉能用二分法來處理生活問題呢？舉例說，極端的二分法有：非屬靈則屬血氣；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信主前生活一定空虛無聊（就算有快樂都只不過是罪中之樂），信主後只要修練「讀經、祈禱和信心交託」三招便能保證有眞平安喜樂；信主後絕對不應有掛心焦慮現象（除非你小信）；教會絕對不需要有教會輔導（因爲上帝已經是最偉大的輔導員）等等。強烈的簡化程序，使很多信徒生活在「領受與現實」脫節的狀態下，常有不忠或挫敗感。罪疚又焉能不生呢？又焉能不令好思考、有理想及有幹勁的學院弟兄姊妹流失呢？誰之過？

後語

首先，原諒我累贅，容我再強調下列幾點：㈠大學生基督徒擁有其有利條件作爲一個天國子民的先鋒。㈡按聖經「按方分銀」的比喻中，上帝非要在大學生基督徒收取更多方滿足。祂期望我們承擔時代的困難，「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爲現金的機會麽？」㈢我們在信仰與現實、思想層面上和理論與感受層面上均面對更大的冲擊，亦因此有更大的壓力。㈣對我們的期望不應單單是三四年的學院生活；更重要是畢業後如何在天國負起更大的責任，而不是畢業後個人單爲自己籌算更豐裕舒適的家庭！

魔鬼既然不再用「小胡子」（尼采）和「大胡子」（馬克思）來攻擊我們（其實他們正指出當日基督徒的腐化和中產，與「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耶穌精神背道而馳；我們實在需要在責難之中反省，是否與神的關係成爲貌合神離）；使用了更可怕「不攻擊政策」來蝕腐我們屬神的敏銳力，使我

們在自滿中失去、豐富中貧乏和生活中死亡！過着「雞肋式」的信徒生活。我們實在需要再次用敏銳的觸覺去感受香港的兒童、少年、成年和老年人的痛苦；與他們共受患難、體驗被勞役的滋味，並將自己溶入羣體當中以「身」去仿那「全人福音」。當我們看不見旗幟鮮明的敵人，並非不是沒有敵人，只不過他們微服出擊吧了！難道你看不見很多制度（120天有薪病假、勞工法例、教育政策、公共事業監管情況、區議會角色、九七歷史問題等等……）都向基督徒發出巨大的挑戰嗎（關懷基層人士、法律平等公義、精英教育、乞兒砵拿飯吃、假民主和鈍化香港人的民族性等等……）？問題是，我們要不要回應做一個時代的先知、執事和牧者？應做就去做？抑或還在計算代價？用自由的腳踏上承擔、不自由的道路絕不可惜！相反，因循地去捱一連串不自由的教條，才可悲！所以：理想仍在，只不過你付得上甚麼樣的代價去買甚麼樣的理想！犬儒者的悲觀未免太自暴自棄；誠然，一個人不能做完所有的事，但每個神的兒女都能作一點點事情，所有的事情便會被所有的肢體去擔當而構成一個互補的有機體。

至于那些大忙人，爲主而活是否褪色成爲一個口號，果若如是，在上帝面前安靜反省和反覆思量，可能會找出「我今天的崗位是甚麼」；豈不更加使自己投入和務實嗎？

對于鴕鳥客，原諒我直言：「如果你認爲這才是門徒應有的心態，可能你買錯了貨；聖經中並沒有啓示出如斯的一個基督教！」

無可否認，現今的物質引誘和個人意識膨脹比前劇烈。可是神子耶穌還不是給我們一個模範——倒空自己。爲了生命活得有意義。成爲別人的需要；我們豈可不奉獻成爲活祭，爲神爲人而被燒盡呢！所以我們要整體齊心實踐一個抗衡腐化生活（不單只是抗衡「文字」！）的模式，務要使人生活得像一個人。除非我們都全身投入信仰中，否則信仰只不過是錦上添花吧了！讓我們不再爲生活所需而憂心，而反省我們所需是一個甚麼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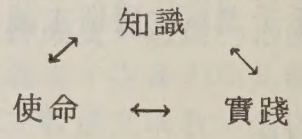
談到中學生化，我覺得這個退化現象要拜謝香港的塡鴨式教育和大衆傳媒傳遞那些簡單和假象式的低能訊息（使受衆失去了批判能力，不能抽離地去審視推銷員的商品）。我相信教育當局有必要建立一套如何消化並批判傳媒商品的影視教程，不再使觀衆被傳媒拉着鼻子走。除非我們意識到自己已退化成爲中學生，從而發奮閱讀、吸收偉人的思想文字，否則我們不應再以作爲一個大學生而自豪。

對上帝的封蔽，我們大多是放不下那個自我。我們實在太自執！需要知道，通過破碎，生命才可以重建！假若我們永遠執着于一角一石時，我們又怎會成爲偉大建築師手裏的一幢偉大建築物呢？上帝既然主導地、卑微地介入人類時空，完全投入人間的苦難，爲甚麼我們竟能硬心而不向這至善者開放呢？

如果將天國建築成一個——在理論上——牢不可破的二分法世界，這將是宗教教育的危機！有時，我們得承認聖經對某些事情沒有具體的指引，而需要察覺聖靈不可言喻之引領。宗教教育亦需因應不同的時代而更新變化，來完成那美善的意旨。例如：教會應放心並鼓勵大學生信徒成立「大專團契」以造就和保護在急流冲擊下的弟兄姊妹。教會亦需要放下吃人的二分法論調：「上帝已經是最偉大的輔導員，還需啥教會輔導。」我認爲個人性和小組性的教會輔導，都是今日的可行之策。

再推高一層面，神學教育絕不可以固步自封、或硬崩崩的將一些外國神學教育模式套在香港身上。（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心態、問題；未必一套「屬靈四律」就能起死回生）。在對應更新之中，切不可高傲自執，以爲自己想出的就是藥方；我們切切求神厚賜智慧，好使教會朝好的方向更新！對于喪鐘式的「九七問題」，教會不能再緘默；而應教導信徒如何承擔重建垣城香港；毋使羊羣臨危四散，而再次逃避自己的責任。

最後，我提出一個不知是否可行的推展「全人福音」的模式，企圖使香港肢體能齊心合力，榮神同時益人。模式有以下圖形的表示：



運作過程如下：有了知識，一定得通過實踐去更深入了解，然後因着投身的體驗，使信徒都有強烈的使命感。反過來，有了使命感，又可推動更全面的投身（實踐），而從實踐中而有更深入的了解（知識）。如是者這個模型便反反覆覆循環不息，相信必可使弟兄姊妹自覺正是拓展天國。願神使用我們每一個，又願每一個都甘被神使用。最後，希望以下是我們的誠願：「親愛的天父，我不求祢挪去路途上的荆棘；但求祢賜下一雙自由的大腿，能夠走過這條不還原的道路！亞們。」

（本文作者爲浸會書院物理系學生，原文投往浸會的刊物《麥穗》，作者轉投《橄欖》，作爲對四十一期《爲大專基督徒照像》專題的回應。）

橄欖要死?!

鄭留芳

讀了41.期的《 橄欖 》，心情有些沉重，特別是讀了總編陸弟兄的《橄欖要死了》之後。《 橄欖 》不是我喜愛的雜誌，更不是覺得要每期要讀的那一種，但我總可以常常讀到一些文章，引起極之強烈的共鳴。有些時候還會令我認眞思索很多問題。譬如說，今期對馮檢基先生做的那篇訪問，十分之有啓發性——他的經驗的確很獨特。整整六頁紙的篇幅絕無白費。而我只是付上22元的代價，便可訂閱全年——簡直是物超所值！

如果說我們這一代的大專基督徒是「符碌」的，缺乏反省能力這種批評是公允的話，說《 橄欖 》要死，絕對不是誇張！《 橄欖 》的宗旨是要弟兄姊妹勇於反省。而最諷刺的是：弟兄姊妹根本不想反省。這樣說來，《 橄欖 》銷路增廣，反應熱烈才是怪現象！有一點可以十分肯定：雜誌只有在針對到讀者的需要的情況之下，才可以廣泛地引起讀者閱讀的動機。雜誌盡其量只能夠做到TO ACTIVATE讀者的POTENTIAL NEED(S)而十分之難 TO CREAT A NEED 如果大專基督徒，像很多人的批評一樣，缺乏反省的能力，需得更貼切一點是缺乏反省的願望或傾向，覺得個人以及所處身的世界，沒有甚麼問題，有的只是功課成績不符理想，兼職賺的錢不夠用，愛情跑道亮起紅燈，情緒低潮，家庭生活等等個人化的問題，《 橄欖 》又如何不能不缺乏人手呢？想一想她一貫的宗旨和性質，再想一想怎樣找一個有份量，可以肩負得起這份刊物的同學做總編輯。

情況眞的是這樣惡劣嗎？我希望不是。或者，我們應該樂觀一點：情況是艱難的，但仍須努力。畢竟當大多數弟兄姊妹覺得《 橄欖 》索然無味或者壓根兒不知道她的存在時，總是會有一些人覺得她有價值一願意花上十二分鐘、二十分鐘、一小時或者個半小時去閱讀……

有一點是我們都認識到的，大專基督徒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態度是不斷受着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因素影響着的，而絕無可能決定於一本刊物，無論她如何的有份量。只有在新的震盪之下，激起弟兄姊妹重估既定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的動機的局面形成，一份敢言、敢批評、鼓吹多反省、多思索、多廣濶生活體驗的刊物才能夠生機勃勃。這個震盪或許會是因本港未來政治安排而引起的種種社會和政治變遷。在春天還未降臨的艱難歲月之中，除了放棄之外，惟有堅持下去這個唯一的選擇。只要有人捐獻，經濟不數這個長期令人困擾的問題，總還可以應付過去。最關鍵的是人力問題——一批一批有識見，「有料」願意投身《 橄欖 》的弟兄姊妹。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隨着人才難得的情況的惡化，《 橄欖 》質素下降。其實這個趨向又何止局限於基督徒圈子，港大的「學苑」同樣面對這種威脅。但願上蒼庇祐，《 橄欖 》後繼有人！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

（作者爲現屆港大畢業生，前港大學生會國事會主席。）

救救死人！

區初輝

看吧梁佳蘿博士刊於《橄欖》六月號《冰心的宗教信仰》一文，謹具如下數語，以作分享：

如果冰心女士曾公開表示，或在她的文章裡提及她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甚者曾著述什麼什麼的信仰作品，那麼我們拿她的著作（特別是宗教著作）來分析一下她的信仰體驗，以致反映時代，相信無可厚非；但我膚淺的印象中並無上述之記憶，而梁博士文中亦無考證可以根尋，那麼拿冰心女士之作品去分析她的信仰深淺，甚者推論當代基督徒之狀況，又有什麼意義呢？

假若冰心女士未自承過是一位基督徒（或虔誠的基督徒）；那麼她在她的「非宗教性」著作中引述泰戈爾、歌頌母愛、又有什麼過錯呢？

我覺得有時基督徒研究學術也須謹慎，正如王明道先生從未說過自己有一套「神學」，可是我們偏偏有「明道先生神學批判」；基督也沒提過福音會「一枝開五葉」，可是我們却有這黨、那派。倘若如此，我們不過是將別人強加諸他（她）不相干的範疇裡加以鞭撻，然後又棄絕吧了；這樣的治學方法，與敝國「文革期」的主流又相去幾遠呢？

或許這提醒我們喜歡舞文弄墨的朋友，除了抄寫「洛桑信約」外，不要妄立文字；可是往者已矣，又有誰替他們傾吐冤屈呢？

救救死人！

七月十九日

CA男性化

陳曉新

閱罷《橄欖》第四十一期專題「爲大專基督徒照像」後，覺得人們說「CA是非常男性化」之言也有幾分道理。

「衆生相」至「旁觀者清」所訪問的八個人竟全是男性！雖沒有正式統計，種種跡象顯示香港教會中女性數目遠超男性，在大專界中可能男性會多一點，但也不至於八比零吧？可能橄欖編輯們都是目不斜視之輩（指男編輯），絕不會用長距離鏡頭「偷拍」女孩子！

陳曉新

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於美國

萬千瀚海舟，汝舵誰掌？

《舵》

摸索大專基督徒身份的意義
且看人生的目標與生活方式
怎樣與國家社會校園成長結合

面對時代挑戰
大專基督徒不可不看的文集
牧師傳道神學生認識大專生必備書本
教會圖書館必備
各大基督教書室有售
每本零售十三元五角正

身不由己的……

加價

紙價、製版、人工…加價，
港幣疲弱使情形益添嚴重，
《橄欖》不能抵受大虧蝕，
於是，逼不得已的加價了！
由下一期起，售價調整如下

零售：每本五元正
訂閱：全年六期
特價二十八元正

要《橄欖》不加價，
重要的不是多奉獻，而是多介紹訂戶，
一領一，一領一，因着印刷數量增加，
自然可保持售價不變，亦使《橄欖》
的異象傳開。

橄欖文集將面世
敬請注意出版期

下期預告

合一！
合一？

專題：《合一！合一？》
鮑會園牧師，郭乃弘牧師
張樹一先生，
陳佐才牧師，「香港的教會」
談合一

新專欄：《不滿與瞭解》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會長　鄭建輝博士（化學系）
副會長　華叔平醫生（醫學系）
主席　關啟文（工三）　出版秘書　林潔儀（社二）

橄欖雜誌：

顧問：滕近輝牧師　蔡元雲醫生　張慕皚博士
吳宗文先生　許道良博士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箱 50379 號
承　印：南北文化服務社
九龍長沙灣道47—55號
東成大廈十樓C座
3-806890

出版委員會

主席　黃鳳萍（社二）
總編輯　陸錦光（社二）
助理總編輯　譚啟見（社二）　黃冠雄（文二）
編輯：　蘇兆良（工二）　袁淑芬（醫二）
周華山（社二）　麥淑娟（文二）
羅惠嫦（社一）　朱惠兒（文一）
陳國宏（工一）
文　書　林水招（文二）
資料組　楊啟昌（理三）　沈濟全（文二）
錢錦華（工一）　鄧淑儀（社一）
李潔貞（文一）　蔡婷婷（社一）
陳子玲（文一）　駱惠芝（文一）
業務組　梁玉嬋（理二）
吳國泰（社一）　陳志强（工一）
設計　梁健德（建一）　譚啓見（社二）

稿件

㈠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來稿請寄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橄欖」收。
㈧本刊登載文章，文責作者自負，並非代表編委會立場。

歡迎投稿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　公開發售第四十二、四十三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變遷・教會・社會	1	發刊詞	編輯室
	2	變遷中的社會・變遷中的教會	蕭靜
	5	基督徒區議員專訪　基督徒與地方行政 1. 沙田區委任議員吳秉堅先生 2. 沙田區民選區議員楊紹華先生	黃鳳萍
	10	移民之後—幻想小說	鄺浩思
	12	於荊叢中求突破 中國商務從業員縱談中國現況與前景	陸錦光
	19	從「天道」看基督教企業	羅惠嫦
	25	從福音民歌看基督教音樂	蔡婷婷
	29	錦上添花？—談基督徒辦報	楊啓昌
中國啊中國！	32	中國啊，中國！	特輯小組
	34	認同與承擔—七十年代的反省	余達心
	36	教會在大陸	唐佑之
	39	介紹幾本有關中國教會的港版書	書介小組
	42	爲什麼會不同	港大主愛中華祈禱小組
	43	「一九九七・香港」及福音派教會	亞洲歸主協會《傳》
	44	「普世派」、「福音派」與「三自」之間	衞民浩
本地宣教	49	本地宣教新動向—發刊詞	專輯小組
	50	令人鼓舞的福音行動—新邨新人	錢錦華
	53	「新邨、新人」之後	欣若
	54	教會的忽略—新大陸移民	中大團契社關小組
	56	訪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十一小組	橄欖資料組
	58	木屋福音團契及其他	橄欖資料組
神學專欄	61	構成神學的因素	羅錫爲
書評	63	也談《屬靈操練禮讚》	士林
三家莊	66	把愛擴而充之	老鄧
		教會辦學？	光
		是新宗派抑或邪教	見
一墟集	68	阿丙獨愛這瓢飲	絕人
		冒險，值得嗎？	陳佐才
		同性戀合法化	欣若
大專生捱	70	不是情書	譚啓見
小說分享	72	彩數！	天藍
論壇	76	猛人已死，而且……	曹希鈺
	79	橄欖要死?!	鄭留芳
	80	救救死人！	區初輝
		ＣＡ男性化	陳曉新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出版　合訂本零售八元正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